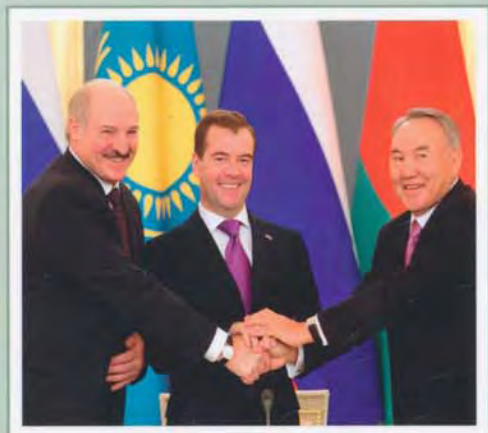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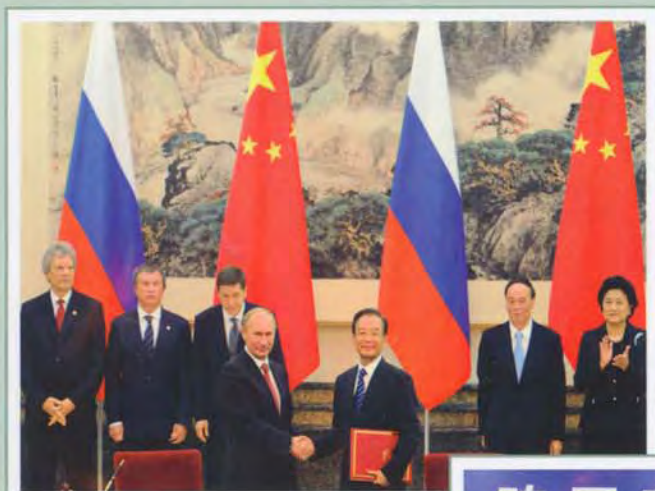




国际生活

俄罗斯对外政策、外交和国家安全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国际生活

目录

- 谢尔盖·拉夫罗夫，俄罗斯外交部长
——我们视增强国际关系的道德原则为重大政治的一部分 5
- 至圣的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基里尔
——俄罗斯的优先使命能被定义为捍卫世界真理的使命 9

外交

- 安德烈·杰尼索夫，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外长
——“上帝保佑，我们在当今世界几乎没有敌人” 20
- 武克·耶雷米奇，塞尔维亚外交部长
——俄罗斯与塞尔维亚：800年的历史 32
- 谢尔盖·里亚布科夫，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俄罗斯-美国：有关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3条约、
反导防御系统、阿富汗贩毒等问题 39
- 阿列克塞·博罗达夫金，俄罗斯外交部副外长
——俄罗斯东方外交走向：总结和前景 48

总编一栏

- 阿尔曼·奥加涅祥——中等阶级的葬礼，或“金十亿”的末日 54

周围世界

- 阿列克谢·梅什科夫——俄罗斯-意大利文化合作：历史和现代 58
- 谢尔盖·尼古拉耶夫——中亚在地缘政治中：美国矢量（1991-2008） 65
- 米哈伊尔·马约罗夫——安排不当的欧洲 78

趋势

-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21世纪的首场革命..... 98
- 弗拉基米尔·库兹涅切夫斯基——利比亚的非常事件和国家主权问题..... 103
- 瓦季姆·鲁科夫——金砖国家-全球意义的因素..... 111
- 尤里·沙弗兰尼科——俄罗斯联邦-欧盟：论坛之外
——如何安顿与发展自俄罗斯秋明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地区..... 117
- 加列金·托苏尼扬——原则上，俄罗斯具有投资吸引力，
但资本有时却会有神经质太太的表现..... 124

地缘政治

- 基里尔·巴尔斯基——上海合作组织：世界政治的新词汇..... 130
- 阿列克谢·瓦西里耶夫——俄罗斯和非洲在争取矿物资源的全球斗争中..... 140
- 康斯坦丁·弗努科夫——俄罗斯和怎样的亚洲一体化？..... 146
- 亚历山大·卢金——中亚和阿富汗在俄罗斯战略中..... 151

PRO ET CONTRA

- 俄罗斯目视东方？——辩论..... 158
- 未来的概念和战争——辩论..... 176

书窗

- 鲍里斯·皮亚德谢夫——斯捷帕诺夫大使的阿尔卑斯山高峰..... 190
- 根纳季·加季洛夫——对异常巨著的思索..... 195
- 安德烈·杜比纳——塞浦路斯外交家的日记..... 198

编委会成员

总编

阿尔曼·奥加涅祥

阿纳尼耶娃E.B. - 观察家，语言学副博士

沃罗比耶娃H.H. - 副总编

达维坚科A.H. - 第一副总编

兹洛宾B.K. - 因特网和多媒体科主任

波沃洛茨基Г.H. - 观察家

皮亚德舍夫Б.Д. - 特命全权大使，历史学博士

皮亚德舍娃E.B. - 责任秘书，历史学副博士

斯图德涅娃E.IO. - 观察家

费拉多夫C.B. - 专家

杂志理事会

拉夫罗夫С. В. -俄罗斯外交部长

阿夫杰耶夫А. А.

-俄罗斯文化部长

瓦宁М. В.

-俄罗斯外交部总经理

杰尼索夫А. И.

-第一副外长，经济学副博士

扎索霍夫А. С.

-政治学博士

科萨乔夫К. И.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法学副博士

卢金В. П.

-俄罗斯人权全权代表，历史学博士，教授

马尔格洛夫М. В.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政治学副博士

梅什科夫А. Ю.

-特命全权大使

穆哈梅季申Ф. М.

-俄联邦独联体国家事务、海外同胞和国际人文合作署领导人

帕诺夫А. Н.

-政治学博士

帕斯图霍夫В. Н.

-“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顾问

季托夫В. Г.

-俄罗斯副外长

托尔库诺夫А. В.

-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奇约夫В. А.

-俄罗斯常驻布鲁塞尔欧洲共同体代表

丘尔金В. И.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历史学博士

沙弗兰尼科Ю. К.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家联盟理事会主席，“世界政治与资源”

基金会主席

雅科文科А. В.

-俄罗斯副外长，法学博士

编辑部地址：邮政编码105064，莫斯科，高罗霍夫斯基小巷14号

电话：+7 499 265-3781；传真：+7 499 265-37-71

E-mail:info@interaffairs.ru

©«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2011



俄罗斯外交部部委委员会成员与莫斯科全俄大牧首基里尔在斯彼里多诺夫卡外交别墅举行的会晤上，就宗教因素在国际关系上日益增长的作用语境下对跨文明和跨文化的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

俄罗斯外长C.B.拉夫罗夫和莫斯科全俄大牧首基里尔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图为：俄罗斯外交部长C.拉夫罗夫和至圣的莫斯科全俄大牧首基里尔

谢尔盖·拉夫罗夫

俄罗斯外交部长



我们视增强国际关系的道德原则 为重大政治的一部分

至圣的，
尊敬的客人，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商定以这种形式举行会晤，旨在讨论国际关系中宗教因素的作用以及对落实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至圣的，我为您亲临我们的会晤，表示诚挚的感谢。

俄罗斯外交与俄罗斯正教会的合作传统具有深远的世纪根源。在苏联解体之后的现代史上，当国家没有可能同那些在瞬间，实际上被置于境外的人展开全面工作时，俄罗斯正教会起了中间环节的作用，成了精神和文化因素的守护者，实质上弥补了我国同胞与祖国缺乏的交往。

今天，我们拥有广阔的合作领地——客观上，俄罗斯正教会的利益有机地补充了俄罗斯外交部与国外同胞的工作，在独联体空间的维和努力，并在其它地区为增强国家间的关系创建前提。一个鲜明的例子：斯摩陵斯克城郊事故发生后，俄罗斯正教会采取了向波兰人民表示同情的激动气氛的步骤。这一步骤将两国推向实际的历史性的和好。

我们一起反对任何表象形式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非容忍性，按宗教、民族或是文明的象征分裂世界的企图。我们对不同宗教信仰间，不同文明间的对话重要性存在共识。外交部活动的优先方向之一——进一步推进在联合国主持下组建宗教理事会磋商的提倡，以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就宗教问题的“对话”机制，尽管进程很艰难，但还是有一定的进展。

我们同样能以欧安组织、欧洲委员会和其它国际及宗教组织为平台，联合采取同样的步骤。我们具备了这种联合工作的可能性——这就是表现良好的俄罗斯外交部和俄罗斯正教会合作工作组的机制和在此机制框架内进行的分类小组工作，这种合作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至圣的，请您确信，外交部一如既往将对俄罗斯正教会巩固其在境外的地位，在恢复历史上归属俄罗斯的地段和教堂的所有权上，在对你们抱有兴趣的所有问题上，予以法律、领事、信息上的支持。

无疑，有关宗教因素在世界政策中的作用问题，是一个复杂、多方面的课题，需要特殊的酌情态度。

2010年7月12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在与俄罗斯驻外大使举行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特别提到必须对世界发展趋势的预测采取深刻分析的做法，要用新的眼光看问题，放弃陈规旧律，需要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公民社会形式，也就是说，包括传统的信仰，其中，首先是俄罗斯正教会。

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明确显示，形成了一个无节制消费社会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的无能性。危机示范了基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走向稳定发展的可能性。彼基利姆·索罗金还在上世纪60年代就曾告诫，这种特殊的消费社会文化模式注定会失败。

今天，我们对忽视作为全人类团结一致的精神基础的组成部分——人所固有的道德、价值观和准则能导致灾难性后果，有越来越深的认识。对所有国家具有共同性的全球威胁的性质本身，要求的正是依靠牢固的道德原则做出团结一致的集体反应。

巩固国际关系上的道德基础被我们视为是重大政治的组成部分。更甚的是，新多元中心国际体系，不可避免地将体现世界文化-文明丰富多彩性的图景。深信，宗教间的对话会起特殊意义的作用。如果欧洲将遗忘自己的基督根源，原理上的一致性，那么，他将很难同其它文明找到共

同语言，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我想，就此欧洲人现在头脑中和心灵上经受的折磨，为我国，为我们的务实政策显示出重要地位。

战胜法西斯主义的经验教训保存了其共同性的意义，显示了忽视全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会将一个人和社会引向灾难。纳粹思想多半是受尼采超人思想一类哲学家著作影响形成的。不久前弗朗西斯·福山在自己的一部专著里指出，尼采承认的“上帝的死亡，是一颗能引爆怜悯和人的尊严平等价值的炸弹”。他称这是一种陷入歧途的思想，西方哲学还得走出这条死胡同。

遗憾的是，目前救世主思想，对自己价值观的绝对性及其通用性的信赖，而且是仅对世俗文化价值的信赖，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并在颇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和西方整体的态度。我们坚信，必须摆脱这种态度，这种摆脱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新现实的适应就会越痛苦。

与此同时，无疑还存在全球化后果的问题，全球化破坏了严格的民族隔墙，激化了民族宗教同一性的涵义。这我们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每个国家内部和国际舞台上都能见到。这种现象再次强调了加强宗教间、文明间对话的迫切性，将此项任务提升到从国家和全球角度衡量安全保障高度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对俄罗斯来说，极重要的一项任务是——逃避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在“澄清关系”时倒向其中的任何一方。我们有义务保留自己扮演平衡的、调和的角色。这种角色基于我们自己享有的多世纪来同150多个民族和50多种宗教信仰和睦共处与合作的丰富经验。当然，这里首先关系到我们主要的宗教信仰，其中，首先又是一贯致力联合其他宗教流派的俄罗斯东正教会。

2008年，欧洲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提倡通过了“文化间对话的白皮书”。基于此，我们提议在欧洲委员会开始举行一系列有关什么是欧洲的同一次性，何为现代欧洲社会重大价值的辩论。我们对政治家、哲学家、学者和宗教人士参加这种辩论自然也抱有兴趣。就是从客观上无助于欧洲宗教间的和平与和睦的欧洲人权法庭在“拉乌希反对意大利”案件上做出的令人伤感的，众所周知的裁定角度来说，这种对话的时机也已成熟。因为，遗忘了自己宗教-道德根基的人，未必能尊重其他文明的宗教信仰。

我们协助进行宗教间的对话。根据俄罗斯的提倡建立了“俄罗斯-伊斯兰世界”和“文明间对话”社会论坛战略视角组。我们珍视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此项工作框架内的积极合作。

培养相应的国际问题专家的课题，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迫切和专项的具体问题。今天，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在为丰富大学生、研究生宗教问题领域及宗教在世界政策中的作用方面的知识，可能性不多。如果我们能商定研究针对性课题的问题，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帮助下，举办一系列有关世界政策中宗教作用的讲座，这将是今天会晤取得的极不错的，作为我们合作形式补充的实际结果。

我还想感谢您，至圣的，对我们使节表示的一贯关怀。您在他们起程前往逗留国前总是接待他们，这对他们来说，是取得您对国际关系精神组成部分的评价，其中适应于外交官前往的具体国家评价的珍贵的可能性。

我再次重申，我们希望与俄罗斯正教会发展合作，我们将全面予以你们创举上的协助。

关键词：俄罗斯外交与俄罗斯正教会的合作、与境外的俄罗斯同胞进行工作、在独联体空间的维和努力、宗教间、文明间的对话。



俄罗斯的优先使命能被定义为 捍卫世界真理的使命

尊敬的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
尊敬的俄罗斯外交部部务委员会成员！

断言永恒前景，宗教能为不明性和冲突带来稳定和可预测性。世界金融危机显示，稳定的物质发展不能不以对像精神、道德、行善这种具有重大价值的认识为支柱。信仰是精神价值的强烈之源。其为人们揭示了至高的生活意义，予以他们善必胜的希望，赋予他们生活的力量。

与此同时，宗教信仰能用于建设性，或是破坏性的目的。遗憾的是，当我们涉及当今世界的宗教因素时，居于首位的是基于宗教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问题。对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肯定潜力予以的关注最小。依我的看法，能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的是一些能为宗教信仰对社会起正面影响建立必要条件的国家或联合体，只有首先在本国的生活中创建了条件的国家，能在国际舞台上推荐自己的经验。

俄罗斯宣布进行现代化改革，其当务之急的是在借鉴他国优处的同时，独立地寻找能将其排列于稳定和繁荣昌盛国家行列的发展模式。因此，我们需要不仅是技术和经济一面的，而且是具有重要价值基础的多

层面的现代化改革。现在已到摧毁务实与价值间被臆造的矛盾的时候。此两者相辅相成。从长远前景来看，不对社会中的非物质性动机予以针对性的扶持，物质财富是不可能创建的。

如果我们试图为自己社会的价值基础下定义，那么就会发现，一些在历史上与现代俄罗斯具有漫长的，百年紧密联系的其它国家也分享同样的基础。我说的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维亚、哈萨克斯坦等周边国家。这个空间也因这些国家的居民分散于世界各地而扩大。在当今条件下，不能是为一个国家有效拟定现代化改革和发展项目，还得有文明相近国家的参与下进行。欧洲的一体化就是这样开始的，北美、拉美、伊斯兰世界、亚太区域也正在走这条统一联合体道路。

当俄罗斯正教会指俄罗斯世界时，其意味的是共同的价值空间，而不是指只说俄语的世界，或是俄罗斯一组的朋友。我们无疑面临要明确地确定联合与体现我们生活准则的那些价值的任务。我可以指出其中的一些：宗教信仰和跨宗教世界，自由和道德责任感，损己利人，牢固的家庭，尊重长辈、集体会议和行动，创作、勤劳、公正、对祖国的爱、对周边世界的关心。

应当指出，俄罗斯教会就在表达从我们文明共同价值基础引申出来的思想，进行了大量的智力上的工作。2000年通过了“俄罗斯正教会的社会构想原则”，2008年通过了“有关尊严、自由和人权学说的原理”。今天，拟定与俄罗斯精神传统相连的综合思想的进程，在主教公会框架内继续进行，其从事对莫斯科宗主教区进行国际活动有直接关系课题的工作。

只在作为基辅罗斯直接继承者——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开始发展牢固的关系时，俄罗斯世界才会不是以漂亮的观念存在，而是作为国家关系的现实因素存在。

我认为，构筑基辅-莫斯科-明斯克特殊的“三角”关系，有助于发展罗斯共同遗产的课题。去年，俄罗斯继之乌克兰将罗斯受洗礼之日宣布为纪念日，这一点很重要。但白俄罗斯还没做到这一点，尽管高级僧侣会议于2008年向三国国家元首都提出过此项建议。可能有必要制作一

份能以特殊方式联合三国并以共同的意识形态来充实的联合欢度节日的日历。除了罗斯受洗礼日外，还可以将基里尔和梅福季圣人节、圣者安德烈·佩尔沃兹万内节和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定为共同节日。

加强同基希纳乌的联系，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摩尔多瓦的政治局势很复杂。但我们应当记住俄罗斯人民与摩尔多瓦人民多世纪来存在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凝聚元素是两国人民都归于形成了他们价值基础的统一的俄罗斯正教会的精神空间。

我认为，像阿斯塔纳、巴库、埃里温和其它独联体国家首都，也会对持有共同价值观的伙伴关系抱有不小的兴趣。鉴于此，我想强调一下2010年此方向上的几项重要事件。一月份，我访问了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同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会晤并与该国的宗教和社会活动家进行了接触。俄语在当地享有的高度地位，对俄罗斯文化的尊重，此共和国造就跨宗教和民族间世界，证实哈萨克斯坦能够参与组建俄罗斯世界价值基础和发展的共同项目。为俄罗斯正教会能在哈萨克斯坦更踊跃介入活动，2010年7月，我们教会的公会通过决定将哈萨克斯坦都主教区定为俄罗斯正教会新圣主教区地位，并赋予其显著地自主权。

我认为，积极支持哈萨克斯坦有关进行跨宗教领域对话的提倡是对的。2011年，哈萨克斯坦轮值为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主席。该组织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涉及被破坏的宗教声誉问题。俄罗斯已在2001年支持了德班宣言并积极参与了其执行的审议大会。我认为，可以与哈萨克斯坦就此课题拟定联合议事日程。

俄罗斯教会认为，在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进行发展地方传统宗教的合作，是一项重要任务。自1993年起，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基督教跨宗教磋商委员会开始运作，1998年建立了独联体跨宗教委员会。

宗教间的合作，对高加索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我深信，正是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教会，以及由帕沙扎德领导的高加索穆斯林宗教管理局予以的合作，有助于阻止此区域存在的冲突向宗教渠道转轨。我认为，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教会的接触，使得两国人民间保持了友好关系，这一点很重要。2010年，我们在巴库举行了宗教领袖峰会，在过去

的两年内，我同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宗教领袖进行了多次私下会晤。

在俄罗斯教会的境外机构，不仅是俄罗斯联邦的公民，就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人和其它民族的代表，都能受到牧师的照管。此独特的因素，是为侨居国外的人的一体化联系得到加强。就此，我对教会和外交部联合举行教会-国家与海外同胞合作的地区会议，表示满意。这种大会已曾在布鲁塞尔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2011年12月份有计划在北京举行类似的会议。

俄罗斯国家杜马于2010年7月通过的“关于海外同胞”法的修正案，为教会和俄罗斯国家在支持海外同胞，维护他们的权利开辟了合作的新境界。此项法案载入了规定国家为海外同胞建立宗教组织予以协助，以及当局为宗教组织在落实予以海外同胞精神支持，保存祖国语言和文化，对一些具有社会意义的提倡提供帮助的条款。我们还需要领会这些准则并将它们引向实践的渠道。但现在就己很清楚，俄罗斯国家承认宗教组织对散落四处的兄弟姐妹予以关怀起的重大作用

俄罗斯国家高层代表人士在国外进行访问期间拜访莫斯科宗主教区的教会已成良好传统。梅德韦杰夫总统、普京总理和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出访期间，总会抽出时间上俄罗斯教堂和东正教的圣地。我知道，在2010年11月，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朝拜了在纽伦堡的彼得堡圣克谢尼娅教堂。每这样的一次朝拜，是向国外同事和国际社会整体体现新俄罗斯的有力例证。

对俄罗斯教会国外机构的支持，这也是对在境外国家俄罗斯存在的支持。在我国同胞增多的国家建造新教堂的实践，有助于这种存在的扩大。我特别想指出教会和国家同巴黎大教堂在建立未来的俄罗斯精神-文化中心进行友好合作的范例。建立这样的—个中心，不仅是侨居境外的现代正教信徒代表切身需要的，同时，也是为一战和二战后，许多移居国外的侨民所需要的。

东正教在俄罗斯世界的特殊作用，是建立和发展俄罗斯同在文明上最接近于我们的东正教世界的紧密合作。几百年来，除了苏联时期，俄罗

斯一直是因失去政治独立性和受非正教和其他信仰当局迫害的东正教人民的庇护者和保护者。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尽管正教国家不像西方或是伊斯兰国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统一联合体。今天，我们也还看不出有这种联合的前景，但在生活各领域保存东正教遗产事业上的合作，对正教传统的国家来说，能作为区域和全球性的重要任务。我认为，对在这个方向进行活动的正教跨议会大会，圣者安德烈·佩尔沃兹万内基金会和其它组织予以支持是很重要。

与处在复杂的民族宗教环境下的中东古老的宗主教区保持教会上的联系，也很重要。在我对兄弟的古老宗主教区进行访问的会晤安排中，包括有非正教领导人、穆斯林社团和国家政治领导人。

在整个南斯拉夫危机进程中，俄罗斯正教会和俄罗斯国家对兄弟的塞尔维亚和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立场予以支持，其中包括像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地位问题。塞尔维亚正教会不止一次对我们予以的这种支持表示感谢。但遗憾的是科索沃问题再度趋于尖锐化。2010年8月，科索沃维和部队中的欧洲兵团指挥部发表了精简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国际维和兵团的人数和开始逐步将当地古老的修道院移交地方警察维护的正式声明。俄罗斯正教会分享塞尔维亚正教神职人员就此问题上不止一次表示过的担忧。我们认为，这一步骤将会抵制公开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东正教信徒宗教自由受限制的事实。同时，对由阿尔巴尼亚地方居民组成的科索沃警察不能保障该边区教堂建筑的伟大古迹和生活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的安全表示担忧。

俄罗斯正教会就俄联邦政府通过的我国参与修复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圣地的决定表示欢迎。塞尔维亚正教会对这一决定表示感激。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并不因为保存建筑纪念物而得到解决。联合国大会2010年9月9日的决议，同样提出有关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尔维亚居民的命运问题，俄罗斯正教会为保护他们大声疾呼。

在捍卫自己的独特性的同时，俄罗斯世界应当在同其它世界文明，首先是同有代表性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的世界进行的对话与合作上表示

开放。研究我们的文明和其它文明间的对接，可以作为此方向的一项任务。

首先，与西方就价值观问题确定关系至关重要。同时，必须记得西方既有自由价值的拥护者，也有传统的宗教信仰代表。我们致力在天主教和持保守态度的新教环境中寻找盟友和共同语言。传统的西方基督教界和俄罗斯正教徒为同样问题操心：侵犯性的世俗化、全球化、家庭观念的淡化、传统道德准则的破坏。我们可以共同对与尊重人的个性原则格格不入的人工流产、安乐死、医疗生物试验表示反对。

在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进行的一系列对话中，我们今天同样努力与表示自己忠于基督教传统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构建对话。我们认为，拟定同非正教信仰和世俗基督教界一整套综合性的关系，是在同西方关系上选择的正确道路。

当欧洲人的生活中，基督教受到排外现象和宗教声誉遭破坏成现实条件下，俄罗斯可以成为讨论这种威胁，制定联合抵制行动的平台。这能以俄罗斯-西方基督教政治家举行年度会议形式来进行。在这种会晤上同样可以讨论有关世界发展的课题和制定联合行动的决定。俄罗斯教会有同欧洲人民党、德国基督教民主党等其它国家党派进行对话的经验。说不定也应当同美国基于基督教信念的社会-政治界发展接触，以及逐步吸引中欧和东欧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参与这种对话。

今天，为保护欧洲基督教遗产，不仅需要教会做出努力，还需要各国共同做出努力。俄罗斯为保护欧洲基督教遗产做出的现实贡献，表现于他作为第三方支持意大利共和国就“拉乌希反对意大利”案件向最高法院的上诉。就此，我向我国的外交官表示祝贺，因为此事件改变了欧洲一些势力对俄罗斯的看法。欧洲委员会会议会2010年10月份通过的“在医疗服务框架内因信仰拒绝提供某项服务权利”的决议。此项决议确认了医生有权根据自己的信仰拒绝进行医治，首先是做人工流产手术。

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是文明间对话的一个重要方向。伊斯兰是俄罗斯世界中具有第二大意义的宗教。穆斯林同其国外的信徒关系极为重要。对俄罗斯来说，由作为在颇大程度上决定国家文明面目，以压到多数信

徒的宗教团体的俄罗斯教会同境外伊斯兰世界进行对话，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代表俄罗斯同伊斯兰世界进行对话，在没有东正教参与的情况下，将是不全面的。我们同伊朗穆斯林团体发展合作已有15年了：2010年10月份，在德黑兰举行了有教会代表团出席的第7次“东正教-伊斯兰”委员会会议。目前，我国教会正在同土耳其、卡塔尔、印度尼西亚等伊斯兰国家建立对话。

中国是俄罗斯世界的重要邻国和伙伴。今天，俄-中两国宗教领域的关系，可以说取得良好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俄罗斯联邦直属的宗教团体合作委员会签署了有关相互协作的备忘录。去年，为庆祝中国东正教325周年，出版了讲述中国东正教起源和东正教文化在中国形成的书。

在当今俄日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条件下，发展俄日宗教联系能是化解这种紧张的重大因素。2011年在日本举办的俄罗斯文化联欢节框架内举行了圣徒尼古拉来到日本150周年的庆典活动。我计划参加2012年就圣人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活动。

俄罗斯教会在北朝鲜的发展取得一定的成就。但目前，在历史上就存在有俄罗斯宗教使团的韩国首都——首尔，俄罗斯的传统至今存在不够。此传统仅体现于康斯坦丁诺波尔宗主教区框架内划分出不大的房舍为圣人马克西姆·格列科的俄罗斯教堂。

今天，我们同拉美国家的来往比较密切。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之一的事件，是2008年10-11月在俄罗斯正教会积极参与下，在区域举行的俄罗斯日。拉美国家对社会公正和平等问题予以特别的关注，主张多极世界秩序。其中许多国家对俄罗斯正教会就此问题的立场抱有兴趣。

俄罗斯教会利用各种接触同其它文明在各个方向进行对话。在同国外的政府和各党派扩大联系时，我们致力在世界社会-政治空间确保宗教量度的持续存在，向外交伙伴传达莫斯科宗主教就当代道德问题的立场。我想，海外特权了解俄罗斯教会就生活和社会的观点，有助于加强俄罗斯世界国家的国际威信。我对俄罗斯教会参与拟定在各国举行的俄罗斯日计划感到满足，尽管还有为进一步改善合作和伙伴关系的可能性。

教会对与海外国家社会及政治机构的对话潜力有明确地认识并在进行落实。我们同德国、意大利和波兰在论坛-对话框架内就公民社会问题建有信任和建设性的关系。今年，我们在“俄罗斯-朝鲜共和国对话”框架内开始同朝鲜社会进行对话，以及在为俄罗斯-土耳其社会舆论论坛做前期工作。

在全球世界不仅存在同其它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还存在形成进行国际交往的综合准则和规则的问题。其进程中就产生通用性和独特性的对比问题。在表述俄罗斯世界的价值基础时，我们强调的是出自我们共同的感受体验的普世价值的体现。我上述作为俄罗斯世界价值列举的价值性，是能被任何一个大陆的人接受。但每个文明有自己对这种价值的领会和体现以及表现形式。无疑，俄罗斯、乌克兰、德国人都能珍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和基辅-洞窟修道院，但我国人民对这些名胜古迹抱有其特殊的情感。我们必须表述和捍卫的正是包含于对普世价值罕见的领会体验的独特性。

在此，我指的不仅是构建精神构架，但也指其与我们生活的正面现实的联系。

俄罗斯就像整个俄罗斯世界，必须认识自己面向其它世界的使命。美国将自己的使命阐述为担负自由的使命。我认为，俄罗斯的优先使命可以定义为捍卫世界真理的使命。俄罗斯的“真的”一词，包含有真理、公正、正确性的概念。每个人——自普通老百姓到资深高官的领导人，对这一构想都有清晰的理解。其包含了致力宗教真理，寻找科学真理，社会公正，不容忍双重标准，道德上完善的思想。

我深信，在当今条件下，寻得作为全球发展基础的更新的价值观平台，是国际主体相靠拢，在主体之间构筑质上一新关系的有效形式。鉴于此，俄罗斯和整个俄罗斯世界能提出保护为所有不同文化的人清楚的通用基础价值的思想。对这个课题需要进行严肃的研究、下定义、谈判。在这个问题上，宗教团体作为支持个性和社会生活价值原理的积极拥护者应当其起重要作用。

单独的宗教团体没有能力协助这项任务的落实。为使宗教组织在同国际机构和一些国家的对话中能联合自己的努力，必须要有跨宗教的新倡议和学会利用现存的。莫斯科宗主教区在发展跨宗教对话问题上，具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同样重视与欧洲的宗教团体发展合作，我们也参加由欧洲委员会主办的宗教领导人的活动。

俄罗斯和一些其它俄罗斯世界的国家，是世界极不相同的宗教团体和平共处的鲜明典范。遗憾的是，今天，俄罗斯未排列在为自己的国际地位积极利用跨宗教因素国家的行列。例如，土耳其作为一个世俗国家，为在境内外实施的跨宗教项目投入不少资金。其予以了土耳其国家参加跨宗教对话的可能性，将自己提升为欧洲和世界水平一级。2006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宗教领导人会晤，是我国近年来激化努力的首次尝试。这次会晤是由俄罗斯教会和国家联合举办的。会晤带来的巨大效果，使之成了在“G8”和“G20”举行峰会所在国的前夕举行类似会晤的传统。

俄罗斯教会提议通过建立宗教领导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机制，来搞好国际组织与世界宗教团体的接触。一组高层宗教领导人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进行的活动已得到发展，我们希望这种关系会有进一步的推进。

我们认为，在日内瓦举行的“通过对人类传统价值观的更好理解鼓励人权”的研讨会，是宗教团体同国际组织对话领域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这项活动是为有宗教团体参与讨论人权问题组织的国际性辩论的重要步骤。希望俄罗斯外交在同俄罗斯正教会的合作下，能有效地将此进程继续下去。其目的是消除将人类引向日益恶化的道德危机对人身自由理解和解说的自由垄断。这种现象已明显体现于家庭价值观的淡化、娼妓合法化、吸毒和同性恋上。在此，我呼吁俄联邦拒绝履行威胁社会平安道德的义务。类似于不履行前不久欧洲人权法院做出向在莫斯科举行同性恋游行的组织者予以物质赔偿的决定。

俄罗斯教会认为，人权和传统价值观对比关系的课题，是充实俄联邦对外政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支持俄罗斯常驻日内瓦代表

就在莫斯科举行富有代表性的人权和传统价值对比关系国际会议的提倡就很重要。就我们而言，我们已将此课题提上2011年6月份在莫斯科举行的欧洲宗教领导人委员会的议事日程。

在今天的发言最后，我想指出，今天，宗教因素在海外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关系中起着重大作用。基于俄罗斯正教和俄罗斯外交部工作小组平台，正在对现实做有系统的共同领会。这个小组运作已有七年多时间。小组以有效的合作的机制体现了自己，促使了教会-社会和教会-国家在国际领域重要倡议的落实。我认为，保持和加强这种联合工作的机制是合理的。

最后，我想祝愿您，尊敬的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外交部部务委员会成员和从事外交工作的所有人，在为我们的祖国和整个俄罗斯世界谋求福利的工作上取得成就。祝愿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胜利！

关键词：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俄罗斯世界、宗教间对话、教会-国家合作、保护欧洲基督教遗产、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国际生活

外交

安德烈·杰尼索夫：

“……全球规模的，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会时时进入一个动荡趋于尖锐化的阶段、一个变化的阶段。这也是构筑新颖关系，包括新国际关系的阶段。这个阶段上的生活是不简单的。尽管如此，就拿外交家、政治家来说，他们的任务在于将这种动荡造成的负面后果最小化，而在可能的情况下，为走向新一环的发展创建前提。”

武克·耶雷米奇：

“……我深信，两国人民800年来的友好联系，一如既往地将会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看来，没有能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更真挚地表述我们的兄弟间的联系。他写道，塞尔维亚民族将伟大的俄罗斯精神铭诸肺腑，因为，塞尔维亚土地上渗透了俄罗斯人的血，塞尔维亚的光荣将在此土地上复兴。塞尔维亚人将会永记俄罗斯无私的帮助，记得为塞尔维亚捐躯战场的俄罗斯人并非为了征服。无论世界经历何种转型、改革或是骚乱，塞尔维亚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将犹如多亏阿索斯圣山上俄罗斯修道院院长，使拉斯特克公成为萨瓦修士那一天一样，始终将是稳定的，不可改变的和牢不可破的。”

谢尔盖·里亚布科夫：

“……可以肯定地说，两国关系有所改善。至于原则性的改善问题，那就得另进行探讨。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没经历说得上两国关系取得稳定和肯定的发展阶段。”

阿列克谢·博罗达夫金：

“……我国亚太区域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对我国的未来同全球发展“重心”近年已移至此区域的国家进行合作的不可分割性的理解，对俄罗斯经济别无选择地，势必融入此正在增速的一体化进程区域的认识上。”

安德烈·杰尼索夫
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外长



“上帝保佑，我们在当今世界几乎没有敌人”

转刊“俄罗斯之声”广播公司“与世界面对面”项下的访谈

阿尔曼·奥加涅祥，“国际生活”杂志主编：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如过我们环视当今世界的话，可以看到许多几十年来都在享受政治和经济稳定成果的国家进入了自己生存的错综复杂及旋涡中心。这种现象发生在不同国家，甚至发生在不同的大陆。按您的看法，这种事件有何种内部联系？

安德烈·杰尼索夫：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本人更倾向于认为因果关系寓于所有社会现象的哲学流派。就因为这个原因，全球规模的，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会时时进入一个动荡趋于尖锐化的阶段、一个变化的阶段。这也是构筑新颖关系，包括新国际关系的阶段。这个阶段上的生活是不简单的。

尽管如此，就拿外交家、政治家来说，他们的任务在于将这种动荡造成的负面后果最小化，而在可能的情况下，为走向新一环的发展创建前提。因为，发展就是以这种跳跃形式进行的。

如果拿历史来说，至少是现代史，那么，就可以更正确地说，稳定阶段，也就是相对安宁、稳固、渐进性、迅速发展（当然也有例外，但我指的是总的趋向）的阶段曾是短暂的，而各种不稳定现象阶段——时为更长和更痛苦

不过，现今始于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不稳定阶段，确实有点持续过久，但我们还是乐观一点。换句话说：不要过余悲观。全球规模的局势，整体上被控制，并存在摆脱危机的前提。

A.奥加涅祥：我们将经济危机的话题改谈政治问题。莫斯科的听众请您对为什么梅德韦杰夫总统只在两个星期前才签署由联合国安理会早在春天就通过的利比亚施行制裁决议的指令加以评论。

A.杰尼索夫：这里存在一定的，非常重要的程序问题。就我们现在提及的有关利比亚的1973号决议，确实早在3月17日就通过。

但这里我们要理解，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直接采取行动的文件，其应当立即执行。在通过决议的一天，我们同所有其它联合国成员国一样，开始执行决议。大家也都懂得，国际法高于本国立法的准则。

尽管如此，其中存在一个将国际法准则立为国内的立法任务。这项任务就由总统通过的指令来完成。

通常，跨部门的协调需要一个月、一个半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因为，其中总存在一些涉及我国各政权机构的问题。我们完成了跨部门的这些协调工作，指令也已签署。但决议的执行，我再重复一遍，是有决议通过的一天起开始执行，对我们来说也是必须执行的。因此这里不存在矛盾。

A.奥加涅祥：俄罗斯在联合国表决时，既不投“赞同票”，也不投“反对票”。如何解释这种立场呢？

A.杰尼索夫：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第1973号决议被很快地通过。在此通过的阶段上，决议中的一些修辞不能为我们接受。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没有支持这项决议——在表决时弃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我们投“反对”票，那么，这项议案就不会通过。

我们没有这样做，这是我们经考虑后做出的有意识的选择。与此同时，当时，在决议通过阶段上和现在，我们都指出其中还留下一些具有弹性，过余灵活的非具体的解说。

这些不够具体的条款也就被以西方国家为主的所谓接触小组成员利用。对一些段落修辞的不同解读，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允许采取错误行动。因此，我们不断地在安理会上提出这个问题。

决议确实禁止向双方提供武器、军事设备的行为，再说，也没人向本加兹的暴乱分子提供重型武器。但一些半公开的武器供应现象还是存在，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一点。

A.奥加涅祥：圣彼得堡的听众问道：“在进行的宣传战情况下，莫斯科是否拥有对叙利亚无政治倾向的真实信息？从掌握的这些真实信息能得出何种结论？国外的朋友是否对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做出他们希望的结论？”

A.杰尼索夫：我能使大家信服，我们拥有叙利亚非常详尽和可靠的信息。叙利亚的局势非常复杂，一团乱线团，无法对其做同一的解释。

就整体而言，存在高度的内部不稳定趋势，当局企图镇压人民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不仅是广大群众单纯掀起要求民主的一浪，但也是一些有意识地在极力动摇和推翻制度势力的造反表现。

我看该这么说：作为任何尖锐的国际问题，对这些问题，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都进行激烈的，甚至炽热的辩论。安理会成员国对事态都持有不同评价。我们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呼吁停火和进行谈判，并且是针对双方做出这种呼吁。这看来是主要的。

与此同时，我们尊敬的伙伴，如一些西方国家，他们呼吁现行总统阿萨德和叙利亚政府下台，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反对派认为，国际舆论在战胜现行政权事件上会为其助一臂之力，因此，可以不必进行任何谈判。所以说，类似的行为只是加剧了紧张力度，其复杂性就在于此。

至于压力问题，要知道，对我们是很难施加压力的，更不用说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也是安理会的独立的和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成员国。

自然，进行辩论时，有时非常激烈，有时采用强有力的论据，这是通常现象，再说，安理会上也不可能有其它现象出现。以往和现在都没有过愉快的事情。

我们同叙利亚领导不断保持接触：梅德韦杰夫总统与叙利亚阿萨德总统进行了两次电话联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叙利亚外长穆阿列姆也在进行磋商。双方在各级别上保持稳定的联系。

我们不断地提请叙利亚领导注意，呼吁其在选择镇压社会骚乱手段上要谨慎和承担责任。

同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联合国的一些特殊机构，在寻找局势正常化的途径上起显著的作用。

A.奥加涅祥：俄罗斯排除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认为，军事干涉是无效的并对本区域来说是一种危险的现象。那么，外国报刊有关某一个第三国家能进行干涉的评论该怎么理解？有这种可能性吗？

A.杰尼索夫：我不知道哪一个第三国家有从外部对叙利亚进行干涉的打算。相反，所有扮演国际主角的国家——美国、欧盟和土耳其，都声明没有任何有关外界力量干涉叙利亚内部冲突可谈的余地。我们自然也严格遵循此立场。

A.奥加涅祥：还有一个来自圣彼得堡的问题：“您能指出当今世界俄罗斯的亲近盟友吗？”

A.杰尼索夫：回答此问题，不如说是在当今世界，上帝保佑我们几乎没有敌人。如果拿与俄联邦地理上毗邻的国家来说，我们同所有这些国家保持平衡、稳定的关系

唯有例外的是格鲁吉亚，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对我们来说，也是因不愉快的复杂情况造成的。我们同格鲁吉亚最高政治领导层有磨擦，但不是同国家，更谈不上同其人民存在磨擦的问题。

至于盟友，我们确实有盟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因为，这是一个军政联盟组织。前不久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集安组织非正式峰会上，通过了该组织适应现代国际和地区发展特性的重要决定。

A.奥加涅祥：有一个问题，怪有趣的是来自德国的提问：“您如何对待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的‘俄罗斯只有两个盟友——军队和海军’这句名言？”

A.杰尼索夫：很好。我也无与亚历山大三世陛下争论之意。如果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说的完全正确，因此也没什么可争论的。

就从自然地理原因出发——作为拥有广阔疆域，漫长交通线的俄罗斯国家，我们必须得有一个具有战斗能力的武装力量。而且需要在各种环境下，各领域具有战斗能力的海、陆、空三军。

我们都能见到我国领导人，俄联邦政府对此问题予以的应有关注。我们并不乞求什么。我们也觉察不到哪里有以常规武器，或是核武器性质的大军事冲突对我们直接构成的军事威胁，向我国宣战。

但作为军事上的危险性，其还是存在。再说，还存在所谓新挑战和新威胁。单枪匹马地进行抵抗是行不通的。就因为此，俄罗斯在构建集体的安全基础，但又以自己武装力量的战斗能力为支柱。我再说一遍，在此问题上没什么可争辩的——这是无条件执行的指示。

A.奥加涅祥：彼尔姆的听众问道，“一些国家对金砖国家的建立抱有谨慎的态度。您有对金砖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受到一种抵抗倾向的感觉吗？”

A.杰尼索夫：就像对所有新生事物的那种吧。金砖国家是什么？这是为联合各国家来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任务做出努力的一个新的，符合时代特殊性的一种形式。金砖国家不是国际性组织。其没有任何国家至上的机构。就连秘书处都没有。这是首例之一的，就像专家说的，对世界持有一致看法的国家，为解决或是讨论某些他们的共同任务聚在一起的网络外交的典范，这就是金砖国家。

我强调一下，这不是国际组织，也不是集团，这是网络外交的范例。聚在一起进行讨论的是具有重要的和经济实力在增长的一些利益相吻合（并非得在所有事项上利益吻合，只要在某些问题上利益吻合）的大国。其中没有等级制：没有大小之分，没有领导和被领导之分。国家都几乎等同，就像运动员所说的，属于同一重量级范畴。

除了举行开诚布公地讨论国际问题、安全和与新的挑战——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贩毒进行斗争问题的峰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外，还举行部长级会晤。在举行一些解决全球金融体系重大活动前夕，财政部长们进行旨在核对自己立场的会晤。这种会晤也是绝对公开的。农业部长也计划举行会晤讨论粮食问题。像人口众多的中国和印度，这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巴西已是世界粮食供应的领先国之一。俄罗斯近年来，包括今年，也走上了此市场的前线。我们有共同可讨论的话题。我们金砖国家没啥可隐瞒的。

我们也在联合国内进行合作。现在是特别有意思的阶段。安理会除了俄罗斯与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外，还有三个作为非常任理事国——印度、南非和巴西。也就是说，金砖国家的所有成员国都为安理会成员国。这对安理会的日常工作极为有利。

A.奥加涅祥：我们的听众问道：“就叙利亚问题上，金砖国家有没有分裂现象？曾有报道说，印度、南非和巴西联合采取了外交行动，而中国和俄罗斯则表现克制”。

A.杰尼索夫：没有，这里不存在任何矛盾。我已经说过，我们都各自有些不同。中国和俄罗斯——这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南非、巴西和印度——非常任理事国。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处于的非常任理事国地位享有更大的灵活性。他们提出的倡议被视为比五个常任理事国提出的更富有代表性。我们在工作上保持紧密的相互联系。

比如，当讨论和通过由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就叙利亚问题做的——经过所有国家协调一致的正式文件——最后一次声明时，作为此项声明的提倡者正是这三个国家。他们也承担了中介的职能。他们的代表曾前往大马士革寻求在对峙双方搭建桥梁的可能性。他们扮演了极其正面的和负有责任的角色。所以说，这里不存在任何矛盾。

我们确实相互不同，但对周边世界有近似的看法。

A.奥加涅祥：近来，就雅尔塔协议中奠定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牢固性问题在继续进行辩论。我们辛菲罗波尔的听众问道，战后世界是以雅尔塔原则建立的，但这些原则有多牢固呢？

A.杰尼索夫：要知道，牢固不等于僵死或是冻结。世界在变化。什么是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这是一揽子某种原则。当然，这些原则一直在确认，但就其基础来说，是不可动摇的。

例如，欧洲战后边境牢不可破性的原则。其获得一定的发展，并在1975年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签署的最后文件中被固定下来——这也就是著名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

但自1980年下半年中期起，我们看到边境在变化。如果边境的改变出自人民的意志，像捷克斯洛伐克被划为捷克和斯洛伐克那样，这种现象并不违背边境的牢不可破性原则。

A.奥加涅祥：这不归于科索沃问题吧？

A.杰尼索夫：是的。所以我们和许多国家都不承认科索沃为独立国家，我们依然视其为塞尔维亚的一部分。这是国际法上的一个严重问题。这同样涉及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调解，德涅斯特河沿岸，北塞浦路斯问题。在欧洲境内，遗憾的是，这种现象不是一个，或两个。

应当说，世界在变化，体系也在变化。但某些不可动摇的基础还是存在，大家对此都抱有兴趣。没人有意识地去冲刷欧洲边境牢不可破性的原则，否则潘多拉匣子就被打开了。

A.奥加涅祥：下面是有关联合国的问题：莫斯科对联合国应当按章程办事，即按其第一款所写的：“联合国致力于支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持何态度，现在，联合国无事不干，甚至从事拟定与外星文明进行会晤的纪要。听众认为，章程中的目标似乎退居到第二、第三位上，指出，是否该对联合国进行改革的时候？

A.杰尼索夫：其中存在严肃的事项，但也有一些奇异的事物。这些外星文明的事就属于奇异问题。在联合国的特殊机构中，确实有从事严肃问题的宇宙事务委员会，他们在拟定世界各国利用宇宙空间的法律原则。此外，还有一系列极重要的，请相信，远非是同外星人打交道的问题。前不久，作为趣闻也提出过如果外星人突然出现在地球上的话，顾及到联合国的普及性，其是同外星人进行对话最适宜的伙伴，因此，必

须指派同外星文明进行接触的特殊代表这样的问题。我再强调一下，这是一种奇异现象。有时也会有美好意愿的提倡。比如，前不久，一个亚洲小国——不丹就提出有关幸福的决议草案。

联合国文件中还有像千年发展目标的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克服贫困、普及教育、消除疾病、解决粮食问题。不丹提议将幸福作为一个目标加入计划。我们对这种做法也是有克制的，我们懂得这也属于趣闻一类。

同事们，我们还是话归正题吧。联合国是一个很大的组织，联合国属各国家的组织，跨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活动的并非是一些外交官，单一的人物，而是组成联合国最高机构的联合国大会的政府，政府代表团。

联合国有安全理事会，其中有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十个每两年轮换的非常任理事国。他们通过对各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和其它文件。

此外，联合国内有极多的所谓分支机构，各种管理部门。其有巨额预算资金的联合国发展计划，有广为人知的儿童基金组织。隶属联合国的有几十个组织。

每个组织从事自己项下的工作。比如，防治荒漠化和缓和干旱组织、森林再植组织。存在环保计划，联合国经济委员会等。所有这些组织，请相信我，并不在办理同外星文明接触的事情。

再说，提出有关淡水缺乏的问题和就此问题组办各种寻找出路活动的领先者是塔吉克斯坦。这是一个不大的国家，但他能提出确实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并能顺利地推进此一问题。这说明，不仅是大国，就是小国也能在联合国起重要作用。

联合国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其拥有十亿多计的预算，但不能每次有效地利用。这种官僚制度有时是人为制造的，有时达到已不能容忍的地步。联合国时时跟不上形势。这是事实。因此，联合国的改革问题，是一项持续性的任务，但必须是涉及联合国的整个大体系。

A. 奥加涅祥：安德烈·伊万诺维奇，俄罗斯主张扩大安理会成员国吗？

A.杰尼索夫：这个问题上存在一定的矛盾。安理会当然可以扩大，但必须在妥协的基础上，或以联合国压到多数赞同这一步骤的情况下扩大，这是我们的立场。

再说，这里产生为什么要扩大联合国的问题：只是为了扩大代表而扩大，还是为了使机构更富有工作能力，能在更大程度上考虑各种观点、不同的立场。

我们同美国和中国一样，愿意扩大安理会成员国，但其必须保持自己的工作能力。现在安理会有15个成员国，如果扩大为20多个国家（“low twenties”），这能增添安理会的代表，但不得下降安理会的有效性和工作能力，通过决定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一个特殊点。联合国安理会由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组成。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如要扩大，在哪一范畴进行扩大？扩大常任理事国成员国，还是保留由历史形成的核心，而扩大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成员国，以便使更多的国家能经过安理会。这也是一门辩论的课题。

A.奥加涅祥：下面一个问题是：“防范美国沿我国边境部署反导防御系统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断言部署反导防御系统是针对伊朗的导弹，令人困惑莫解。这种说法到底是针对谁说的？”

A.杰尼索夫：有关来自伊朗的威胁问题，与其说是美国人要我们信服这种说法，不如说是他们要使自己信服这种说法。现在是由美国提出他在世界上进行绝对统治的任务。这是美国国家政治心理学的组成部分：美国应当比任何一方的敌人都强，应当是一股绝对的，独立自在的力量。至少从军事角度来说，其也拥有此一定的前提。

但就是我们在当今世界上所见到的，他们远非总是起决定性作用。大家看到庞大的美国军事实力如何陷入了阿富汗的泥潭。在伊拉克也同样如此。

我们认为，反导防御系统应当在基于集体的当今世界的现实上建立，并依我们的看法，将其协调为不违反主要原则——一国的安全不能靠减少他国的安全来取得的共同安全原则。

我们并不反对反导防御系统，我们也有自己的同类手段，但安全只在作为共同安全时，才成为可能。我们作为同美国进行有关反导防御系统问题对话的国家，不应当有来自部署这些系统带来威胁的感觉。

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我们致力同美国就联合评估威胁达成协议。有可能也确实存在威胁，但必须从一定的历史和时效前景的角度严肃待之。就说今天一些国家没有导弹，但过十年却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也得予以顾及。

简言之，在威胁的评估上，必须要进行对话与合作，下一步则在击退这种潜在威胁进行合作。这可能是针对今天的威胁，也可能是对我们明天面临的威胁。为此，结为某种联盟的国家应当承担有束缚性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实质——别干让你伙伴视为是对其有威胁的事。

确实如此，这里并非一切都那么地简单。但对话还是在进行，磋商也在不断进行，首先是在作为主要国家的我们和美国之间进行的磋商。两国能实际性地，包括在技术工艺上建立反导防御系统。世界上并非所有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

因此，当我们在说和听说像欧洲反导防御系统时，我们应当懂得，这不是什么欧洲系统，而是美国在得到欧洲国家的赞同在这些国家境内部署的反导防御系统。

A. 奥加涅祥：欧洲国家就反导防御系统问题上今天持何种立场？

A. 杰尼索夫：如果从展望历史的角度来说，那么，欧洲国家总体上的立场是建设性的。因为，欧洲在关心自己的全面性安全。它与我们并不像与美国由大西洋被间隔。

我们也是欧洲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大陆上，我们应当构建一个共有的安全体系。因此，一方面，欧洲人不倾向于同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暗示这是同美国进行对话、辩论的课题。另一方面，当然，他们也不想使此问题作为新的刺激因素存在于俄美关系之中，从而影响欧洲的政治气候。也就是说，按我们的理解，这对我们的欧洲伙伴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我再说一遍，总体上，作为欧洲大陆健康核心的欧洲人，在此课题的辩论中起肯定作用。

A.奥加涅祥：俄罗斯国内外的一些媒体认为，俄美关系“重启”已告终，说是只有两国的军事部门在加强合作。您是否同意这种评价？

A.杰尼索夫：我对大家注意到两国军事部门间的合作感到高兴。我们不能忘记军事和军技合作不仅本身具有重要性，其还具有巨大的政治和精神上的重要性，其量度是同信任相关。军事领域具有进行合作的能力，反映了极重要的一面——双方具有一定的信任度，他们已不再借助武器上的瞄准器对视各方，而有意进行合作。

再说，近来，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俄美联系，确实活跃了起来。就在结束的本届航展上，美国军用飞机四年来首次参展。我国空军在美国境内驾自己的飞机进行联合军演。当然，这是一个小小的情节，但富有特性。

通过我国的领空和陆地向在阿富汗执行使命的美军输送供给，这也是我们军事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军事代表团进行定期交流，军舰驶入两国的港口。简言之，如果仅拿这一领域来说，我看关系“重启”问题上，一切都正常。

但我们两国的关系，无疑，远远超越了军事接触的框架。最关键的还是政治上，领导人间的关系，两国外交部门——俄罗斯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维持能解决任何问题，包括双方具有分歧的复杂、尖锐性问题的建设性工作气氛的能力。至少是这样，才会有解决问题的可能。

A.奥加涅祥：美国就“马格尼茨基案件”做出的反应导致俄美关系上出现某种不稳定局面。有听众就此问题问道：“为什么在美国有关‘马格尼茨基案件’谈论的那么多？美国领导在此事件上表现的暴躁和生硬态度原因何在、难道美国以前和现在就不发生这种事情吗？”

A.杰尼索夫：当然，美国以前和现在都存在这种现象。我们也不准备在此问题上自欺欺人。马格尼茨基事件确实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必须对其进行调查。对一个人的死亡，就是他违反了一定的财务制度，对此人的死亡负有责任的人，在任何情况下应受到惩罚。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俄罗斯总统首先关注的就是这一点。他以强硬的措辞要求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和做出相应的结论。对此案正在进行调查。

根据以上所述，美国立法员的实践，说得缓和点，令人质疑。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出自自高不凡、自信一贯正确，永不犯错误，而其他人只能在不等的差距上近似我们标准的立场。

对重犯现象又有什么办法。我们只得希望往后这种重犯现象会减少。更主要的是，整个调查进程将取决于我们自己，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A.奥加涅祥：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在返回欧洲事务问题时，想了解一下俄罗斯与欧洲就签证制度问题的谈判有何进展？

A.杰尼索夫：我想指出，自2006年俄罗斯同欧盟国家间签署了简化签证手续协议以来，领取前往欧洲国家的签证要方便得多。此外，签证时效加长，扩大了优惠领取签证人的范围。

协议规定上也有一定的进展。比如，一个人首次上欧洲国家，他领取的是一次性签证。下一次，如在欧洲无犯罪记录的话，他能更容易领取两次性往返签证，随后能领取多次性往返签证。

有关签证免签制度，我们不止一次说过，我们已做好准备，但我们的欧洲伙伴还未有这种准备。我们再继续进行对话。这不是靠政治解决办法一下子就能取消签证和办妥的事，这是一项费用不小，牵涉到大量综合性手续的工作。其中涉及到双方得确保有可靠的边检，还要签署遣返协议。总而言之，还有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存在。我们还是忍耐点吧。

关键词：非稳定阶段、利比亚、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金砖国家、反导防御系统、签证免签制度。

武克·耶雷米奇

塞尔维亚外交部长



俄罗斯和塞尔维亚：800年的历史

塞尔维亚人的第一位大公斯蒂芬·涅马尼亚向民族赠送了三个儿子。1193年，年满18岁的小儿子拉斯特克同圣阿索斯山的俄罗斯修士相遇。他们离开了塞尔维亚上阿索斯山上的俄罗斯圣潘捷列蒙修道院。在修道院里，拉斯特克决定将自己献身于上帝。不久，俄罗斯修道院院长将年轻的拉斯特克公剃度为修士并予以其萨瓦之名。这一时刻标志了塞尔维亚人的精神复兴，因为，萨瓦将其寻得的塞尔维亚正教会引入了我们的民族意识。

萨瓦很快地意识到建立本国国家机构的意义：他成了我国第一个文字宪法的编者。1219年公布的教会法汇编，又以正教教规汇编著名，成了对整个斯拉夫世界起巨大影响的文件。1274年，俄罗斯正教在弗拉基米尔教会会议上宣布汇编为唯一通过的正教教规汇编。我们两国的教会直至20世纪还继续袭用。

萨瓦写道：“只有连同行善和通过善行，信仰才能拯救我们”。这种高尚气质的相结合奠定了正教斯拉夫人心灵的实质。其联合了塞尔维亚和俄罗斯两个民族，联合为一个代表比一般传统上的融合显示更大的共同的文化。其富有深藏的易于激动的性格，在感情和本能的水平上形成个性，为不变的统一创建永恒的基础。我们两国人民熟知的历来为斯拉夫人理解的“共同”此一术语就意味了这一点。

我们两国人民一贯非常重视艺术。对我们来说，诗歌、文学、音乐、戏剧——是内心的体现，其谐和地编织于我们的民族同一性中。同样，我们以更大的力度珍视曾不止一次守护了我们关系的俄罗斯和塞尔维亚教会。我们共同的信仰还以我们继续在用同一种语言进行祈祷，使用同一的宗教书籍，尊重同一的圣人而加固。4月1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由莫斯科宗主教对外宗教联络部主席沃洛克拉姆斯基都主教伊拉里昂创写的清唱剧“马太受难乐”的首演，成了对我们此兄弟情谊的现实提示。

我们两国的关系具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缅怀为俄罗斯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我国同胞。1345年，塞尔维亚建筑师设计了诺夫哥罗德州科瓦里奥夫主显圣容救世主教堂。1380年塞尔维亚的圣像画家用辉煌的壁画点缀了这座教堂。1404年，塞尔维亚希兰达尔修道院的一名修士被指派在俄罗斯制作一只机械钟。多世纪来，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克塔楼上的钟声成了俄罗斯的主要定时钟。

塞尔维亚记得1690年开始的民族大迁徙时期上万同胞落户在俄罗斯的事件。萨瓦-卢基奇·弗拉基斯拉夫维奇-拉古津斯基公爵就是其中的一人。他在彼得一世这里任职，曾出使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执行外交使命。是他将普希金的曾祖父亚伯拉罕·彼得罗维奇·汉尼拔带到圣彼得堡。但1727年签订的至19世纪中期一直为调节俄中两国关系的恰克图条约使他享有更大的声誉。条约为两个大国确定了边界，而更主要的是俄罗斯在同其它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在通商上予以俄国特惠条件。

另一名俄罗斯的塞尔维亚人是在同拿破仑的著名的战争中起了出色作用的将军——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米洛拉多维奇。为表彰他的功绩，他是俄国第一个被赋予佩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肩章权的人。在军队任期满后任圣彼得堡总督。他以文化活动家的一位最慷慨的庇护者留在同龄人的印象中。

塞尔维亚也非常珍视1727年来到贝尔格莱德并在当地开办了第一所学校的俄罗斯神甫马克西姆·苏沃洛夫。我们满腔热诚地回忆普希金为纪念塞尔维亚第一和第二次起义的领袖——卡拉盖奥尔基和米洛舒公写下的史诗。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人物弗朗斯基的个性，是以作为志愿者参加塞尔维亚人同奥托曼土耳其作战并于1876年牺牲的俄罗斯英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拉耶夫斯基为原型，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俄罗斯在整个历史阶段上，一直是塞尔维亚的忠诚盟友。例如，在我们抵抗土耳其的战争中，俄罗斯予以的支持具有决定性作用。1804年11月，俄罗斯外相亚当·查尔托雷斯基公爵首次在历史上接见了塞尔维亚代表团。在必须与土耳其政府巩固取得的和平时，俄罗斯同样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1830年，在两国建交前8年，俄国执政者中第一个接见塞尔维亚使团的是沙皇尼古拉一世。

在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中，我们都是可靠的盟友。俄罗斯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奥匈帝国1914年夏天侵犯塞尔维亚的回应，这是忘不了的事情。1915年秋，在72岁的国王彼得一世的率领下，已搞得筋疲力尽的我军，不得经过阿尔巴尼亚向伊奥尼亚海进行年久的撤退。1916年1月份，近10万塞尔维亚人来到了极不好客的海岸。再说，英国和法国派船将他们送往安全地方的决定，也是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压力下做出的。沙皇向伦敦和巴黎发去的电文中说：“如果我们的盟友不拯救被围困在阿尔巴尼亚海岸的塞尔维亚军队，俄罗斯将立即退出这场战争”。其结果，塞尔维亚军队得救并疏散到希腊的科孚岛。一年后，重整旗鼓后的军队开始了塞尔维亚解放战。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后，将近10万俄罗斯移民在塞尔维亚找到了自己的新家。其中有 П. 弗兰格尔将军，俄罗斯杜马主席 М. 罗江科(1911-1917 гг.)。应塞尔维亚宗主教德米特里的邀请，以基辅都主教安东·赫拉波维茨基为首的俄罗斯境外东正教全体圣公会被安顿在塞尔维亚的斯列姆斯基-卡尔洛维茨市。前不久被列为圣者的约安·(马克西莫维奇)丘多特沃列茨于1925年念完神学系后，并在1934年被任命为上海主教前，在贝尔格莱德生活了十多年。许多俄罗斯学者、画家和工程师为塞尔维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最显著的是建筑方面。贝尔格莱德的许多美好建筑，包括贝尔格莱德宗主教区、王宫、总参谋部大楼，都是根据俄罗斯建筑师的设计图建造的。在塞尔维亚工作的最有才华的是尼古拉·克拉斯诺夫。于1929年竣工的政府大楼和外交部就是按他的设计图建造。

二战期间，红军为从我国驱赶纳粹予以了重大帮助。2009年10月20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前来参加纪念苏军解放南斯拉夫首都65周年的活动。这一天，他作为第一个外国领导人在国会发表了讲话，并强调这个日子的意义，将其定性为“是我们共同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

六个月后，2010年5月9日，我有幸陪同塔迪奇总统前来莫斯科参加战胜法西斯德国65周年的庆典活动。忠于反法西斯价值观，是我们两国人民意识中特有的。在恐怖的二战期间“轴心”国家及附敌为我们人民造成的损失和带来的痛苦是巨大的，仅是人员损失的数字，就够说明问题。普京总理在访问贝尔格莱德时，也对这些事实予以极大的关注。普京和塔迪奇谈到在21世纪将进一步紧密发展双边关系。

对增加贸易和投资的问题予以了特殊的关注。塔迪奇总统说：“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经济合作上的限制水平”。他强调指出，2009年俄罗斯予以两亿美元的援助，使塞尔维亚挺住了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两国间的双边交流得到显著地增长——去年增长将近25%，我国的出口增长55%。

这些数字还会增长。基于个别项目，即将开始分阶段地落实莫斯科为塞尔维亚基础设施现代化提供8亿美元贷款的建议。其重点将是铁路。

俄罗斯作为塞尔维亚主导经济伙伴的地位，特别体现于我们在能源领域的双边关系上。“天然气工业石油”于2009年购置了原先归国家的我国“НИС”石油公司的一大股票额，并宣布为现代化计划投资5亿欧元，总公司计划在年底再投资5亿欧元。

塞尔维亚参与“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也是我们在能源领域战略伙伴关系的结果。普京总理对我国进行访问时，“天然气工业”的代表在贝尔格莱德确认了经由塞尔维亚境内长达450公里的“南溪”铺设工程将于2015年12月底之前竣工。此项工程将能满足我们消费者对今后几十年的天然气需求。其将为国家确保用于支付过境费的数百万美元的稳定收入。就广义而言，“南溪”有助于中欧天然气供应线路多元化，过境容量的现代化，从而加固老欧洲的能源安全。

另一个将对整个欧洲东南部具有肯定意义的项目，是在塞尔维亚的尼什市要建立的紧急人道援助地方中心。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内务部决定为在极短时间内向遭自然和技术灾害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建立这样一个中心，搞好地区性的配合机制，为救援队员创建条件。中心将成为采取寻找和救援行动，为提供紧急人道援助，疏散居民和抗森林火灾的支柱。预计地区的其它国家也将会参与此项工作，从而使此项目更具有国际性。

我们对地区问题立场的吻合也符合对现代国际生活中更广泛问题上的一致观点。塔迪奇总统和普京总理于今年3月23日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提到我们两国在国际政策的所有领域中达到最高水平的一致性。

塞尔维亚对梅德韦杰夫总统有关签署基于全面的，对欧大西洋和欧亚地区安全不可分割的，对所有人具有法律保障的协议性方式的欧洲安全条约。这符合塞尔维亚于2007年12月表述于国会决议中的严守中立的立场。

我们两国对联合国体系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国际舞台上可行行为的框架是由联合国章程的目标和原则来确定。塞尔维亚视安理会是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担负有主要责任的机构

我们对俄罗斯在我国具有重大价值的问题上——由阿尔巴尼亚民族组成的当局企图分割南部省份的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上予以坚定地支持表示感激。这将是拉夫罗夫外长四月中旬对我国进行访问时要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

就与联合国所有其它成员国一样，保留主权和领土完整具有重大国家利益的意义。我们对代表阿尔巴尼亚民族利益的当局于2008年2月17日分割科索沃的企图持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无论是明的，还是暗的，我们不承认他们单方面宣布的独立宣言。

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国会上发表讲话时，直言不讳地表示，俄罗斯在塞尔维亚涉及的国家利益问题上，将予以塞尔维亚所有必要的援助。数周前，普京总理也重复了这些话。他说，我们的出发点是：符合塞尔维亚利益的一切，符合俄罗斯联邦的利益。

21世纪负有责任政策的基础价值，在于解决民族冲突时放弃单方面的行动。普利什蒂纳的分裂分子当局拒绝了这一原则，为国际关系体系开启了带有不可预测后果的，危险的先例。为了从悬崖边缘后退一步，需要采取强制性地接受办法。

只在妥协原则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将不相容性融为相容性的创造性解决办法。我们就科索沃问题上的政策，始终强调必须争取战略性的妥协。去年9月份国际法庭宣布的磋商性结论，将单方面宣布的独立直接评价为只是“最终确定科索沃地位的企图”。此评价的结果，得到世界对只有对话才是在科索沃取得和平的唯一途径的强烈支持。

谈判在前不久开始进行。如双方示范友好意愿，其能为取得出自所有居民利益的实际措施敞开大门。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对话还具有根据安理会第1244号（1999）的决议，拟定能为各方都接受的全面调解科索沃问题措施创建条件的目的。

任何协议得有安理会的赞同，其在最终确定省份地位问题上起的中心和主导作用，依然具有优先地位。只有这种结果才是合法和稳定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成员国间的分歧能被消除，并为决定自决权学说的框架做努力制定实际方向。

塞尔维亚将照例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来揭示对社会活动家曾被卷入有组织的犯罪和军事罪行的活动，包括对1999年北约进行轰炸前、中和后期贩卖人体器官指控的全部真相。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阐述于不久前的“科索沃无人性的虐待和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报告中。欧洲理事会议会大会基于这份报告通过了决议。我们对俄罗斯在塞尔维亚向安理会提出为进行全面的法律上的调查，建立像以往对前南斯拉夫相关的战争，不分罪犯为冲突的哪一方和其政治角色的特定（ad hoc）机制予以的支持表示感谢。只有始终如一的和经由安理会采取的行动，才能避免在国际法上使用双重标准。

塞尔维亚做出通过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国家的战略决定。“欧洲”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加入欧盟，其首先是构建以现代化和创新为重点的欧洲社会。塞尔维亚同俄罗斯一样加强了对复兴改革精神的关注，而这意味将责任性、透明性和汇报义务作为长期健康民族不可分割的元素。

构建欧洲社会乃是塞尔维亚走向世界繁荣昌盛，理顺家事，确保成就的道路。我想，欧洲的一体化会予以我们间的关系新的规模。这种关系不单纯是为莫斯科在布鲁塞尔拥有自己真正的朋友和获得改善进入全欧市场的环境，同时也为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带来进一步的相互理解与合作。

俄罗斯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指出，俄罗斯人有两个祖国：俄罗斯和欧洲。这种看法同样适应于我们。因为，对我们塞尔维亚人来说，也有两个家：塞尔维亚和欧洲。这种思维方式为加速我们在21世纪的发展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

我深信，两国人民800年来的友好联系，一如既往地将会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看来，没有能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更真挚地表述我们的兄

弟间的联系。他写道，塞尔维亚民族将伟大的俄罗斯精神铭诸肺腑，因为，塞尔维亚土地上渗透了俄罗斯人的血，塞尔维亚的光荣将在此土地上复兴。塞尔维亚人将会永记俄罗斯无私的帮助，记得为塞尔维亚捐躯战场的俄罗斯人并非为了征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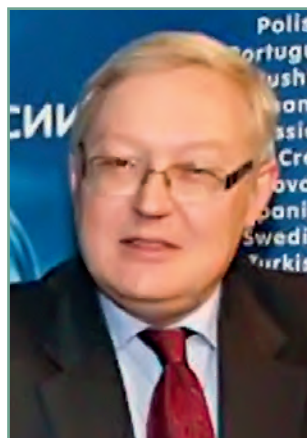
无论世界经历何种转型、改革或是骚乱，塞尔维亚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将犹如多亏阿索斯圣山上俄罗斯修道院院长，使拉斯特克公成为萨瓦修士那一天一样，始终将是稳定的，不可改变的和牢不可破的。

关键词：俄罗斯、塞尔维亚、Д.梅德韦杰夫、Б.塔迪奇。

谢尔盖·里亚布科夫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Sryabkov@mid.ru



俄罗斯-美国： 有关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3条约、 反导防御系统、阿富汗贩毒等问题

转刊“俄罗斯之声”广播公司“与世界面对面”项下的访谈

www.vizavi.ru

阿尔曼·奥加涅祥：2011年首先以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3条约批准进程的结束为标志。莫斯科对美国随附批准的决议有何反应？

谢尔盖·里亚布科夫： 参议院用于审议协议的时间很长，但这也是我们预料的。当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包括现行参议员，不仅一心想对协议某些条款予以自己的解说，而且还准备对内容进行修改时，确实引起我们担忧。好在这事没发生，这也多亏奥巴马政府加大公关力度，劝解那些持有疑虑和反对意见的人信服此文件的重要性和从美国安全利益角度来说的必要性。参与此项工作的有不小的力量：前国务卿、国防部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其中不仅有民主党派人士，也有共和党派。

协议最终予以批准，但同时通过对协议做的一系列解读和对条约意味着什么，政府该如何执行做解释的决议。决议中远非所有条款能为我们接受。其中采取了如果不是重新起草内容的话，那也是为文件协调进

程中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设置一定的工作框架的企图。这种情况引起莫斯科的极大关注，对此进行了分析，杜马议员向外交部提出质问，而我们为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加以评论，提出看法。

A.奥加涅祥：协议本身内容是否保留了？它不能受美国通过的决议侵蚀吧？

C.里亚布科夫：不能。如果美国人从国际法准则和本国立法的角度，采取出于自己对允许限度的理解修改协议内容的途径，实质上将是对协议做出极刑的判决。协议是以双方做出的重大努力，是经过，我强调以下一点，对相互的让步细心衡量和反复琢磨为代价诞生的。协议中的一系列修辞，通过在各级别上数个月的谈判后选用的。其中包括两国总统水平上对选用的修辞进行了讨论，这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事。因此，拆封和对内容进行修改是难以想象的。这种事没有发生，协议原封不动地被保留，并将根据其中所写的一切，所有的纪要和附件进行落实。

取得的这一重大结果，允许俄联邦总统、俄罗斯外交部，在美国参议院通过批准决议后，立即对美国参议员做出的此项决定予以肯定的评价。继之是一个解读的问题，因为文书中的一些修辞，在理论上允许有不同的解读。不过，外交的实质就在于此，旨在从已争取到的为起点向前推进。可以做不同的解读，但需要的只是就这些争议问题寻找一个公分母。

A.奥加涅祥：我们的议员又有何反应？

C.里亚布科夫：也出现十来个要我们的议员做出一定反响的问题。拿前言来说：其中有对为人不鲜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和防御性战略武器相互联系的引文。协议内容中这种相互关系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是为文件工作进程的结束必要的条件和绝对要求。没有这种措词，协议也就不存在。参议员在美国决议中企图将这种受法律制约的相互联系置于疑虑之下。对类似的企图必须要有回应。

协议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不能被肢解，其中的所有元素均受法律约束。

存在像打造非核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前景问题。在对文件进行工作的整个进程中，俄罗斯一方强调，常规武器，即不带核弹头的进攻性战略武器——这是具有高度毁伤能力的武器。不可能在5至一万公里范围远程

判断哪一个具有洲际远程的弹头设置于系统中。美国参议员们要求的实质上是不可遏止地，无限制地发展这种系统。

这同样涉及到全球范围的美俄反导防御系统的部署问题，并同样作为落实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条件表述于协议中。也有在条约生效后自年内开始和俄联邦进行有关战术核武器谈判相关的要求。最后的这项要求同条约对象毫无关系，但相关措辞出现于美国的批准决议中，因此要求予以答复。也就是说，对所有这些和其它一些条款，对我们同美国的对话处在何种地步，应当朝那个方向走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予以另一种解读。有可能是一种用于平衡美国单方面解读的反面解说。

A.奥加涅祥：能不能说两国关系在2010年取得彻底的改善并过渡到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阶段？

C.里亚布科夫：可以肯定地说，两国关系有所改善。至于是否取得原则性的改善，那就得另进行探讨。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没经历说得上两国关系取得稳定和肯定的发展阶段。2010年下半年，我们多次面临了美国以往年惯用的态度对待俄罗斯。这表现在对2008年高加索危机的政治性总结提出的质疑，企图逆转本区域出现两个既成事实的独立国家的进程。就在阿斯塔纳举行的欧安组织峰会进行的前期准备工作上，也同美国人发生过争论。双方继续就人权问题有争议。存在着一些不可能以政治-外交努力来改变或消除的现实问题。但就整体而言，存在肯定的和趋于发展的一面。

我们今年面临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大任务。顺便说一句，美国政府对此项任务持有负责的态度，懂得其重要性并努力予以我们协助。去年年底，美国国会几乎无声地批准了同俄罗斯在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进行合作的协议。现在，我们已结束了通过照会交换开始执行协议的程序。由于多年来缺乏此项协议，我们无法同美国，就各个方面来说，在如此重要的领域搞好合作关系，包括创新领域。

去年，两国双边关系中推广了新的经济议事日程，俄美从事创新项目的风险公司间频频互访，进行接触。对斯科尔科沃项目出现了巨大兴趣，很多像能效、新宇宙项目等方面，仅是由商界之间的相互接触进行落实。这种肯定趋势，不能说像滚雪球来的那么快，但还是像钟乳石，一周接一周地在慢慢增长。往年的累赘也还存在，应当在目前较顺利的情况下，一起来摆脱它。

A.奥加涅祥：国会举行选举后，奥巴马丧失了部分政治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在通过决定时的束缚力有多大？

C.里亚布科夫：任何美国总统在自己第二任期的下半期会遇到党派之间斗争加剧的现象。这是美国政治内部的一种生活。对美国现行政府来说，党派之间的矛盾、斗争的激化，比预期的出现要早。但2010年11月2日举行的国会选举，反对派原则上并没取得决定性胜利。共和党只控制了下院，在参议院增加了几个席位。尽管如此，选举后的国会内部对抗还是加剧。我们认为，斗争的尖锐性在新一届参议院和众议院开始工作后还会继续。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特别是与外部世界的条约关系问题上，被迫与国会，首先是与参议院进行紧密配合。其中也包括对俄罗斯的事务，比如，取消杰克逊-文尼克修正案问题上。有关事项谈论已很久，但无进展。许多参议员说，有关取消此修正案问题本身几乎成了参议员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公决

至于内部课题，税务等其它问题，确实取得一定的妥协。美国政府采取了中派的平衡路线。我将其同1994年克林顿政府采取的，实质上类似做法相比。其拟定了一揽子针对启发美国政治中心的好感，减少对具体党派的依赖，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大部分居民认为是最佳的经济解决办法。有可能我们能在奥巴马今后路线中发现类似的倾向。

A.奥加涅祥：我们回过来谈谈杰克逊-文尼克的修正案。美国是否准备克服俄-美关系上这种时代错乱的现象？

C.里亚布科夫：美国政府还没有做出以立法形式取消此修正案的倡议。我们并不准备将这种状态戏剧化。这里指的是已有30年历史的事件。我提示一下，修正案是对苏联限制犹太人移居以色列为借口通过的。苏联早已不存在，所有那些当年不准出境的犹太人也早已出境。我们同以色列之间又实行相互往来的免签制度。但具有生命力的杰克逊-文尼克修正案还健在，一旦有什么问题，他就像幽魂抓住新一代人的手不让干活。这确实是美国人的问题。我去年与美国犹太组织代表举行过会晤，因此知道俄罗斯的犹太组织代表同美国伙伴进行过接触，并向他们解释了这种状态的荒诞性。看来，美国政治机器的构造就是如此，既然有限制，其实质上是一种对我国采取歧视性的修正案，为不取消此修正

案，可以找出更多同具体课题不相关的其它理由。希望健全的思想最终能占居上风，并能很快的显示出这一点。

A.奥加涅祥：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3条约会被批准，随后又怎样呢？

C.里亚布科夫：随后条约就生效，并就其将如何运作予以关注。至于今后的步骤，我们同美国进行讨论的议程中，包括战略稳定所有方面的问题。在此，我将反导防御系统问题提上首位，并再次将其注为条约中表述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和反导防御系统的相互联系。在美国增强反导防御系统数量和质量的条件下，上述条约的命运也将会给打上问号。条约有效期为十年，但其是否能持续运作，我们是否就可能退出此项条约通过某种决定，这将取决于美国在反导防御系统领域执行的政策。

我们有许多和美国进行强化性的讨论和研究的内容。

在常规武器领域中，我们应当朝恢复欧洲监督制度生命力的方向推进。这是加强共同安全和战略稳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核武器在某种程度上是常规武器领域失衡的补偿器。世界许多国家正是抱着这种态度对待此问题。

我们在国家杜马全体会议上对文件进行讨论之前的听证会上，就遇到议员提出美国文件中怎么会将其盟友，如英国、法国拥有的核武库考虑在内的众多问题。按条约允许的核弹头和运载手段水平越低，其它国家的相应潜力就拥有更大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成为今后削减核武器上任何重要步骤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为此需要做大量工作。我深信，我们今后会反复地进行讨论。

A.奥加涅祥：在里斯本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建立共同的分区反导防御系统的建议。俄-美在今后可能的让步上将起何作用，同美国就此问题的双边磋商是否已开始

C.里亚布科夫：就此问题同美国进行的磋商未停止过。这种磋商在不同的渠道进行着紧张的工作，不仅是外交部，军事部门的同事也在积极地与美国伙伴进行工作。俄罗斯联邦总统在里斯本阐述的欧洲反导防御系统的思想，原则上是很清楚，并就我的看法，对伙伴应能有吸引力。我们提议建立自大西洋到乌拉尔山周边统一的导弹防御系统。我国常驻北约代表罗戈津也多次引用过有关两个骑士背对背站的极好的隐喻。

指挥环节，决策机制的责任性——这一切，在具有政治意志的情况下，能予以讨论和解决。现在需要理解的是，我们的伙伴是否有在

平等，真正的伙伴关系基础上开始与俄罗斯就这种布局进行讨论的准备。对导弹的挑战和威胁的评估各有不同，但取代我国总统提出的建议是——建立以美国系统为主，吸纳美国北约盟友中一些手段可能性的北约反导防御系统。仅是这一点，此系统就能潜在地针对俄罗斯联邦。其在构筑上能在某种程度削弱俄罗斯的战略核潜力，而这又同我们的安全利益是相矛盾的。

我再重复一次，问题不在于即刻进行谁来负责哪一个分区，如何进行信息交换这类反导防御系统具体构建的谈判。当然，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不能将其搁置一边。但在本阶段上，重要的是了解我们毗邻的北约盟友的政治立场，首先又是我们美国伙伴是否有讨论这种新模式的准备。

A.奥加涅祥：就英国和法国的核潜力，我们今天确实能说他们对俄罗斯不构成威胁吗？

C.里亚布科夫：我们早就声明俄罗斯-北约互不为敌，这一点也在正式文件予以表述。俄罗斯-北约理事会在里斯本峰会上就此敏感领域打上了句号。当然，意向是一回事，潜力是另一回事。我们外交官在进行相应谈判，或是就此重要问题进行磋商时，也凭借这种逻辑。我们，至少在本阶段上，没有建立类似美国通过的和已在落实的分阶段地适应增强反导防御系统领域能力的路线计划。对我们来说，除了就梅德韦杰夫总统推出的建议外，还有何种选择？只有根据实况变化做决定。

当然，这种事态的发展无利于我们，并将意味紧张的加剧。我国领导人也多次警告过，如果在寻找反导防御系统问题的相互理解上未能有进展，那么，在缺乏伙伴关系的合作基础情况下，我们除了做出增强进攻性武器决定外，也就无其它选择。这完全不是希望采纳的做法。正因为此，我们声明要进行合作，但这必须是平等的合作，尽管我们对美国盟友拥有的潜力也不能抽象化。

A.奥加涅祥：俄美在调解朝鲜半岛问题上能起什么样的作用？遗憾的是，就俄罗斯提倡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的会议上没能取得妥协。俄罗斯的立场是否有希望会被华盛顿理解？

C.里亚布科夫：就朝鲜半岛的局势问题，我们同美国就像同“六方”会谈的各方一样，在各项问题上保持着紧密接触。您说得对，俄美就此问题的态度不完全一致。这在颇大程度上由美国与日本和韩国间的盟友

义务所决定的。但关键问题还是在于必须为缓解朝鲜半岛局势采取紧急措施。俄罗斯为避免新的紧张局面出现，做出很大的努力。

为根据俄罗斯提倡举行安理会会议进行的筹备工作期间，同美国人一直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当然，从文件和做出的具体决定的角度来看，并非理想，但这不意味我们就此感到失望。这就是不断进行接触和紧密合作的范例之一。

A.奥加涅祥：下面谈谈金砖四国。有时能听到以下一种说法，将远离各自的国家联合为一个联合体好像有点人为地做法。现在又说南非也将加入此俱乐部。是不是联合金砖国家的是另一种，而不是以地理上的毗邻为联合目标吧？

C.里亚布科夫：联合体的形式有不少，我们也不能说某种形式属于一成不变的。这我们从许多联合体，特别是世界各地的地区联合体的演进过程中能看到。俄罗斯不仅参与金砖四国，还是没有巴西加入的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三国联合体。此三国联合体中也有自己极其有意思和内容丰富的议事日程。至于金砖四国，仅是罗列其进行的活动，就显示了自在叶卡捷琳堡举行的首次金砖国家峰会的两年多来走过的显著路程

就经济而言，各个国家确实不同，但对所有金砖四国来说，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在对改革布雷顿森林金融机构，对克服全球金融-经济后果领域最佳方针问题上持有近似的立场。金砖四国就粮食安全，创新交流领域也愈加显示自己。巴西在金砖四国中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某些领域，我甚至称他为我们合作上的火车头。巴西领导在联合体去年举行的巴西四月峰会上，示范了其如何积极地工作和重视此形式。

俄罗斯对南非共和国加入金砖四国表示欢迎。此重要的国际事件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由俄罗斯、巴西、印度和中国领导人做出联合决定。南非的加入——“20国集团”的积极参与国，非洲的经济大国——不仅能加重联合体经济“分量”的总合，同时促使了金砖国家框架内互利性务实合作的扩大可能性。接纳南非为金砖国家会员国符合具有前景的世界发展趋势，包括建立多中心国际体系。

A.奥加涅祥：近些年来，拉美国家在国际事务上表现了积极性和独立性。俄罗斯——拉美国家过去一年关系上有哪引人注目的地方？2011年的议事日程上还有那些重要的事？

C.里亚布科夫：我就不援引何时进行何种接触、互访一类令大家厌倦的统计数据，但得指出，各级水平上的接触在不断地进行和发展。拉美国家领导人对俄罗斯进行了重要访问，包括委内瑞拉总统10月份对我国进行的令人难忘的访问。俄罗斯总统去年也访问了巴西和阿根廷。俄联邦总理同样访问了拉美。拉美国家的外长同我国外长不断保持接触。拉夫罗夫外长也对一系列拉美国家进行了访问。

一些以往不活跃的国家也表现出对接触抱有的巨大兴趣。其中有中美国家、安第斯共同市场国家。比如，在秘鲁刚刚举行了卓有成效的政府间委员会会议。接下来又将是同尼加拉瓜进行的例行接触。

在各领域中签署的协议也不少，其中包括经济上的协议，甚至有在海关流通商品价格上进行合作的协议。圣彼得堡和瓜亚基尔港之间开辟了新的集装箱直达海运航线，还不是所有人知道有厄瓜多尔这么一个城市。这说明存在经济上的衬垫，我不准备将其叫做基础，否则就有点夸大，但通过商业上的接触，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基础开始显影。而且，这不只是国家间进行的合作。

有关签证相互免签的问题，我也说了不少。这类免签协议越来越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有不错的进展。今年安排了一系列互访计划，其中包括继续庆祝拉美一系列国家独立200周年的活动。计划安排中有文化活动，档案资料展。

与我国海外同胞也在进行工作，我们在出版拉美各国俄罗斯人事迹的书籍。拉美伙伴就俄罗斯旅游者对墨西哥和多米尼加旅游的增多，自然表示满意。

我们对去年遭受旱灾、水灾和地震各种自然灾害的区域国家予以了重大援助。如果将负变正的话，这也是一个实质性问题，反映了此远处区域的国家对我们来说并不远。

A.奥加涅祥：您如何评价阿富汗局势？

C.里亚布科夫：我们希望阿富汗的稳定将能持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安全合作力量的驻留，是一种肯定现象。在另一种评估情况下，我们也不会同北约签署其用于安全力量的非军用物资双向途经我国境内的协议，不会同美国、德国、西班牙、等参加联盟军的其它国家签署双边协议。俄罗斯联邦参加不少针对改善阿富汗局势的项目：培训人

才，包括打击贩毒的专门人员，提供包括向阿富汗强力部门的协助。所有这一切是为阿富汗的稳定进行的共同事业。

我们的共同任务在于使阿富汗尽快成为一个独立、稳定的国家，使威胁不再出自其领土，首先是像，对我们来说，尖锐的毒品威胁。就此问题，从北约伙伴对挑战的深度和为克服威胁必须进行全面动员的认识角度来说，我们还未能与北约搞好有效合作

A.奥加涅祥：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楚尔金就阿富汗一些地区未消灭的武装分子被挤兑于中亚的边境表示担忧，这也意味逼近我们的边境吗？

C.里亚布科夫：这也是一个相对地来说新显示的问题。我们公开表示对此感到不安。我们不仅看到其对我国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对于阿富汗毗邻国家、中亚国家和我们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盟友构成的威胁。我们认为，合作的可能性多余我们现在进行的合作。与此同时，我们的强力部门和对口部门正在这个方向上进行合作。存在一些同加固边境，增强我们盟友对本国边境的监控问题。除此，这也是同美国和国际安全合作力量进行直接对话的课题。

关键词：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3、欧洲反导防御系统思想、杰克孙-文尼克修正案。

阿列克谢·博罗达夫金

俄罗斯外交部副外长

aborodavkin@mid.ru



俄罗斯东方外交走向：总结和前景

2010年已过去。就囊括了自伊朗至日本及太平洋南部岛屿的亚太地区而言，这是蓬勃发展、克服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巩固区域增长和影响力及多边合作领域取得进展的一年。

与此同时，对亚太地区去年发生的众多事件，不能不感到忧虑。这首先涉及到年久及复发性的争议和冲突，近十年来出现的新挑战与威胁，以及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次区域国家间继续存在发展上差距的现象。换句话说，地区惊人的成就依然与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相接合。

去年是俄罗斯东方外交政策的一个紧张，但富有成效的一年。我国亚太区域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对我国的未来同全球发展“重心”近年已移至此区域的国家进行合作的不可分割性的理解，对俄罗斯经济别无选择地，势必融入此正在增速的一体化进程区域的认识上。可靠保障我国东部疆域安全的必要性，为我国综合性地进行现代化改革，为西伯利亚和远东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亚太区域的贸易、财经、投资、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潜力，决定了对亚太区域的高度关注。

一个重要原则问题是，我们向伙伴提出了肯定的、联合性的议事日程。俄罗斯没有寻求单方面的优势，没有借助存在的矛盾为自己张目。俄罗斯通过与所有抱有迎面合作兴趣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来起到自己的

作用。提高我国在亚太地区作为战略稳定和经济稳固发展因素的保障就寓于此。

去年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是俄罗斯同亚洲有影响力的国家就安全问题上的战略协作关系得到显著增强。我们联同伙伴防范了朝鲜和韩国之间危险的军政危机演变为全面的军事冲突，并开始为恢复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谈判创建条件。我们与中东和南亚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威胁的合作关系得到巩固。俄罗斯致力促使消除围绕伊朗核计划的紧张局势，予以其更大的透明度和可控性。

当然，亚太区域所有这些和其它问题不因此消失。但还是克制了其负面影响，其中也靠俄罗斯的积极外交活动

2010年向我们提示不能忘记历史：秋天之际，我们与伙伴们共同庆祝了远东战争的胜利和二战结束65周年。陈述于联合国宪章的战争结果，包括战后的领土，应当由包括亚太区域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予以承认和尊重。这一思想清晰地体现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10年9月27日就二战结束65周年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我们同亚洲国家的经贸联系超越了危机前的指标。俄罗斯同亚太国家在2010年头十个月的总贸易额超过1200亿美元，与2009年同比增长35%。同其中一些伙伴贸易关系的发展，更是令人可观：预计，2010年俄罗斯同中国和韩国的贸易额，与2009年相比将增长约一倍。总体上，2001年我国同亚太区域国家的贸易额同世界其它区域相比，以超前速度增长。

在东方，俄罗斯开始同一系列技术先进国家形成现代化改革联盟。韩国、中国、日本、印度、新加坡对参与俄罗斯“斯科尔科沃”项目抱有的兴趣就是一例。

在同亚太区域国家和邻国进行的合作上，成功地落实了一些大型的双边经济项目。俄-中首条斯科沃罗迪诺-大庆输油管道已开始输油。在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同中国、印度、伊朗、越南、蒙古、澳大利亚、日本和孟加拉进行的合作得到迅速发展。同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在宇宙领域的合作也在扩大。俄罗斯和印度签署了联合利用俄罗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格洛纳斯）的协议。自萨哈林气田向韩国和日本

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量在不断增长。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和上海股市交易所启动人民币和卢布的双汇挂牌交易，启动了双边贸易向用本币进行结算的过渡，是俄中经贸、金融合作达到高度合作水平又一例证。

海关联盟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新西兰之间签署建立自由贸易区协议启动的谈判，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此旗舰项目的使命，在顾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景下，推动俄罗斯融入亚太区域自由化贸易和投资进程。

亚洲国家向俄罗斯经济的直接投资有显著地增长。这里不仅是指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投资，其中也包括对我国欧洲部分的投资。比如，日本“小松”建筑专用机械公司在雅罗斯拉夫尔已建厂投产，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在圣彼得堡也已投产。东方开始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加工业进行投资。我们亚太区域的伙伴对俄罗斯2011-2013年的私有化计划都抱有高度兴趣。

就同东方邻国的文化和人文接触来说，那么，去年，这种接触比往年更频繁，内容更丰富。就俄罗斯举办的汉语年来说，在其框架内进行了200多项各种活动。俄罗斯及印度签署了两国间2010-2012年的文化交流计划。在区域国家开设了并继续在开设新的俄罗斯文化和科学中心。在上合组织大学项目框架内，根据上合组织成员国62所重点大学协调一致的教学大纲开始培养首批硕士生。在莫斯科举行了东盟中心的落成仪式。一年内，在河内、胡志明、上海和大连市创办了四个新的“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同亚太区域国家的旅游交流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去年，在亚太区域国家修建了俄罗斯东正教新教堂一事，有令人深深的满足感。

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多边机构。俄罗斯联同美国参与了东亚峰会机制——联合了亚太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和有能力寻找解决安全和区域经济发展基本问题的论坛。

2010年显示了上海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巩固。俄罗斯是该组织的创始国之一。上合组织，特别是出自其成员国将扩大前景的考虑，成为多极世界秩序的形成和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构筑上变化的重要支柱之一。

我们在“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论坛的工作，主要将精力集中于联合伙伴就亚太区域贸易和投资活动进一步自由化做的努力，从而促使俄罗斯融入区域经贸联系体系，首先是出自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社会经济发展利益的考虑。现在已开始为俄罗斯2012年轮值为亚太经合组织主席做准备。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同东盟——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中作为系统形成元素的权威组织——关系上的重要阶段。2010年10月30日，在河内举行了俄罗斯-东盟的第二次峰会。此届峰会将我国同东盟的对话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并确定了今后发展的道路。

俄罗斯-印度-中国(РИК)形式的合作有了新的推动力。2010年11月在中国武汉举行的三国外长会晤，显示了俄印中作为协调就地区迫切问题上的立场和区段务实合作平台的有效机制，在继续取得完善。

“欧亚论坛”接纳我国为成员国的决定，是对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和欧洲-大西洋间起独特桥梁的作用的承认。“欧亚论坛”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两大陆间的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我们愿意为此项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过去的一年，以俄中就完善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构筑联合推出的重要外交政策的提倡为标志。此倡议的实质在于：使区域国家在相互关系上出自对安全不可分割性的认识，放弃借助他人的安全来巩固自己安全的企图。我们深信，借助这种新的保障亚太区域安全的立场，可以摆脱冷战的对峙性遗产，阻止在区域出现对亚太地区国家一体化的共同发展前景构成威胁的新的划界。

许多亚太地区国家分享这种哲学思想。印度已表示支持在区域建立基于通行的国际法原则，信任和开放性，构建新的安全与合作的主张。东盟国家也表示赞同这种立场，其它国家也做出了肯定的反应。希望就此迫切课题的对话将在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АРФ)、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СМОА плюс»)和其它地区组织框架内会继续下去。对亚太地区安全构思的研究，将能促成专家共同体作为，例如，通过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АТССБ)和“香格里拉对话”大会来实现的“第二条跑道”的形式。

总体上，2010年，俄罗斯外交政策在亚洲方位留下了肯定的行迹。根据梅德韦杰夫总统2010年7月2日在哈巴罗夫斯克就远东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巩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地位问题举行的会议结果授予的委托，俄罗斯在转身“面向东方”的努力，开始带来实际结果。

这种针对性的、有系统的工作，今年在联邦执行和立法机构，各联邦主体、俄罗斯商界、社会和专家的参与下将继续积极地进行下去。

关键词：亚太地区、俄罗斯东方取向的对外政策、东盟、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欧大西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国际生活

总编一栏



阿尔曼·奥加涅祥：

“……但因危机带有共同性，“前富人”也能归附中等阶级、贫困者和移民的不满情绪，从而导致局势的恶化，尽管他们的抵抗不一定是直接举行街头抗议。原因在于危机使名为“金十亿”的又一幻影消散。今天没人谈起，甚至都不考虑物质极致能为人类七分之一的人带来享受的可能性。今天，在最佳的情况下，说得也是“金”十亿而已，甚至更少。超级富翁在天下的位置越来越少，百万富翁面临的又一浪破产潮势，看来也即将袭来。”

阿尔曼·奥加涅祥

“国际生活”杂志总编

中等阶级的葬礼，或“金十亿” 的末日

当今的危机，跟任何危机一样，使许多宿愿破灭。但是，自要饭的到显贵这样的所有阶级和阶层，无例外地受到这次规模性破坏力影响的现象，还是首次。我们得感谢全球化。但也不仅感谢它一个。还未曾有类似的危机降临过水平如此高的物质福利社会，就算不是“全体，那也是普遍幸福的”社会及可能性。

尽管是紧张的冷战年代，但有可能也多愧于它，战后独有的几十年稳定导致了技术和消费热的空前增长。中等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开始吸入远在富山著名“预言”出现前的“历史的终结”幻影气氛。

工业时代为自己附带豢养了以不成比膨胀的，使生产和消费不可制衡的增长再也无法思议没有贷款的金融-银行资本为代表的“掘墓人”。有意思的是，在危机初期，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说，当今的危机，实质上是公司向银行宣战。特权阶层出于自保地位的惯性，倒向银行一边向其输钱，即刻，新的震荡潮势的幽灵显示了自己。

今天存在的一个明显问题是：上层无法照旧执政，下层不愿照新生活。大家能看出，这完全不符合马列主义的经典公式，至于其“革命性”，有未来展示。但面临即将到来的社会风暴的恐怖症状已暴露。7月

初，“华尔街日报”公布的民测结果表明，94%的百万富翁担心“街头暴力”。8月份，伦敦街上发生了冲突事件。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纳欧米·克莱恩在“卫报”上撰文写道：“有人老是不停地向我们说，英国发生的混乱不带有政治性质，但闹事者心里明白，这些特权早就存在互有所需的关系，并靠他人来支付账单”。她提示了有关2001年阿根廷发生的事件，当时，愤怒的居民砸毁了外国人开的高档商店，劫走他们已再也买不起的服装、家电、食品……这些人被叫做“背袋贩子”，这个术语具有政治含义，“因为，这个术语用于针对那些在施行腐败性私有化后将自己的钱财藏于离岸中心，然后向居民开出要其勒紧裤腰账单的人”。政府宣布的“‘戒严状态’也不起作用，阿根廷人推翻了政府”。克莱恩激愤地说，“卡梅伦对我们说：要痛斥类似的行为，似乎就没有过向破产银行进行输血和支付空前奖金一回事”。

大洋彼岸发出呼声的同一性，令人惊讶。参议员贝尔尼·桑德尔斯在发表的专门声明中说：“我们是在同为有钱有势人的社会主义打交道。对其他人则说：随你们的便，爱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要走自力更生的路”。这是参议员对由奥巴马总统下达指示对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进行有史以来首次审计的初步结果做出的反应。

三年来，数以亿万计美元的财政援助只提供予大银行的狭小圈子，而且还极为保密。就为什么是这一方，而不是另一方得到援助的问题，国库也没能做任何解释。经过长期的诉争后，美国彭博咨询公司根据新闻自由法从联邦储备系统那里获得29346页的文件，公司宣布说，某些秘密援助的受益人曾公开声明过，他们自己有一笔可观的资金。

审计结果还揭示了其它事实，参议员桑德尔斯就此加以评论说：“任何一个在公司就职，得到联邦储备系统直接财政支持的人，不能同时为董事会成员或是该组织的工作人员”。

在此背景下，特权阶层不仅很难同最贫困阶层，就是同中等阶级也很难就显著下降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质量缔结节制性的社会契约。其实，世界特权目前也没有其它“储备”可说。据“HEOKOH”公司领导人M.哈津的看法，近30年来，根据里根经济学，中等阶级不是按其收入，而按其消费标准来定，其中大部分又借助贷款进行消费。“在5-8年内，中等阶级作为一种形式将趋于消亡，但那些今天被列为中等阶层的人永远不会对他们丧失的一切表示宽恕”。看来，用强硬手法惩治骚乱者，

将他们拖出家门带上法庭，女子因盗窃两条短裤被判处五年徒刑，从卡梅伦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是对的。

但因危机带有共同性，“前富人”也能归附中等阶级、贫困者和移民的不满情绪，从而导致局势的恶化，尽管他们的抵抗不一定是直接举行街头抗议。原因在于危机使名为“金十亿”的又一幻影消散。今天没人谈起，甚至都不考虑物质极致能为人类七分之一的人带来享受的可能性。今天，在最佳的情况下，说得也是“金”十亿而已，甚至更少。超级富翁在天下的位置越来越少，百万富翁面临的又一浪破产潮势，看来也即将袭来。

往年，萨瓦·莫罗佐夫对俄罗斯革命者的支持，被许多人视为是古怪行为。但没人使萨瓦破产。如果有呢？萨瓦真是够聪明的，但今天的一些人也不比他笨。那么，是否未来的导演拥有过余广的潜在“社会基层”呢？看，经验丰富的破产富翁领袖、破落的“中产阶级”和不满情绪接近沸腾的穷人、移民及青年，真是人才俱全。这是否是一种过猛的爆轰剂？

关键词：世界经济危机、“金十亿”、美国中产阶级。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国际生活

世界中国

阿列克谢·梅什科夫:

“.....今年俄罗斯和意大利领导人的会晤有鲜明的文化色彩，因为两国在举行意大利俄罗斯文化与语言年和俄罗斯意大利文化语言年。仅官方活动就有550多个的计划的规模本身就证明文化和人文联系在俄罗斯和意大利关系上的意义。如果没有两国人民相互关系的深刻的，真正历史性的传统，组织和举行这些活动是不可能的。”

谢尔盖·尼古拉耶夫:

“.....西方专家们进行的补充调查表明里海的确储藏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这种评价已在1997年对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汇报。美国已把里海的碳氢化合物看作重要的因素，可以解决减少对海湾国家的石油进口依赖性。当时里海地区就被纳入美国利益范围。”

米哈伊尔·马约罗夫:

“.....历史主要不是教师，而是保育员，因为它的职责不在于行动的指南，而在于使人认识过去并和现在的现象与事件对比，暴露许多现代进程的实质。今天欧洲出现的一切是对此很好的证据。”

阿列克谢·梅什科夫

俄罗斯联邦驻意大利共和国和圣马力诺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rusembassy@libero.it



俄罗斯-意大利文化合作： 历史和现代

今天意大利是俄罗斯在欧洲和全世界最重要的伙伴之一。两国实际上搞好了并在发展从经贸到文化-人文等所有各方面的协作。双方对世界上大部份问题的立场都接近或吻合。两国是“八大国”和“二十国”的积极参加者。

尽管有世界经济危机，欧元区的萧条和财政不稳定的继续，意大利仍保持着俄罗斯优先重要的经贸伙伴的地位。我们克服了2008-2009年的不良趋势，恢复了贸易额的增长。2010年它达到了368亿美元，比“危机”的2009年增加了11, 5%。今年也保持着良好的情况。意大利仍然是我们在世界上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而且俄罗斯和意大利实际上已开始建立互利的现代化联盟。

总的来说，俄罗斯和意大利优先伙伴关系的理论并非漂亮话，而是我们实际的关系。这一年远未结束，而俄罗斯和意大利国家领导人已不止一次会晤。仅提两个例子：今年二月16日在罗马举行了俄罗斯总统Д.А.梅德韦杰夫和意大利共和国总统П.К.纳波利塔诺与部长会议主席С.别卢斯科尼的谈判，就双方和国际议事日程的广泛问题交换了意见。梅德韦杰夫还参加了今年六月在罗马举行的意大利统一150周年的隆重

庆祝仪式。在和ДЖ.纳波利塔诺与С.别卢斯科尼的交谈过程中及时地对国际生活的较“热”的问题对照了立场，讨论了文化和人文协作的问题。到年底还将举行几次双方最高和和高水平的重要活动。

当然，今年俄罗斯和意大利领导人的会晤有鲜明的文化色彩，因为两国在举行意大利俄罗斯文化与语言年和俄罗斯意大利文化语言年。仅官方活动就有550多个的计划的规模本身就证明文化和人文联系在俄罗斯和意大利关系上的意义。如果没有两国人民相互关系的深刻的，真正历史性的传统，组织和举行这些活动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和意大利文件化艺术方面的联系有许多世纪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两国人民的始于同一个拜占庭根源的精神共同点帮助了它们的发展。这种情况从一开始就使意大利处于比那些和俄罗斯文化根源没有共同点的欧洲其他国家较优越的境地。尽管俄罗斯和意大利的文化传统在许多世纪历史性地各自平行发展，它们之间有不少共同之处。

俄罗斯和意大利还在XV世纪就已在实用方面-。堡垒和城市建筑方面进行接触。意大利建筑家们对俄罗斯城市建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初是莫斯科，后来俄罗斯其他城市也聘请意大利建筑家前来创作。其中包括彼得·罗索拉里和亚里士多德·菲奥拉万蒂。这些大师参加了建筑杰出作品的建设，为俄罗斯物质文明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大师亚里士多德·菲奥拉万蒂在来莫斯科之前除了在自己故乡外，在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尼阿波尔等意大利城市从事工程建筑活动。1475年他拒绝了土耳其苏丹的邀请，和俄罗斯大使谢缅·托尔布济内伊一起来到莫斯科，在那里受委托建设首都的主要教堂-圣母升天大教堂（1475-1479年）。在筹备工作期间他参观了弗拉基米尔和其他古俄罗斯城市，远游了北方，直到索洛韦茨克岛。以后莫斯科公爵伊万III瓦西里耶维奇还利用了他的军事工程师的天才。后来马克·弗里亚津、安东尼奥·索拉里、阿列维兹·诺维伊也在莫斯科工作过，建设了宫殿，包括保存至今的多棱角教堂、阿尔罕格尔斯科教堂，还有当时一流的城堡建筑物。

在不断扩大的文化、政治、外交接触的基础上，意大利的作品中出现莫斯科和俄罗斯的形象，而俄罗斯的文化纪念物中也越来越常出现意大利的形象。1478年A.孔塔里尼关于波斯和俄罗斯旅游的著作在俄罗斯问世。意大利外交官友善地描写了大公爵伊万 III 瓦西里耶维奇的宫廷生

活，他不止一次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各院和后者进行了交谈。这位威尼斯人周围的俄罗斯人的形象也很动人，他在这个陌生的国家中常常得到他们的帮助。

罗西和莫斯科不仅在西欧专门的历史地理书籍中，而且在文艺作品中出现，例如意大利诗人马捷奥·玛里·博亚多的“心爱的奥兰多”中。俄罗斯XV世纪的文学中出有描写外国形象的作品。关于俄罗斯代表团在1438年-1439年旅游佛罗伦萨大教堂的作品反映了和欧洲不同人民代表的接触。它们的参加者描绘了对不同城市和国家的商务或其他目的旅行，有时是短文，有时是广泛传播的作品。

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偶尔性的接触在彼得大帝改革时代结束。彼得大帝进行的文化变革成了欧洲文明发展历史的空前现象。俄罗斯不仅改变了俄国国家，使巨大国家生活现代化，而且根本改变了俄罗斯艺术的课题和语言。原来处于世界文化进程边缘的俄罗斯在彼得大帝之后很快地和主要的活动者拉平，并在一个半世纪内进入欧洲文化时髦创造者之列。

彼得大帝对意大利的兴趣巨大。还在1698年作为俄罗斯代表团成员访问欧洲时就曾打算去威尼斯，但因俄罗斯国内局势复杂而没能如愿。然而沙皇在国内对遥远的意大利的研究也取得了成果。正是彼得大帝时期新的首都-圣彼得堡成为俄罗斯的“最意大利”的城市。从阿本宁为圣彼得堡夏宫运来了按沙皇的描绘制造的雕像，彼得大帝聘请的建筑家多缅科·特列济尼奠定了城市的第一个城墙并建成了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克堡。XVIII世纪来到俄罗斯的安东尼奥·里纳尔迪在叶卡捷琳娜II时期成了她的帝国首都的主要建筑师，建设成了著名的大理石宫。正如冬宫建设者巴托洛梅奥·拉斯特列利所说的那样，所有的意大利建设筑家都为“全俄罗斯统一的光荣”而做出了努力。

到XVIII世纪末圣彼得堡已形成了雄伟而美丽的形象。下一个世纪初的建筑风格被称为“高古典”或“帝国”。而卡洛·罗西成了它的最鲜明和杰出的代表。依靠他的努力，宫殿和参议院广场有了今天这样的形象，建成了艺术广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广场。

今天涅瓦河上的城市的和谐而精致的中心举世闻名。圣彼得堡中心部份华丽而雄伟的宫殿、公园、城郊的宫殿综合体-很多是意大利建筑家们的创造。北都一个中心街道名为意大利街。拉斯特列利、罗西、特列济尼、里纳尔特、克瓦连吉的名字用金字写在俄罗斯建筑历史上。他们不

仅留下了使他们永垂不朽宏伟的创造，而且留下了继续工作，珍惜地保持他们奠定的传统的学生。

XVIII世纪中期开始了双方音乐和戏剧的联系。在俄罗斯的剧院里有相当多意大利的作曲家、芭蕾舞演员和歌唱家。前来俄罗斯的有个别的艺术活动家，也有团体。当时意大利代表被看作是艺术方面的某种质量标准。对他们的赏识使欧洲其他国家的某些演员来访时也专门为自己起了意大利笔名。

意大利音乐剧院对俄罗斯艺术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这在意大利也留下了痕迹。例如，1787-1790年间在尼阿波利问世的彼德罗·辛奥列利的著作“古代和现代戏剧的关键历史”中评述了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出现，对读者叙述了它的头一个著名戏剧家-A.П.苏马罗科夫的创作。

XIX世纪上半期意大利著名的演员们-女歌唱家朱迪塔·帕斯塔，歌唱家安东尼奥和萨尔瓦多·塔姆布里尼、芭蕾舞演员卡洛塔·格里济经常在俄罗斯演出。XIX世纪下半期初阿杰拉伊塔·里斯托里和阿杰林的话剧演员们继续了到俄罗斯表演和举行音乐会的传统。1860年意大利的剧团为彼得堡大学的大学生们举行了音乐会。1863-1865年间建立了俄罗斯合唱团和意大利歌剧团之间的合作并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1870年在莫斯科按圣彼得堡的范例建立了意大利歌剧院。

俄罗斯的美术家们也和意大利有极其密切的联系。从XIX世纪初开始，按规定彼得堡学院的毕业生必须到罗马实习。其中许多在意大利赢得了承认。以那不勒斯的风景画作称著的风景画家西利韦斯特·谢德林直到终生留在意大利。肖像画家奥列斯特·基普连斯基得到了在佛罗伦萨皮季画廊展出自画像的荣誉。卡尔拉·布留洛夫的画“最后一天的庞贝”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全欧洲引起了轰动，更不用说在俄罗斯。亚历山大·伊万诺夫在意大利创作了天才的作品“耶稣显圣”，他为此花费了将近三十年的功夫。XIX世纪下半期瓦连京·谢罗夫、伊利亚·列宾、伊万·克拉姆斯科伊、米哈伊尔·弗鲁别尔曾在意大利创作。俄罗斯艺术家和雕塑家不仅在意大利学习和工作过，而且经常在那里居住，成为俄罗斯和意大利文化联系的活的载体。

从XIX世纪初开始到意大利旅游成为俄罗斯文化上层人士形成的必经阶段。按H.B.果戈里著名的说法，意大利是俄罗斯知识界的精神祖国。俄罗斯-意大利文学联系的历史更全面地证实伟大作家的这句话。许多俄

罗斯的伟大作家的命运都和意大利相联在一起。H.B.果戈里在意大利居住了九年。精通意大利语并在那里写了“死灵魂”。费多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白痴”的大部份也是在意大利写成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从1906年到1913年一直住在卡布里。

意大利几乎给了白银时代的所有作家和诗人—维亚奇斯拉夫·伊万诺夫、亚历山大·布洛克、尼古拉·古米列夫、德米特里亚·梅列日科夫斯基。安娜·阿赫马托娃的译作在向读者介绍意大利诗歌，首先是Дж.列奥帕迪的诗歌方面做出了贡献。不能不指出苏联诗歌翻译学校的创建者之一М.Л.洛津斯基的巨著，他是但丁的“上帝喜剧”的“合符教规”的俄文译本的作者。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总是把佛罗伦萨的伟人的作品纳入俄罗斯文化方面。

没有威尼斯不可设想约瑟夫·布罗德斯基的诗作，他选择了著名的威尼斯的圣米克列公墓为自己安息地远非偶然。诗人在这里传承了联合侨居在外的俄罗斯文化活动家的非正式传统。在约瑟夫·布罗德斯基旁边安息的还有戏剧活动家谢尔盖·佳吉列夫和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俄罗斯和意大利的文化联系不仅是“历史收藏馆，已故伟人的回忆集。今天得到互利经贸合作的巩固的俄罗斯和意大利政治对话促进文化和人文的广泛交流。如果开始列举在俄罗斯和意大利举行的文化和人文活动，很容易超越本杂志的篇幅。这里只需要提到莫斯科大剧院和米兰的“拉斯卡拉”的协议，已成为传统的“米兰俄罗斯晚会”，“威尼斯彼得大帝舞会”，在意大利不同地区举行的一系列音乐会和电影节。

俄罗斯的各大博物馆经常举行来自意大利各城市的独特作品展览会。随着费拉拉市“埃尔米塔什-意大利”科学文化中心的开设，出现了质量上新的可能性。可以肯定的说：现在没有未留下“俄罗斯或意大利痕迹”的艺术方面。

然而，即便在双方传统的激烈的文化-人文协作全景下，今年情况也特别突出。它是最近几十年联系和文化计划的高峰。两国文化部和组委努力实行的内容充实的纲领使俄罗斯和意大利人们能够最好，最全面地了解俄罗斯和意大利现代文化生活的面貌。

在两国相的年活动开始之前举行了苏联著名美术家A.A.杰因涅吉在罗马的1930年到1950年作品展览会的隆重开幕式。由特列嘉柯夫美术馆筹

备，俄罗斯几个主要的博物馆参加的展览会相当全面展示了艺术家的创作，受到了意大利彩色画欣赏者的注意。

俄罗斯总统Д.А.梅德韦杰夫在展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强调：“俄罗斯和意大利有许多亲近之处。这是两国人民素有的坦率、友善开朗和热情，对所有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但愿这个巨大的文化计划能促进我们关系的发展，正是人文部份将确定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合作面貌。

在社会文化建议基金会和国际计划局实行的“圣彼得堡-威尼斯文化使命”范围内访问“亚得里亚海珍珠”的圣彼得堡创作团体对2011年威尼斯狂欢节的参加成了对它的鲜艳的装饰。在罗马狂欢节期间“俄罗斯谢肉节”的专题项目取得了很大成功。

今年六月12日在意大利首都最古老之一的广场-纳沃纳广场举行的俄罗斯日活动使意大利首都及其客人们久久难忘。在俄罗斯联邦合作局和俄罗斯文化学院组织并得到罗马市政府支持的，民族文化“俄罗斯群星”联欢节范围内，最好的国家歌舞团，代表俄罗斯联邦不同地区的民族创作集体对意大利观众进行了表演。

毫无疑问，2011年将作为扩大俄罗斯和意大利文化协作的一年使人难忘。今年三月6日俄罗斯总统夫人С.В.梅德韦杰娃参加了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里的俄罗斯文化研究中心剪彩仪式。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和俄罗斯国家、社会文化艺术机关、基金会、高等和中等学校以及其他希望经常合作并发展科学潜力的组织和结构合作。

意大利最古老的高等学校之一-罗马“萨皮延察”大学也不落后于威尼斯。从年初开始，它在“俄罗斯世界”支持下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中心开始了工作。俄罗斯方面高度评价“萨皮延察”大学给予俄罗斯研究中心独立科学局地位的空前决定，今天它可以在跨系和跨科目的基础上活动。这使有可能联合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希望与俄罗斯协调科学与人文联系的其他专业代表。

原则重要的是：罗马大学的大学生们得到认识俄罗斯并与其学术机构协作的万能工具。但愿俄罗斯研究中心能有助于培养逐渐承负起继续俄意关系传统的新一代专家。

到年底在罗马应正式开设俄罗斯科学文化中心(РЦНХК)。其目的是成为保障俄罗斯在意大利的文化代表的主要组织。它是按照1998年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罗马的俄罗斯科学文化中心和莫斯科的文化机构的建立

与活动条件的协议建立的。从2010年五月起在罗马的中心已有临时办事处，它积极参加交叉年的计划的实施。

到年底在俄罗斯和意大利还应该举行许多极其有趣的活动：展览会、科学讨论会、会议、音乐会、戏剧表演、电影放映、展销会和介绍会。这并非夸张，因这参加的有国家博物馆-保护区“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国家特列嘉柯夫美术馆、国家A.C.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佛罗伦萨博物馆的银，宫的皮蒂和乌菲兹美术馆、俄罗斯国家模范大剧院、圣彼得堡玛丽娅剧院、米兰“斯卡拉”剧院、罗马歌剧院。尤里 捷米尔卡诺娃指挥的圣彼得堡乐队、国家伊戈尔 莫伊谢耶夫模范人民舞团、“莫斯科大师”乐队等等。还有大量私人的倡议，这不能不令人欣慰。

年的正式闭幕式在2011年十二月于莫斯科举行。它的关键的活动将是米兰“斯卡拉”剧院的乐队、合唱团和演员们在莫斯科大剧院的历史性舞台上的表演。

我想，这种强有力的推动将为俄罗斯-意大利今天后多年文化合作发展的积蓄巨大的储备力量。

关键词：俄罗斯-意大利文化合作，意大利俄罗斯文化和语言年，俄罗斯意大利文化和语言年，交叉年计划。

谢尔盖·尼古拉耶夫

俄罗斯外交部第三独联体国家局副局长



中亚在地缘政治中：美国矢量 (1991-2008)

本文是以私人身份写的。

中亚有丰富的历史。当年丝绸之路曾经过它，欧洲和中国通过它进行过贸易。这里曾发生中国、蒙古、土耳其和阿拉伯军队的激战，这里建立了和毁灭了繁荣的城市，出现和消失了庞大的帝国。因此这个地区曾受到不同地区的研究家的关注。

苏联解体后中亚成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其中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在俄罗斯牢固地形成了这种看法（尽管苏联时期这个地区分为中亚各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东西方绝大部份专家都支持这种观点。欧安组对前苏联五个共和国也是这样理解。作为例子可以提到和地区国家发展联系的专家们熟知的欧盟中亚战略，“日本-中亚对话”。

这里不想深入探索遥远的过去，只局限于谈谈地区纳入地缘政治的几个主要阶段。

大概是在XIX世纪，当沙俄帝国开始确立自己的南方边界的时候相当积极地讨论了中亚。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到和亚洲邻邦-中国满清王

朝、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关系，而且涉及到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这里指的首先是大英帝国，它希望依靠与印度接境的国家来扩大自己的殖民地。XIX世纪下半期和末期圣彼得堡与伦敦在中亚地区利益冲突和对相互能接受方案的寻找被称为“大博弈”。¹ 这个名词在世界领先角色争取对中亚的影响的竞争中还常使用。

二十世纪初这个地区的战略意义得到了新的证实。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经典地缘政治学家-英国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赫尔福德 Дж.马金杰尔的原则思想。1904年他在皇家地理协会作了关于地理和历史、政治相互关系的报告-“历史的地理轴”。它的发表常被看作是地缘政治作为一门科学的起点（尽管他自己并在文词中并不使作它。谈到海上强国与陆地强国之间力量平衡时，Х.Дж. 马金杰尔预测在作为伟大地理发现时代（“哥伦布时代”）结束的1900年之后将改变为对后者有利。与此同时，欧亚将进入领先地位（在报告中称为欧洲-亚洲），而在其内部，在自然资源丰富，山峰林立，舰队不可到达东北地区，包括中亚、部份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将迅速发展跨大洲的铁路网。英国学者确定它为世界政治的“轴心地区”，而俄罗斯在其中将起主要作用。²

1919年Х.Дж. 马金杰尔在自己的较晚的著作“民主思想和现实”中用“哈特连德”（“核心土地”，“中心土地”概念取代了“轴心地区”。当时出现了他的著名的公式：“谁控制东欧，他就指挥哈特连德。谁控制哈特连德，他就指挥世界岛（即欧亚和非洲）。谁控制世界岛，他就指挥世界”。³

Х.Дж. 马金杰尔的观点在一系列著名的地理政治家著作中以不同方式得到了反映，例如美国的H. 斯派克和德国的K. 豪斯霍费尔。他们的观点至今在西方很流行，不同程度上继续影响西方社会国家对中亚地区战略方针的形成⁴。

XX世纪下半期美国对外政策创造者之一3.布热津斯基对他们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自己的书“大棋盘”中谈到欧亚在国际关系系统中的位置时提到了马金杰尔的“哈特连德”理论。⁵ 不过，前美国总统民族安全助理稍为“纠正了”英国学者，说“今天地缘政治问题再不确定欧亚的哪些地理部份是对大陆统治的起点，或者在陆上或海上的政权重要。地缘政治从地区思维推向了全球思维，与此同时对全欧亚大陆的优势为全球优势的核心基础”。⁶

与此同时，3.布热津斯基认为包括五个中亚国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富汗的“欧亚巴尔干”按其地理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欧亚大陆最重要的地区。美国政治家强调它是多方竞争的舞台和保障全球的领导地位的重要基地。⁷

英国秘密机关老兵皮捷尔·霍普基克关于苏联解体后局势的描写也颇有意思。例如，他指出：“今天中亚发生地区以外，希望填充苏联意外离去后形成的政治真空的国家之间的新搏斗。政治分析家和社论作者已称之为新的大博弈。因为对谁都不是秘密：中亚有XX世纪最珍贵的石油和天然气，它的难以置信的储藏量大大超过沙特阿拉伯和海湾的其他国家。加上金、银、铜、锌、铅、铁矿、煤和棉花，就十分清楚，为什么外来势力加强了对中亚的新政权的关注”。⁸

今天中亚地缘政治图有令人羡慕的多样色彩。它处于许多有影响的世界竞争者的注意焦点。

俄罗斯在那里有传统的牢固地位。中国在加强对中亚空间的影响。欧盟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新伙伴战略。“日本-中亚对话”机制也在起作用。土耳其、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南韩，一些阿拉伯国家也和地区国家积极发展合作。

自然，像美国那样的强大国家也没有靠边站。美国希望和中亚国家扩大政治和经济联系，和它们在地区安全保障问题上协作。今天为了解决与阿富汗冲突的调解有关的综合性问题而进行的合作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我认为弄清美国在地区的地缘政治矢量是有益的。

专家们分析美国在现代中亚的战略时通常划分为它的进程为几个阶段。划分各不相同。苏联解体和世界地图上出现中亚的独立国家以来，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些年代结束了Дж.老布什、У.克林顿、Дж.小布什的任期，白宫已经有了新的第四代主人-Б.奥巴马。整个国际舞台、中亚地区及其周围的情况都有了重大变化。2001年九月十一日后的最重要事变应是开始了全球的反恐怖斗争。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把这个日子作为起点并建议把美国在中亚的方针分为“基地”反美行动前后阶段的分析方案。

作为美国最主要战略目标的苏联系统的解体那么迅速，使瞬间失去了自己在两极世界方面对手的美国既喜不自禁又惊慌失措。3.布热津斯基称为“黑洞”⁹的苏联后空间的规模，在那里发生的总体难于预测的程

序使美国政治家们震惊。在这种条件下决定首先从事俄罗斯的“民主改革”，把其他一切，包括中亚推迟到以后。同时，对于有不少迹象使美国觉得那里是前苏联帝国落后的边区，在那里推动民主和市场改革会碰到比在俄罗斯较大的困难。另一方面，美国承认中亚的新国家正是表明旨在达到此目的。不过，美国没有表现特别的积极性。

两个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中亚的经济价值还未清楚，因为黑海的石油天然气宝藏虽然在苏联时期已经知道，但未有足够的研究。第二，地区的政治不稳定阻碍地区的经济开发。1992年开始的塔吉克斯坦内战不仅证明了它，而且使美国担心整个中亚会落入邻邦伊朗鼓励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手里。因此美国集中注意它认为妨碍地区的“安宁”保障问题的解决。

正如哈萨克斯坦外交家和政治家К.-Ж.托卡耶夫指出的那样，哈萨克斯坦的苏联武器命运引起白宫的严重不安。1992年五月Н.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正式访问美国时讨论了这个问题。问题实质在于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实际成了核国家。部署在那里的СС-18型火箭大都瞄准着美国。这成了美国和哈萨克斯坦正常发展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障碍。考虑到这一点，哈萨克斯坦在1992年五月签署了第一战略进攻武器条约的里斯本议定书，参加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担了把核武器运到俄罗斯境内的义务。为了实际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按南恩-鲁加尔关于减少苏联后国家核威胁计划对它提供了帮助。1994年十二月俄罗斯、美国 and 英国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保障者就哈萨克斯坦放弃核武器而为之提供了安全保障。Б.Н.叶利钦总统和У.克林顿总统与Дж.梅约尔首相在欧安组峰会上签订了相应的备忘录。稍后法国和中国也提供了类似保障。¹⁰不久之后，最后一颗核弹头运出了哈萨克斯坦。

总的来说，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美国还没有把中亚明确看作是某种美国利益区。认为对此的确定还可以稍等，何况俄罗斯困于本身问题会不断地丧失在中亚地区的地位。可是后来证明这种预测是有些夸大的。

约从1995年起美国对中亚的方针开始改变。这是在不同的情况影响下出现的。俄罗斯外交上主要对发展与西方联系的“倾斜”逐渐拉平。1995年九月14日Б.Н.叶利钦总统批准了自己的关于俄罗斯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的战略方针的命令。按照它，“加强俄罗斯作为在前苏联

空间建立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系统的主要力量”宣布为俄罗斯在独联体政策的主要任务。¹¹ 白宫认为这是“新帝国野心”的表现。

结果，从1997年V.克林顿第二任期“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出现了新的紧张方面-在前苏联各共和国”。¹² 可以说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开始了在中亚和俄罗斯进行争夺影响的竞争。

那个时期美国动力外交也积极化了。特别注意到了里海地区。要求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不能让广阔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没有自己的“看管”。¹³ 与此同时，美国“雪佛龙”公司已经在哈萨克斯坦里海部份的坚吉兹斯克油田工作。1993年四月它和哈萨克斯坦政府签到了关于建立“坚吉兹雪佛龙”联合企业的创建文件，这意味着美国资金本进入苏联后空间。¹⁴ 后来美国的其他大型动力公司-“美孚”，“埃克森美孚”，“阿莫科”也开发哈萨克斯坦市场。美国依靠发展石油方面的双方合作，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方面居领先地位。¹⁵

西方专家们进行的补充调查表明里海的确储藏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这种评价已在1997年对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汇报。美国已把里海的碳氢化合物看作重要的因素，可以解决减少对海湾国家的石油进口依赖性。当时里海地区就被纳入美国利益范围。顺便提提，美国指的是全部中亚共和国，而不仅是里海边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国务院对参加地区的碳氢化合物开采的美国公司给予积极的外交支持。就此它们不仅在那里完成自己公司的任务，而且协助美国达到外交的目的。顺便提提，这些目的在于通过发展中亚国家经济的石油天然气部门加强其独立性和接近西方。¹⁶ 这样开始了美国动力政策的新阶段，俄罗斯科学家С.日尔佐夫和 И.佐恩称之为“争夺里海的角逐”。¹⁷ 美国在它的范围内提出了不仅控制中亚碳氢化合物的勘探和开采，而且把它们运出外国市场的任务。为此美国开始制订建设绕过俄罗斯运输管道路线。

克林顿就任期间加强了美国在中亚的“民主化”和维护人权的方针。对地区国家的各种不同的经济和财政协助或多或少都和它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相联在一起。由于美国这方面的成绩总的来说不够，美国实际的援助额也相对地不大。这样，那些年代对美国所有外交战略的“价值和利益”的困难选择上对中亚方面往往是偏重于万能价值。考虑到地方的特点，这降低了美国政策的吸引力。时间表明存在这种选择将进一步影响美国和中亚国家发展关系，势必形成其高潮和低潮的波浪性质。

XX-XXI世纪美国在中亚的任务大致如下：

-不容许诸如俄罗斯和中国那样的大国或集团国家控制地区的局势达到排除美国存在的程度；

-防止中亚变为部署极端伊斯兰力量的基地；

-防止地区变为非法扩散麻醉品的走廊；

-保障美国公司得到中亚动力资源；

-协助发展地区国家发展公民社会，法律政权和透明的市场经济。¹⁸

与此同时，美国中亚政策到新千年初仍未得到完整的性质。尽管美国加强了对地区的影响，但没能达到对俄罗斯的某种明显的优势。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无钱的赌博”。

还在苏联时期就已建立的俄罗斯和中亚各共和国的经贸联系在继续发展。尽管中亚国家从1994年开始和北约在“为了和平的伙伴合作”计划范围内合作，它们在国防方面仍然看重俄罗斯的武器和军事技术。

俄罗斯在保障安全方面的地位也显得相当牢固。正是俄罗斯在停止对整个中亚极其危险的塔吉克斯坦内战（1992-1996年）方面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它为此采用了一切可能性，包括崇高的国际威信。实际上这使有可能保持塔吉克斯坦领土的完整和保障冲突的政治调解。1999年八月-九月乌孜别克斯坦伊斯兰武装分子(ИДУ)入侵吉尔吉斯巴特肯斯克和昌-阿赖斯克区之后，俄罗斯为消灭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挑衅提供了重大援助。¹⁹

2001年九月11日事件大大增加了对处于反恐怖主义斗争前沿的中亚地区的注意。使美国大大改变了对中亚地区在自己外交重点系统方面位置的评价，因为它对实现在阿富汗的“不可摧毁的自由”行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早已熟知国际恐怖主义的危险性，支持反对这种全球威胁的集体努力。

俄罗斯声明愿意提供领空供载运人文物资的飞机飞往反恐怖主义行动地区。并指出这一立场和中亚的盟国议定的，这些国家也不排除为此提供自己机场的可能性。²⁰ 自然，和这种行动参加者合作的具体问题由中亚领袖们自己决定。

很快地美国建立的盟军就得到了中亚国家相应机构对反“基地”军事行动的后勤支持可能性。大部份协议规定允许利用它们的机场供转运飞

行和补充燃料。与此同时，在比什凯克（吉尔吉斯）的国际机场“马纳斯”和乌孜别克的哈纳巴德机场建立了完整的美国空军基地。

美国和它的北约盟国的军队在中亚的出现在盟军继续制订进一步东扩计划的条件下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俄罗斯有些政治家认为不能容许事态的这种转变。外国的许多专家都认为这是俄罗斯在中亚影响削弱的必然结果。大概这些人的类似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

可是我们认为俄罗斯领导在美国恐怖事件后采取了明确的政治和道义上的立场。正如俄罗斯外长 C.B.拉夫罗夫在2010年十一月份的“总结”杂志上登载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在为受难的美国提供肩膀的时候，考虑得最少的是这和美国的联盟义务有无关系。它的决定是因为认识到在当今世界，集团的态度是过时的，不能提供共同利用已有的，无助于加强不可分割的共同安全的可能性。²¹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俄罗斯的立场，达到了建立当时最广泛地联合反恐怖主义国家的共同阵线。

2001年九月11日恐怖事件之后，美国总统Дж.布什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当时执政的阿富汗“塔利班”领导向美国法庭交出住在该国的，以本拉登为首的“基地”领导人。美国在受到拒绝后于十月7日开始进行反“塔利班”的军事行动。参加的有与之竞争的“北方联盟”，后者得到了俄罗斯的强大的武器和军事技术的援助。经过一个月的猛烈轰炸后“塔利班”在十一月13日退出了喀布尔，十月25日退出了昆都士。后来在盟军在美国地面部队的支持下于2001年十二月7日占领了堪达克。塔利班政权被消灭。中亚最危险的极端组织之一—支持塔利班的武装部队ИДУ也被击溃。反恐怖行动“热”阶段取得的成绩毫无疑问导致了对阿富汗邻邦—中亚的安全威胁的下降。俄罗斯南方边境的局势也相应稳定了。

当时形成的局势使美国得到了和中亚国家合作积极化的可能性。正如著名的美国中亚问题专家马塔 奥科特指出的那样，到九月11日美国在地区的战略义务是动力政策决定的。这使美国公司有可能在里海石油天然气开采方面居主要地位。现在似乎已没有什么能妨碍合作更加加多样化了。²²

可是，主要问题在于能否保障各方利益的平衡，它们在某方面吻合，在某方面却严重分歧。另一种情况也很重要。在“不可摧毁的自由”行动后，白宫主要通过它在阿富汗方面政策的棱菱镜来看待和中亚共和国的综合性联系，这决定它着重安全问题。

关于美国政府组织在2003财政年度协助计划范围内的援助地区的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百万美元）。

	哈萨克 斯坦	吉尔吉 斯	塔吉克 斯坦	土库曼 斯坦	乌孜别 克斯坦
发展民主 计划	13.9	13.5	7.3	4.7	14.7
实行经济和 政治改革	24.4	19.9	14.3	2.4	18.2
安全和法律 秩序	49.2	10.3	1.1	1.4	30.2
人文援助	0.5	9.1	21.8	0.5	18.5
跨部门建议	5.0	3.8	4.5	2.1	4.5
总数	92	56.6	49	11.1	86.1

来源: CIIIA美国国务院网页 <http://www.state.gov>

由此可见：拨出的援助并不多。大部分拨给美国认为对军事安全方面重要的国家-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援助总数中的一半多给哈萨克斯坦，三分之一多给乌孜别克斯坦，用于支持它们的护法活动和加强安全。在哈萨克斯坦，这种援助用于实现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计划，停止阿克塔乌的核电站工作，还用于护法和反恐怖机关的培训工作。在乌孜别克斯坦它主要用于加强边界安全，防止生物武器扩散，提高反恐怖和麻醉品扩散的能力。在吉尔吉斯主要用于教育计划，发展卫生结构，鼓励中小型企业。在塔吉克斯坦几乎把一半的财政援助用于人文目的-保障药品、食品、衣服、住房，尽管也注重加强边界，对付恐怖分子和贩毒现象。6美国援助的这种结构在以后几年内仍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保持。²³

消灭阿富汗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从中亚对它的后方支持使美国认真对待保障地区稳定的问题。顺便提提，没有它，在中亚国家的美国军事设施就不可能正常工作。美国在2002-2003年积极和它们发展了防御方面的合作，“提高”了相互政治关系（仅土库曼斯坦除外）。

看来正是那时结束了美国对中亚事务一定的“疏远”时期。白宫在那里的政策变得更强劲，使有些美国专家称之为“侵略的现实主义”。中亚已经不被看作是俄罗斯的“后院”，对美国已经有独立的意义。

美国人在评价地区局势时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各自和共同达到地区稳定的企图没有成功。现在美国着手解决此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式度上符合俄罗斯和中国利益。很难说这种设想的根据是什么，但很快地情况就表明它是错误的。²⁴ 甚至考虑到三大国在反国际恐怖斗争方面立场吻合，也难于设想俄罗斯和中国会取消自己对中亚局势的责任并把它“出卖”给美国。自然，它们对美国于地区的存在有自己的看法，不能忘记还在2001年六月就已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ШОС)。参加它的有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宏观世界逐渐变为中亚空间政治的重要因素。2002年五月决定建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ОДКБ)，它的关键任务之一是保障中亚的稳定。它的成员中除了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外还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2003年十月在离比什凯克不远的吉尔吉斯的康特市开设了俄罗斯军事基地，那里已经有美国的空军基地。

遗憾的是，最初对“塔利班”的胜利没能长期“安定”阿富汗局势，塔利班只需一年多的时间就恢复了“元气”并对盟军开始了游击战争。当时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1386项决议建立的国际协助安全力量(МССБ)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使命，从2003年八月起指挥权交给了北约。起初它的责任区仅是喀什尔，但2003年十月决定把它扩大到阿富汗首都之外。

可是，美国和国际协助安全力量(МССБ)都没能克服塔利班的抵抗。结果阿富汗的恐怖区没有消除，而麻醉品的生产却反而有增加。中亚正好是向独联体国家，首先是俄罗斯，此后是欧洲转运它们的主要走廊。

美国还未结束在阿富汗的战争，又在2003年三月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同时在两个战场的军事行动需要巨大的资金，而当时大部份是用于伊拉克战争。在这种条件下指望美国增加对中亚，特别是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的援助已不可能。

“侵略的现实主义”政策又把“价值与利益”两者选择推到头一位。按路易斯维尔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美国）查尔斯·济格列尔的看法，在У.克林顿总统和 Д.ж.布什总统时期美国政府都不容易吸引中亚国家参加安全方面的合作，同时在人权，经济和政治改革方面对它们施压。而且

在调解这种矛盾时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意见不一。外交部门认为在处于反恐怖主义前沿的地区协助其民主发展较有意义。国务院计划旨在支持政治多元化、媒体的独立、保障法律高于一切以及宗教的自由。它的关于人权的报告中激烈批评中亚国家。军人却恰恰相反，首先注意到和它们在安全方面的合作，往往压制外交官们的批评。Ч.济格列尔认为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难于消除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在保障安全需要与协助发展民主和人权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因为这种冲突在反恐怖主义战争开始之前早已存在。²⁵

应说，美国在2003-2005年之间曾试图以如下方法摆脱形成的局势。把关于美国在地区政策的成功与否按照在那里扎下民主根的深度而定的理论作为基础。决定加紧推动中亚共和国的民主进程。同时决定加强地区的安全并提高反国际恐怖主义斗争效果。

俄罗斯著名学者Г.丘夫林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颜色革命”的激励之下试图利用中亚居民广泛阶层对自己生活条件的不满，在发展民主的口号下，用公开亲西方的政权来更换现有政权。²⁶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吸引了美国政府和社会结构中专门从事传播民主价值的经验丰富的政治学家们参加。例如，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动问题局、美国国际发展局、国家争取民主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工作者。这些组织从事供应当地非政府组织(НПО)资金、刊物、散播相应的宣传文件，支持倾向西方的在野政治力量。

2005年三月“郁金香革命”结果推翻了曾被美国称为典范的民主领袖的吉尔吉斯总统А.阿卡耶夫。黑社会和极端集团利用“革命局势”，导致了大规模的动乱和抢劫。

随后，在2005年五月在乌孜别克费尔干盆地的安集延市发生了风潮，和伊斯兰组织“阿克拉米亚”有联系的暴动者抢夺了武器，绑架了人质。为了恢复秩序，政权不得不动用了武力。

吉尔吉斯和乌孜别克斯坦的事件证明地区不稳定的挑战不仅来自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还来自美国，它走上了输出民主和直接支持“颜色革命”的道路。²⁷这引起了中亚国家执政上层的完全有理由的担心。俄罗斯和中国也对此感到不安。

不久之后西方开展了谴责乌孜别克政权和总统И. 卡里莫夫本人的运动。理由是在安集利延事件过程中“粗暴违反人权和对居民过分使用武力”。美国在这个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结果使乌孜别克与美国的关系长期严重恶化。

这段时期中亚的许多政治家都开始怀疑美国军事存在有助于加强地区的安全。

2005年七月5日在阿斯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一致通过了建议，要求在阿富汗从事反恐怖行动的国际盟军确定它们的军队在中亚地区留驻的期限。2005年七月29日乌孜别克斯坦警告美国要在六个月之内从哈纳巴德空军基地撤出其军队。

2005年十一月它正式关闭。

当时美国各研究中心制订了“大中亚”（БЦА）理论。它规定建立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孜别克斯坦，还有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统一中亚和南亚空间。它的主要思想家弗列杰里克 斯塔尔提出了美国在这个计划中应达到的目的：1）进行反恐怖主义的战争并建立对美国封闭式的安全结构。2）为阿富汗及其邻邦提供保护自己免受激进伊斯兰和贩毒分子为害的可能性。3）努力加强地区经济和较重要的国家机构，使之达到把地区变为近东的东亚、南亚政治桥梁的水平。4）进行加强地区贸易联系与相应的交通结构的工作。5）鼓励能建立可成为穆斯林居民较多的国家的榜样的民主政治系统。²⁸

对此理论已谈得相当多。这里我只想谈谈2009年问世的书“改变了中亚的年代”作者的观点。其中认为美国需要“大中亚”并非为了培植民主，而是为了无限制地管理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进程，不受其他角色（俄罗斯和中国）以及这些角色领导的机构（ОДКБ, ШОС）的妨碍。与此同时，Дж. 布什把目标主要转向中亚的西式民主化和遏阻俄罗斯和中国在这里的影响的地区政策，注定了它的今天称为效率猛跌的结果，因为对地区国家的过度性经济需要有另外的措施和态度。²⁹

我想补充的是：无论如何，实现这种有经济“优点”和军事-政治“缺点”的野心勃勃的计划 不可能没有阿富汗方面的局势的根本改善。

作出总结时可以特别指出我们认为几个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时表现出的关键点。

在“侵略现实主义”理论范围内美国政府始终没能解决“价值和利益”的选择。美国在中亚的政策不断变更，使之不可能有明确的路线。对于美国什么较有价值：是动力资源还是军事存在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或者是选举的透明度和媒体的自由，仍是未知数。在美国在谈论俄罗斯是地区的软弱的竞争者的时候，突然发现在那里有俄罗斯参加的国际结构，例如，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已扎下了深根。还有。加速地区国家民主化的方针并非受到绝对的拒绝，而是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它们的传统的世界观。不注意东方社会向来注重循序渐进和非操之过急的变更。³⁰

所有这些问题都留给了以奥巴马为首的新政府。现在美国“大脑”中心致力于重新审议美国在中亚的战略，使之接近今天的中亚地缘政治现实。看来这将导致变地区为旨在保障其安全与稳定的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已开始的俄罗斯-美国关系的“重启”为此开辟“宽阔的可能性窗口”。无论如何，俄罗斯和美国毫无疑问在中亚存在共同利益。未来将表明它能怎样加以实现。俄罗斯为共同的工作作好了准备。

注解：

1. 参阅. : 米亚斯尼科夫 В. С. 波斯特尼科夫 А. В. 的前言. . 俄罗斯在中亚边界的形成(XVIII-XIX вв. 世纪) М., 2007. С. 4-5.
2. 马金杰尔 Х. Дж. 历史的地理轴 // Полис. 1995. №4. С. 162-169.
3. Mackinder H.J.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Y.: Pelican Books, 1944. P. 113.
4. 参阅. : 尼古拉耶夫 С. 日本外交政策的中亚矢量//外交机关. 2009. № 6. С. 15.
5. 布热津斯基 3. 大棋盘。美国的优势和它的地缘政治选择。国际关系 2010. С. 54.
6. 同上 С. 54-55.
7. 同上 С. 149-180.
8. 霍普基克 П. 大博弈。中亚的秘密机关 М., 2004. С. 18-19. (摘自米亚斯尼科夫 В.С. Указ. соч. С. 7.)
9. 布热津斯基 3. Указ. Соч. С. 109.
10. 托卡耶夫 К.-Ж. 光明与阴影. 评哈萨克斯坦政策. М.: 东西方, 2008. С. 195-203.
11. 1995年九月14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命令 №940.
12. 参阅: 罗戈夫 С.М. 克林顿政府: 作出总结为时尚早. // США и Канада 美国和加拿大. 2000. № 2. С. 13.
13. 参阅. : 西莫尼亚 Н. 石油在美国政策中 // 国际生活. 2008. №3. С. 70.

14. 参阅.：科恩 阿里埃尔. 独立道路：哈萨克斯坦动力政策. 阿拉木图：阿尔塔穆拉，2007. C. 40-41.
15. 托卡耶夫К.-Ж. Указ. соч. C. 204.
16. 参阅.：日兹宁 С.3.美国动力外交// 美国和加拿大. 2000. №2. C. 78-79.
17. 参阅.：日雷佐夫 С.С., 佐恩 И.С.美国在争夺里海. М.:国际关系, 2009.
18. 参阅.：布罗特涅尔斯基 М.В.美国在中亚的政策：十年总结 //美国和加拿大. 2002. № 9. C. 56.
19. 参阅：尼古拉耶夫 С. 俄罗斯-中亚：对繁荣和安全的追求. //国际生活. 2009. №6. C. 37.
20. 2001 г.2001年九月24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的声明 //俄罗斯外交政策：文集. 2001 /俄罗斯外交部. М.:莫斯科印刷厂 №2, 2007. C. 311.
21. 参阅.：拉夫罗夫 谢尔盖. 在同一条船上 // 总结. 2010. №46. C. 17.
22. 参阅.：奥尔科特 М.Б. 中亚的第二个良机 //莫斯科卡尔涅吉中心. 莫斯科-华盛顿, 2005. C. 19.
23. 参阅.：济格列尔 查尔斯 Э. 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和上合组织.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 2005. №4. C. 18-19.
24. 参阅.：布拉捷尔斯基 М.В. Указ. соч. C. 62.
25. 参阅.：济格列尔 查尔斯 Э. Указ. соч. C. 19-21.
26. 丘夫林 Г.И. 俄罗斯和中亚. 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下属哈萨克斯坦战略研究所, 2010. C. 28.
27. 同上. C. 29-30.
28. 参阅.：斯塔尔 弗列杰里克. 为了中亚的伙伴合作 //俄罗斯在全球政治中. 七月-八月 2005. №4. (<http://globalaffairs.ru/numbers/15>)
29. 参阅.：改变了中亚的年代. М.：政治研究中心.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2009. C. 298.
30. 参阅.：济格列尔 查尔斯 Э. Указ.соч. C. 21-22.

关键词：欧盟在中亚的战略，“日本-中亚政治对话”，中亚地区，乌孜别克伊斯兰运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大中亚理论。

米哈伊尔·马约罗夫

特命全权大使，历史学博士

安排不当的欧洲

西欧没能对历史上积极卷入欧洲事务的阿拉伯世界的，特别是北非的事件起重大影响证明了可悲的结论：欧洲不再是全球的力量，它越来越局限于解决本身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重点大概不可能是实现俄罗斯呼吁的，像彼得的大帝时代那样把俄罗斯的现代化“变为全欧的计划”。¹问题不仅在于冷战年代在美国庇护下习惯于过舒适生活的欧洲政治家们碰到了成熟的挑战—纯属资本主义模式发展的危机、新的民族情绪高涨、欧洲内部民族宗教冲击，过去政治制度和历史激情，而且不是其最佳表现在欧洲政治上形成的沉重负担也起重要作用。

把苏联解体后削弱了的俄罗斯排除出欧洲积极角色之列，沿它的南方和西方边界建立新的“防疫线”的企图并没有给欧洲带安宁和对自己的无冲突的发展的信心。南斯拉夫各部分之间矛盾的血迹、承认科索沃独立之后甚至涉及到了似乎安静的比利时的分裂主义运动的猖獗、欧洲有影响国家不愿意约束高加索的“新欧洲人”狂妄野心，导致了2008年八月悲剧事件的态度，可能严重扰乱欧洲的局势。随着美国逐渐减少对欧

洲事务的卷入（而这早晚会发生），还不能排除某些欧洲大国潜在的野心和小国的历史本能会动摇那么不容易建立的欧洲联盟。

历史主要不是教师，而是保育员，因为它的职责不在于行动的指南，而在于使人认识过去并和现在的现象与事件对比，暴露许多现代进程的实质。今天欧洲出现的一切是对此很好的证据。

再谈欧洲的平衡

欧洲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于国际关系中成为恒量的力量平衡系统基于理解当时力量大致相等的国家中不允许一些国家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这种系统不可能防止危机和战争，但它的存在缩小了冲突规模和一些国家保持优势并把自己意志强加给别的可能性的国家的可能性。欧洲力量平衡系统的严重失调导致了大陆的巨大动乱乃至世界灾难。

尽管欧洲平衡的创建者有具体的姓名（称为H. 马基雅维里和红衣主教黎塞留），这种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出现并不能归功于当时政治家和外交家们洞察。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它的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国家开始积极对抗来自欧洲大王朝对自己政权和独立的威胁。XVIII世纪的无数战争似乎混乱并且有侵占的现象，但它带来了欧洲大国独立发展有利的力量平衡原则的思想。

彼得大帝以强行的改革，伴随着空前的跃进迫使欧洲考虑俄罗斯的利益并把它纳入确定欧洲平衡的国家之列。俄罗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对保护这个平衡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促使欧洲大国认真制订基于力量平衡原则的国际秩序。1815年维也纳会议和奥地利、普鲁士与俄罗斯的神圣联盟的建立虽然渗透了欧洲王国建立某种对付任何革命运动的集体行动机制的动机，它把力量平衡变为调节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欧洲将近四十年没有发生大国参加的战争。

可是，在欧洲力量平衡得到相对的稳定的同时，欧洲的外交家们毕竟是自己破坏了它。原因是俄罗斯在欧洲的影响，首先是在巴尔干影响的增大使奥地利、英国的法国看到了对自己利益的潜在威胁。为了对付“俄罗斯熊”，决定利用土耳其，把它变为“必要的邪恶”-历史上欧洲和俄罗斯的对峙大大超过了欧洲人把土耳其人看作大陆的异类的态度。英国和法国利用尼古拉一世的目光短浅，挑拨了1853年-1856年的俄罗斯-土耳其战争，开始了破坏好不容易在维也纳建立的，基于力量平衡原则的欧洲秩序。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欧洲外交方面道义上残存的温和与克制，重新恢复了原来的西欧大国的竞争。建立了新的欧洲秩序，其中第一个原则是普鲁士总理O. 俾斯麦提出的«realpolitik»，按暴力和强权确定国家之间的关系，1870-1871年法国-普鲁士战争之后欧洲政治完全染上了对抗颜色，在欧洲出现了强大而残暴的霸权追求者-德意志帝国，它自认为不是欧洲铁匠的铁砧，而是铁钉。不过，起初欧洲各国没能看出德国开始的政策是为了变力量平衡为军备竞赛，是对他们自己安全和整个欧洲文明的威胁。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知为何没有给欧洲政治家们带来教训。按1919年巴黎会议结果建立的秩序使欧洲失去了长期和平发展的可能：它只是增长了德国的复仇情绪，把苏维埃俄罗斯排除出了欧洲平衡部份之列，激化了欧洲许多人民的民族问题。美国也为欧洲的混乱做出了贡献，战后它在欧洲政治上起越来越明显的作用。美国总统B. 威尔逊在巴黎会议上否定了«realpolitik»作为非道义的力量平衡概念，提出了实行新的国际秩序准则-民主、集体安全和自决。前美国国务卿Γ. 基辛德在谈到当时欧洲领导人放弃力量平衡政策基本条款所带来的许多灾难时指出：“应该理解，在世界上三个最大的民族-美国、德国和苏联未接受它的时刻，集体安全理论行不通”。²

战后在对外政策上失去力量因素的德国善于利用欧洲平衡的原来力量对比，利用了英国和德国历史上的相互不信任和英国希望德国永远成为对付俄罗斯与法国的平衡力量。以Γ. 施特雷泽曼（1923-1929年）为首的德国外交开始发展和苏联的关系，这使英国和法国不安，从而削弱了对德国的压力。1925年德国在洛迦诺（瑞士）会议上，在不无英国（和美国）的帮助之下迈出了修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第一步，并且实际上达到了在欧洲大国中的平衡和损害了法国。洛迦诺为德国开辟了东欧之路，如果它满足于这种“礼品”，大概会在西方得到进一步的位置。可是取得了德国政权的希特勒鄙视施特雷泽曼的外交，他考虑把整个欧洲处于德国的统治之下。受到希特勒反共主义的迷惑，高唱德国属于西方文明的欧洲政治家们没能想到无阻碍地增大的德国军力对欧洲平衡和整个世界和平的危险后果。

英国和法领导人在1938年于慕尼黑对希特勒的投降彻底破坏了欧洲平衡，使苏联单独面对纳粹德国。1939年八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И.В. 斯大林向西方支付的同样的硬币，这表明他尽管有共产主义思想，对西欧外交习惯的白衣主教黎塞留和«现实政治»俾斯麦手段并不

陌生。斯大林暂时恢复了苏联在欧洲的平衡，但没能彻底猜透希特勒的构思和正确确定推迟和德国的不可避免的战争的程度。1940年五月法国被粉碎对一些人意味着结束利用德国作为“反布尔什维克瘟疫”斗争的“箭头”的幻想的破灭，对另一些人则是关于西方大国会在帝国主义斗争之中相互削弱的希望的崩溃。残酷的现实尖锐提出了为对付共同的敌人联合努力的必要性，它在苏联被进攻之后建立反希特勒联盟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大转弯，以总统Φ.罗斯福为首的执政集团得出了结论（尽管没有正式承认）：他们并不满意的欧洲力量平衡正好保障了美国的安全。在罗斯福时期美国外交出现了不同于威尔逊观点的新的外交流派——“力量平衡”拥护者或“现实主义者”，这种流派较看重大国国力和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不是它们内部的政治结构。美国外交的这个方向的符合逻辑的发展是美国积极和苏联建立联合国，它和国联不同之处是更多地考虑到1945年之后形成的力量对比和广泛国家的利益。

“现实主义者”的地位在冷战时期得到了加强，当时美国认为自己不仅是欧洲，而且是全世界力量平衡的保障。面对苏联的不断增大的国力和影响，美国外交的主要目的是遏阻苏联的强大。美国认为苏联在东欧之外的，首先是在战败的德国的影响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危险。实际上遏阻概念脱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力量对比，旨在恢复欧洲的平衡。不过，这个概念的特点成为“实力政策”重要原因之一是仅美国拥有核武器。这种政策的后果是按美国建议在1949年四月建立了具有明显的反苏方向的北约。

苏联领导没有浪费时间，他在全面加强建立了苏维埃秩序的东欧安全带。然而主要的成就是苏联在1949年制造了核武器，这明显冷却了西方国家的发热的头脑并确定了长期的相互遏制的国际关系。苏联达到和西方的核力量均势不仅巩固了欧洲的平衡系统，而且把它扩展到世界政治，例如，使民族运动有可能在“第三世界”结束殖民统治。西欧处于有利的局势：苏美的竞赛使它有可能到上世纪90年代存在忘记欧洲军事行动的“美景”，取消自己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责任，最后，由于存在两个德国而不再操心“德国威胁”。在欧洲和全世界建立的平衡使有可能开始关于逐渐裁减核武器的谈判，导致了苏美关系的缓和，1975年召开了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的赫尔辛基会议。

随着苏联内部问题的增多，伴随着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地位的削弱，美国外交政策上B.威尔逊观点拥护者占了上风，他们在苏联解体

后一直控制着美国外交，排挤了力量平衡的支持者。美国总统 B. 克林顿（1993-2001年）政府起草的理论中指出：美国的安会应基于“扩大有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范围，同时遏止和防止对我们盟友和我们利益的一系列威胁”。与此同时，强调美国的安全和繁荣直接与加强民主的深入，“世界的，特别是在对美国有地理政治意义的国家政治和经济自由化”³ 相关。不久前通过的文件反映美国领导打算在国际舞台上奉行侵略性使命和进行单方面行动，并不特别注意俄罗斯的反应。

迷醉于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强大的“新保守者”幻想按美国模式重建世界。在其冲击联合国基础，称之为力量平衡时代过时的“遗产”的方针上，特别是在北约对前南斯拉夫行动的过程中反映了其霸权追求。美国依靠英国的密切支持，防止自己欧洲的盟友摆脱北约的控制。这里指的是加强北约与欧洲一体化密切相互联系，不允许欧盟依靠中欧和东欧国家亲美情绪的松动加强自己的独立性，把欧盟活动限制在经贸范围之内。

以苏联为代表的对称的消失打破坏了欧洲平衡，从而增加了希望躲入“美国保护伞”的国家，这使美国较容易推行统治世界计划。从苏联废墟中冒出的俄罗斯由于软弱和国内没有对外交政策的统一态度，它在战后一代的欧洲政治家中眼中失去了作为大陆平衡必要因素的地位。“苏联威胁”的消失也影响到了西欧国家领袖们对土耳其的态度，实际上丧失了看到它有影响巴尔干局势能力。直到最近时期，欧洲人似乎很少关心欧亚的土耳其能很快变为地区大国，能大大加强欧洲的国际声音并对其内部伊斯兰因素的稳定作出贡献。

2003年美国开始的伊拉克冒险有力打击了美国统治世界的意图。在欧洲出现了关于它安稳存在的担心，迫使已经惯于不负责任的大陆上层考虑欧洲政治在世界力量对比变化中的位置。2008年发生的财经危机使欧洲政治家们更加认识到适应新现实的必要性。美国政权在放弃简单露骨的小布什政策的标志下的更换又使“力量平衡”派外交出台。可是现在指的是美国显然愿意和迅速发展中国“分担全球责任”。与此同时，2009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北京时表示不同意所谓“二大国”的思想，声明中国“奉行独立的政策，不打算和任何国家或集团国家结盟”。⁴

但毕竟不能说跨大西洋团结有严重的危机，虽然德国和法国前首脑-Г. 施罗德和 Ж. 希拉克曾公开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俄罗斯前外长 E.M. 普里马科夫说得对。他说，使西欧和美国对立的花招是没有前途

的。西欧人和美国人历史上（欧洲的移民是美国居民的骨干），在文明方面（文化接近和宗教统一）密切相关，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国在冷战年代提供的核保护加强了双方关系。⁵ 诚然，西欧认识到，在新的世界秩序结构中不能有过去那种过分对美国的过分服从，这将对西欧把欧洲变为国际政治一极的欲望产生不良影响。此外，不管西欧怎样想隔开俄罗斯，它在大陆不断加强的地位迫使西欧考虑它并且返回已遗忘的欧洲力量平衡系统。表现和俄罗斯关系积极化的愿望在不小的程度上有助于消除欧洲作为美国附庸的形象。

还考虑西欧转向俄罗斯的其他可能的理由，1990年代它不仅不无快意地观看了，而且“力所能及地”参加了对俄罗斯的凌辱。最近西欧的外交步骤（示范性的柏林-巴黎-莫斯科深入对话、对俄罗斯关于欧洲安全建议的支持、关于俄罗斯可能加入北约的暗示）是在中国正式拒绝美国“平分”全球领导权建议后采取的。这里值得提到的是，西方早就有使俄罗斯将来纳入反对中国政策的念头。众所周知，还在1959年初法国总统III.戴高乐就已谈到过苏中冲突不可避免，认为这是俄罗斯和西欧接近的重要因素。美国国防部长H.麦克尔罗伊在1959年夏天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交谈时谈到了苏美联合对付中国的必要性。⁶ 我们要指出的是，在当时苏中关系日趋紧张的时期苏联仍认为西方政治家关于类似的联合不合时宜。

现在俄罗斯位于十字路口。在失去和一系列发展中国家顺利竞争能力的条件下，俄罗斯外交处于内部复杂问题的重压之下。停滞落后状况导致对自己能力失去信心，产生利用外力突破前进的想法。与此同时，在世界和欧洲的力量平衡系统新版中和在XIX与XX世纪那样，没有政治和经济利他主义的位置。俄罗斯有加入那些努力填补美国二十年霸权后形成的“真空吸引”者之列的唯一良机。也许说来庸俗，这里指的是利用国内的能力来建设现代的，发达的，受到尊敬和信任的国家。否则俄罗斯可能陷入那些传统地只能使自己的外交政策适应世界力量平衡变化的国家之列。

欧洲安全的暗礁

欧洲未来和如下问题不可分割：欧洲人能否搞好自己家里的秩序？自从XVII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加强以来开始了它们之间争夺地位的竞争，争夺领土和影响范围的激烈斗争。三十年的战争（1618-1648年）

和此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推动了“欧洲思想”的发展，这是把欧洲看作有其素有的特点的一定的共同体并从内部的统一观点看待大陆的思想。XVIII世纪欧洲政治思想有过空前的光辉，反映在推出的全欧性的不同理论、具体的纲领和计划上。至今政治家们关于欧洲一体化议论中仍可看到对当时著名思想家-英国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家B佩恩，法国外交家和哲学家Ш.-И.先-皮埃尔，法国教育家吉恩Ж.-Ж.鲁索，德国哲学家И.康德思想的引用。实际上所有他们的理论和计划都有关于建立旨在维护和平的全欧机制和它在建立跨民族机关范围内的保障的内容。

1815年维也纳会议不仅联合了保守国王反对革命现象的努力，而且在历史上首次标明了接受共同的使命-在欧洲安全和稳定受到威胁时协调行动的追求的轮廓。可是由于欧洲舞台的各大角色内部的成见和历史的偏见，建立集体安全系统的希望注定不能兑现。影响欧洲安全的重要因素是维也纳之后一些大国，特别是德国和法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它显然具有敌视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性质。全欧思想在政治家们的口中成了用于达到具体的目的的宣传工具。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可悲的后果导致已承认自己无能的欧洲政治家们的惊慌失措，散播了悲观和失望，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和西方国家对它的封锁只是增加了欧洲的混乱和动摇。1923年奥地利社会活动家P.库坚霍夫-卡列吉的著作“泛欧洲”问世，引起了轰动。此后是他对法国议会关于建议联合欧洲（它被法国外交利用为推行所谓“白里安计划”）的呼吁。库坚霍夫-卡列吉的主要思想是联合欧洲作为面对三大势力-苏联、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尽管奥地利人承认必须为了复兴欧洲而和俄罗斯建立关系。

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例如，В.И.列宁在其文章“谈欧洲合众国口号”中的极端否定的评价对苏联与欧洲联合的态度起了很大的影响。可是纳粹分子在德国取得政权及其激烈的反苏叫嚣和统治欧洲的计划使苏联领导增加了对通过与法国接近，通过奉行集体安全政策保障欧洲安全与稳定的注意。1933年十二月政治局通过了决议，规定苏联有可能加入国联并签订关于相互防止德国侵略的协议（东方条约）。在1934-1935年苏联外交积极研究了和签订东方条约可能性有关的问题。同时试图改善和英国的关系，希望吸引它参加实现集体安全的思想。可是英国看重“西方的安全”，越来越想和德国签订协议，使之在东方自由行动。

德国快速地占领西欧的大部份领土、德国对苏联的侵犯、反希特勒联盟的建立为“欧洲思想”的活跃创造了前提。尽管斯大林及其战友们还

有军事行动时期遗留下来的对欧洲联盟、多方联盟或集团建立的谨慎，苏联领导不否定在战后，在没有对苏联的威胁的条件下这样做的可能性。1941年十二月И.В.С斯大林和 В.М.莫洛托夫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说了这番话。在交给英方的对苏英战后安全条约补充议定书中承认“必须建立作为国际组织的欧洲委员会，它应有一定数量的军队作为保护欧洲和平的工具”。⁷

可是战争结束后发生的事件显然不利于实现全欧思想。1945年在盟国之间发生严重分歧的柏林会议之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出轨。美国越来越常说反希特勒联盟为“奇怪的联盟”，而Г.杜鲁门总统的政府则说美国已疲于“娇纵苏联”和对俄罗斯人让步。由于战后和美国合作的计划破产而恼怒的斯大林采取了加强东欧苏联影响区，反对来自西方的新威胁的方针，并且恢复了资本主义为战争根源的理论。在苏联的国际地位加强的条件下，欢迎美国遏制苏联政策的西欧国家对俄罗斯的历史性的恐惧暴露无遗。看到战后苏联是美国政策的对称力量的戴高乐在1946年提出的“欧洲是大西洋到乌拉尔的空间”的公式在欧洲的拥护者不多。反苏主义成了西欧一体化的主要动力之一。

法国和德国的接近是联合的火头。毫无疑问，这主要应该归功于戴高乐，他长期主张法国应以任何代价，包括通过和苏联的接近达到保障自己的安全免受德国复兴的威胁。可是苏联的强硬的反对西方世界政策和斯大林对削弱了的法国对欧洲事务的影响估计的不足使戴高乐感到存在来自共产主义的俄罗斯的危险。戴高乐作出了关于必须采取“双重安全”的原则-依靠德国分为两个部份防止来自德国的危险和通过西德参加欧洲大西洋结构防止来自苏联的危险。1958年重新执政后，戴高乐的头一件事是和德国总理К.阿登纳会晤并对他声明，尽管法国人民没有忘记恶邻过去的罪孽，但为了共同的欧洲值得忽略历史进程并使两个人民和解。法国和德国关系的新性质在很大程度上预先确定了西欧一体化的发展，导致了欧盟的建立。

苏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欧洲建立的各种组织首先是为了对付它。1947年美国外交宣布了“杜鲁门理论”，开辟了全球“民主与极权”对峙时代，同年六月美国国务卿Дж.马舍尔提出了欧洲战后“恢复与发展”计划，它很快地成为美国反对苏联，争夺欧洲的经济工具。然而俄罗斯最担心的是北约建立和西德加入其中（西德在1955年成为北约成员国），苏联领导认为这是建立反苏的军事政治联盟。北约领导，包括北约第一任秘书长，英国的Г.伊斯梅关于北约目的的著名言论也不令

人乐观：“美国人应保持在欧洲，德国人-在检查室，俄罗斯应在欧洲之外”。俄罗斯认为建立欧洲合众国是旨在消除中欧和东欧的苏联影响区，是蓄意孤立苏联的政策。

1953年斯大林死后出现了虽然很短，但毕竟有可能结束冷战的时期。1954年一月到二月苏联方面在柏林外长（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会议上暗示两个德国可能和平统一，提出了关于签订全欧集体安全条约的建议，认为这能结束欧洲的，势必导致增加各国之间仇视和不信任的军事集团的相互对峙。拥有对付苏联的共同工具的西方国家拒绝了苏联的建议。1954年三月底苏联政府声明：如果北约消除其侵略性质，它愿意考虑参加北约的问题。可是对苏联的这一建议的也和预测的那样，得到否定的反应：北约成员认为苏联参加和北约组织工作目的格格不入。

欧洲“健康化”的希望时期过去了：美国和西欧政治家们看不到和苏联一起的共同欧洲，而在苏联也是反西方的情绪占了上风（1955年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苏联领袖H.C.赫鲁晓夫公开声明西方无望看到苏联“解除思想武装”和放弃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与此同时，到1960年代初期苏联外交已开始寻找对欧洲安全问题的新态度。逐渐认识到了1957年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变为不能忽视的欧洲政治和经济现实。显示了苏共和欧洲共产党之间关系裂缝的1956年匈牙利事件、苏中关系的恶化使苏联外交活动开始更注重苏联的国家利益，而不是遵循意识形态规则。

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在国际关系上得到了强烈反映，促使两个对峙的集团相互奉行更明智的方针。苏联和美国战略均势的建立，还有苏联成功开发宇宙方面成就所表现的强盛具有重要的“安定”意义。美国在越南战争（1965-1973年）的失败和1968年苏联领导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轻率行动沉重地打击它们的国际威信，促使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增加一定的现实主义成份。欧洲的变化特别明显：1966年戴高乐访问苏联促进了苏法的接近；1970年苏联和德国签订了莫斯科条约，规定双方“严格遵守欧洲所有国家的现有边界之内的领土完整”；1971年签订了四方（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关于西柏林的协议，所有这一切使有可能在相当长时期调节冷战年代主要矛盾枢纽之一。不过，“缓和季度“的主要成果还是苏联外交在1966年提出的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思想的实现。

1975年八月1日在赫尔辛基签订的最后协议奠定了欧洲历史上独特的进程的开端-在非集团的基础上通过利用调解分歧与冲突的外交方法吸引欧洲所有国家参加解决大陆安全问题的可能性。可是欧洲的分裂并没能按原定的情节克服，原因首先是苏美关系的恶化。这里美国方面立了“大功”，它在Дж.卡特时期积极破坏了缓和进程。1979年苏军进驻阿富汗也起了自己的作用，这不仅激化了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而且导致了它的威信在“第三世界”的下跌，使苏联的模式吸引力大大削弱。

在苏联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劣化的条件下，苏联的最后一个领袖M. 戈尔巴乔夫宣布了国家经济和社会“改革”，改变对外政策的方针。对国际关系的新的态度不是基于力量的平衡，而是利益的平衡，对外政策方面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注重人的价值。这种方针在欧洲的表现是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欧洲共同的家”的思想。他在1987年三月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声明：“不可能没有西欧那样的伙伴”，因为不考虑欧洲，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包括苏联国内问题，这里需要利用西欧国家的科技成就。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和西欧和美国领袖们的交谈中，而且在公开的演讲中都坚持推动“家”的思想。例如，苏联领袖在1989年欧委会议会大会上声明：“把冷战的思维，把欧洲看作是对峙，划分“影响范围”的平台思维交给存档库的时候到来了”。他说，“全欧的家”的概念的哲学是排除“动用武力或武力，首先是军事力量威胁的可能性本身”，它建议用“克制理论取代遏止理论”。⁸

M.C.戈尔巴乔夫的具有积极因素的欧洲倡议在西方主要被看作是苏联丧失力量和影响的标志，是苏联领导人为了挽救存在的制度而愿意作很大让步的态度。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和德国的外交巧妙地利用了苏联政权的软弱，达到了首先是对自己有利的关于德国统一和它加入北约的目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也对西方有利，那里的党和国家领导在失去苏联的无条件的军事政治支持后很快地失去了管理能力，最后导致了华沙条约的解散。为了给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们“一点甜头”，西方政治家们坚定地推进自己的利益，并用花言巧语地许诺德国的统一不会导致北约东扩。

苏联解体之后西欧国家抛弃了不再需要的对已经卧倒的俄罗斯的谨慎和温和态度，和美国分享了冷战“胜利者综合症”。尽管通过了新欧洲巴黎宪章（1990年十一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国家高级会晤结果），其中表明忠实于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原则和关于“一个参加国的安全与所有

其他国家的安全不可分割”⁹的章程，西方国家致力于变欧安组为干涉别的国家，首先是苏联后空间的内部事务的单方面机制。

中东欧国家尽快抛弃苏联时代包袱进入“文明世界”的追求使美国及其盟友较易实现其北约东扩，对“不可预测的”俄罗斯建立新版的“防疫线”的计划。它们决定不再考虑到俄罗斯的意见，特别是在1993年夏天叶利钦对波兰总统J. 瓦文萨声明决定波兰是否加入北约是它的权利，而不是俄罗斯的权利之后。美国还考虑到俄罗斯外长A.B.科齐列夫主张俄罗斯加入北约或者至少和北约建立另外的全欧安全结构的态度，尽管形式上也表示反对没有俄罗斯参加的北约扩大。

世界和欧洲地理政治的根本改变的结果形成了欧洲安全机构改革的变形，导致了旧的“排斥俄罗斯”政策的恢复。1996年E.M.普里马科夫领导俄罗斯外交部之后，知道不可能阻止北约的扩大，努力减少这种进程对国家的不良后果。1997年五月在巴黎0了俄罗斯-北约基本文件，其中郑重宣布俄罗斯和北约“不再相互看作是敌人”。并且确定北约担负不在北约新成员国中部署军事力量的义务。¹⁰可是厥年之后美国就宣布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部署五千军人。在签订文件前美国高级代表直接声明北约接纳前苏联共和国加入意味着越过“红线”。尽管有这些相应的保证，北约还是这样做了（波罗的海国家），甚至还在考虑吸入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的问题。

可是在1999年十一月欧安组伊斯坦布尔峰会上，在通过欧洲安全宪章和对车臣局势问题的一些让步的“噪声”中西方外交达到了使俄罗斯担负从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撤出军队和武器的义务。1999年四月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爆炸声中通过的北约战略概念是示威性的。它似乎和1991年的类似的概念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它有三个原则的特点：北约确定其保护其所有成员的自由与安全的目的不考虑联合国宪章；涉及北约利益的威胁根源名单中增加了“国家社会经济改革失败导致的国内政治局势的激烈剧化”，还有“北约仍敞口接收新成员的大门”。¹¹

经过2001年九月11日悲剧事件导致的政治和感情休克的美国似乎有可能走向集体努力加强国际安全的道路。俄罗斯总统B. 普京和俄罗斯很大部份政界人士的情绪相反，对美国表示支持，希望因而得到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相应的步骤。普京决定在阿富汗方面帮助美国，对美国在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部署飞机和军队“开绿灯”，并在军事上帮助反对“塔利班运动的阿富汗“北方联盟”。总统撤除驻卢尔德（古巴）和金兰湾（越南）军事基地的决定在俄罗斯引起了不同的评

价。俄罗斯外交试图纠正和北约的关系，它在北约于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后冻结。2002年五月在罗马举行的俄罗斯-北约峰会上建立了俄罗斯-北约委员会，它旨在作为协商、统一意见、合作、对欧洲-大西洋地区广泛问题共同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工​​具。可是直到最近它仍然只具有装潢性质，没有保障俄罗斯对北约活动的实际影响。

俄罗斯领导和西方世界迅速接近的希望碰到了美国的拒绝。在很大程度上后者是利用“美国悲剧”来达到自己外交霸权的追求。美国总统Дж.布什奉行强权取换国际法的极端方针，把联合国变为“协商局”，开始改变北约战略，目的是在北约国家范围之外利用北约的武装力量。美国对俄罗斯行动的回答是退出反导弹防御条约、在伊拉克的战争、西方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积极支持、公布加速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计划、指责俄罗斯进行“动力讹诈”。

B.B.普京在2007年二月发表的著名的“慕尼黑讲话”中称美国为今天世界结构的主要设计者，其特性是过分使用武力和忽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例如，他指出不能容许北约取代联合国或欧盟）。普京直接提出了问题：北约扩大，包括与“保障欧洲安全毫无共同之处”的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组件的计划是为了反对谁？试图变为保障一些人的利益，损害他人利益并且干涉它的一些成员内部事务的“可恶的工具”的欧安组的作用是什么？¹²

2008年八月俄罗斯和西方的不信任达到了高峰，当时确信得到美国和欧盟对其反俄罗斯方针的无条件支持的格鲁吉亚发动了对南奥塞梯的侵略。俄罗斯的回答行动引起了西方国家强烈的仇恨的叫嚣，指责俄罗斯恢复“帝国政策”和冷战思维。俄罗斯领导看到高加索的危机证明了自己关于最近20年欧洲安全各方面严重动摇，急需“修理”的声明的正确性。俄罗斯外交特别依据Д.А.梅德韦杰夫总统在2008年八月之前两个月提出的关于签订法律上必须遵守的欧洲安全条约的建议。可是这个建议，尽管由于美国总统Б.奥巴马宣布了“重启”政策，对俄罗斯指责的水平有所下降，它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明确回答。而且美国副总统Дж.拜登相当清楚地表达了美国政府的意见：欧洲不需要新的条约和结构，因为美国将考虑“面临的威胁的变化性质，遵循北约和欧盟等已有的结构的基本原则，致力于建立更安全的欧洲”¹³。

2010年俄罗斯外交政策上有了新的转变，试图确立和西方关系的新的“游戏规则”，使有可能保障自己的安全利益并且依靠和美国、欧盟的接近为国家的现代化方针保障得到西方资本、工艺、专家等等。对北

约的立场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梅德韦杰夫按2010年十一月在里斯本举行的俄罗斯-北约委员会会议结果发表的声明中说：虽然俄罗斯领导没有看到俄罗斯参加北约的条件，随着北约的有助于俄罗斯-北约的更密切合作的改变，可能出现“没有关闭的话题”的情况。¹⁴

与此同时，从西方领袖们的言论看来，他们在给俄罗斯方面预支时，追求的却是和俄罗斯的希望不同的目的。俄罗斯总统Д.А.梅德韦杰夫和法国总统Н.萨科齐、德国总理 А.默克尔在达维尔（法国，2010年十月）会晤时，法国总统回避欧洲安全问题，却很愿意谈论联合欧盟和俄罗斯的因素-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伊朗制裁、寻找调解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方法。美国和它的盟友在里斯本把俄罗斯-北约在阿富汗的协作为重点，作为双方合作的主要方向。与此同时，它们不顾俄罗斯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合组织的积极成员，毫不客气地在阿富汗方向施加“压力”，使俄罗斯处于相当微妙的境地。

俄罗斯方面关于客观现实创造了俄罗斯和北约的不反对任何一方的伙伴的合作的条件的声明，并不能使国际舞台上其他大选手安心。选择诸如阿富汗、伊朗、中东问题上的合作，加深俄罗斯在欧洲反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的对话（自然是为了保护来自东方和南方的威胁）给穆斯林世界造成了俄罗斯卷入西方反伊斯兰战略的印象。印度，别是中国不安了，它们看到俄罗斯和北约的接近显然是因为西方国家吸引俄罗斯参加和解“造反的亚洲”。在2010年十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和欧洲研究中心主办的名为“俄罗斯内外政策的调节：前景和反措施”的科学讨论会上，中国方面通过科学家们的言论试图警示俄罗斯领导不要急于采取趋向西方的步骤。与会者强调现在的政策可能使俄罗斯“重新回到旧耙子前面”，这里指的是М.戈尔巴乔夫、Б.叶利钦和 В.普京奉行的亲西方外交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1998年财政危机和“颜色革命”。¹⁵

俄罗斯国内对俄罗斯领导的新外交政策看法也不一致。例如，广泛的观点是：我国政权同意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将鼓励美国把北约变为世界安全系统的基础，实际上给Д.А.梅德韦杰夫关于建立新的欧洲安全结构的建议画上十字。

俄罗斯和欧洲：价值观不可相容么？

欧委会在2003年十二月通过的欧洲安全战略中把建立与俄罗斯较亲近的关系的前景和“尊重共同的价值观”¹⁶密切相联在一起。在2008年

高加索危机时西方反俄罗斯运动的要点之一是指责俄罗斯不尊重民主价值，人权和法律准则（尽管严格地说，西方国家在轰炸南斯拉夫之后本身应该受到这种指责）。与此同时，西方对俄罗斯的极端态度有其更深刻的根源，它是从XVIII世纪俄罗斯变为欧洲平衡的不可分割部份的时刻开始的。

瑞典的国王卡尔XII，更不用说拿破仑总是以文明的尺度来辩护自己对俄罗斯的进犯，鄙视地说俄罗斯是上帝遗忘了的愚昧黑暗的欧洲边区。XIX世纪西欧外交，首先是英国和法国的外交总是以俄罗斯为“野蛮国家”，不符合欧洲标准，与欧洲文明对立作为替自己对俄罗斯政策的辩解理由。1843年出版的法国旅行家和文学家戴求斯京侯爵的书“尼古拉的俄罗斯”在欧洲国家广泛流传。正如法国科学院秘书O.卡列尔·丹科斯所说的那样，求斯京关于俄罗斯的评论甚至在共产主义已消失和俄罗斯激情趋向欧洲的时刻仍对人们的思想起不小的影响。¹⁷

为什么西方政治家们仍然喜欢这本书中的内容呢，尽管戴求斯京之前和之后都有许多欧洲外交家、商人和艺术活动家到过和描写过俄罗斯。贯穿全书的的相当天才的描写的红线是：俄罗斯是野蛮的亚洲国家，“西伯利亚始于维士拉”-即欧洲始于波兰，俄罗斯在它之外。法国的这位贵族写道：俄罗斯人是“文明的暴发户”，披着“熊皮，下面穿着裘皮”，因为他们基本上仍是“只知道射击武器的野蛮人”。他说，俄罗斯人是“刚从亚洲偏僻地区冒出来的巨人”，他希望统治世界并以“自己的全部重力压倒欧洲政治的平衡”。¹⁸

至于克里米亚战争，尽管当时英国和俄罗斯建立了神圣联盟，它把战争看作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似乎战争不是英国和法国为了削弱“俄罗斯熊”，防止它争夺它们在黑海之外的地盘而挑起的。可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激化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俄罗斯“返回”欧洲。这证明了趋势的特点-当欧洲大国面临严重的震撼威胁时（例如，拿破仑进犯），俄罗斯立即被“写入”决定欧洲命运者之列。可是，当“威胁”消失后，俄罗斯又成为不值得作为欧洲文明代表的无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俄罗斯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损失为协约国对德国的胜利作出相当大的贡献。可是，当再不需要俄罗斯，特别是它卷入了革命混乱之后，“一切就回归原位”。武装入侵、建立“防疫线”、国际封锁-这远非西方国家对苏维埃俄罗斯的武力政策的全部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在全球面临邪恶情况下，意识形态的纠纷立

即变为次要，“布尔什维克”的苏联成为反希特勒德国联盟统一战线的基础。

战争之前文明的度量给欧洲政治打下了明显的烙印。西欧国家和美国直到1940年法国被占领之前一直把德国看作是西方世界的部份并且决心防止“半亚洲的”俄罗斯进入欧洲。英国人特别卖力气：1937年英国外交大臣Э.哈利法克斯公开称赞纳粹德国为“欧洲反布尔什维克的堡垒”。¹⁹ 1942年八月У.邱吉尔在莫斯科和И.В.斯大林谈判不满意时甚至对自己周围人说：“有人对我说过俄罗斯不是人。他们的素质低于猩猩”²⁰。应该说，深知道西方政治家的反苏情绪的斯大林对西方也不赏识，例如，对他的道德和意志的评价很低。相互的鄙视只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联合行动结果退让给了崇高的理想。

在围绕那次战争的性质和结果开展了真正的“历史战争”的今天不能不看到西方对苏联行动评价的更变。如果以前总算勉强承认苏军解放欧洲的使命，现在越来越常听到关于斯大林利用了希特勒的“冒险”实现了占领中欧和东欧国家的“俄罗斯的帝国阴谋的”言论。1996年出版的著名英国历史学家H.戴维斯的“欧洲历史”就是这种解读的鲜明例子，顺便提提，这本书依靠索罗斯基金会的资金在俄罗斯大量发行。戴维斯描绘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是“纳粹分子（不过，是自称的）保护文明的十字进军”，德国占领者不是别的，而是防止对欧洲的“东方入侵”的保卫者。他把苏军看作是“成群穿戴和武装都不好的伊万”，像“亚洲的部落”，对欧洲实行“行凶抢劫和真正骇人听闻的恐怖行动”。²¹ 甚至把苏联人们的英雄行为看作是不符合欧洲生活标准的怪迹。例如，法国的哲学家A.格鲁克斯曼指出：欧洲人难于理解“普通俄罗斯人的动物的反应”，像在拿破仑时期那样，他们表现了为驱逐侵略者而自我牺牲的能力。²²

冷战时代两个实力几乎相等的集团进行的尖锐竞争使关于“西方文明”优势的言论不很迫切。宣传斗争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随着苏联内部问题的增加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混乱，西方对苏联基础的思想的攻击构成了反对苏联作为国家的形式，认为它阻碍西方价值观向全世界的胜利传播。美国总统P.里根（1981-1989年）在反共口号下宣布了对“邪恶帝国”的十字进军，采取了在全球和地区水平上直接对抗苏联，破坏战略平衡的方针。

俄罗斯和西方关系的文明色彩的返回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B.H.叶利钦及其周围人士，他们认为和冷战时期的敌人战略联盟的外交有助于反

对国内的“旧习”。与此同时，许多人，包括外长A.B.科济列夫认为新的俄罗斯应不惜一切代价达到接近“西方文明”，并且不否定主导和从属的关系。他在自己的关于叶利钦的外交政策应该急转弯的言论中甚至硬说，全俄人似乎都就苏联曾对“文明国家社会”²³造成威胁而感到羞耻。美国和西欧国家把这看作是俄罗斯领导否定苏联的过去和对俄罗斯“不文明”的承认。描绘自己国家残缺的俄罗斯领导自然难于指望西方把它当作平等的伙伴。

1994年签订了俄罗斯和欧盟伙伴协议（1997年生效），它具有“教师”与“学生”关系的性质，只在序言中局限地指出“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的历史联系和对它们的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协议确定伙伴关系的存在取决于“俄罗斯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继续和完成”。²⁴ 在这种意义上1998年鲁汶天主教大学（比利时）出版的选集“俄罗斯是不是欧洲大国？”和其中的欧洲政治活动、外交家、科学家们的文章具有代表性。²⁵ 选集的主要内容的含意是把战前和战后的苏维埃俄罗斯都看作是“迷途的”，带有扩张野心的，但毕竟是欧洲的一部份。苏联解体后欧洲主要是开始把俄罗斯看作“学生”并承认它为有“部份”欧洲地位的国家，邀请它观看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它无表决权。选集中说，为了克服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的脱离欧洲的“孤立”，俄罗斯领导必须“证明”自己政策的欧洲方向并使欧洲人“相信”接纳俄罗斯加入欧洲的必要性。

XIX世纪初俄罗斯领导宣称的建设民族国家和奉行独立外政策、恢复爱国主义与民族传统的方针引起了西方世界许多政治家的强烈不满，他们指责俄罗斯恢复“帝国派头”和沙文主义。西欧对B.B.普京关于苏联解体是XX世纪“最大的地理政治灾难”的意见特别不满。例如，前德国外长Ï.菲舍尔声明：大部份欧洲国家绝对反对重新审议苏联后空间形成的秩序，认为苏联消失是“巨大的成就”。²⁶ 上面提到过的普京“慕尼黑讲话”总体也引起了美国和西欧的负面反应，认为俄罗斯总统的“冰冷的批评”是对“新的冷战的暗示”。西方广泛散播同样的观点：西方必须团结自己的队伍，为保护西方的价值观而准备对付俄罗斯的新政策。

欧洲有不少政治活动家认为在联盟与俄罗斯竞争激化的条件下能在质量上加强欧洲于世界政治的地位。也有更激进的说法：应该依靠接纳俄罗斯来挽救“老”欧洲，并且共同建设基于不同价值观，但有共同目的的欧洲。不过，看来不是他们主导欧洲情绪。德国和俄罗斯关

系问题的权威专家之一，德国政治学家A.拉尔还在2007年就指出越来越少欧洲政治家支持俄罗斯加入欧洲的思想。在这里，起了作用的不仅有对俄罗斯的历史成见，还有前华沙条约成员国执政阶层带来的反俄罗斯情绪。拉尔说：对于西欧国家，防止对已经取代了宗教的西方自由价值观的外来威胁的问题有决定性意义。西欧政治家们认为主要的保护者是美国，还有跨大西洋共同体的扩大与加强，他们主张把俄罗斯“推往它的亚洲”。²⁷

毫无疑问，俄罗斯主要是欧洲国家，它和欧洲早已有历史、文化的密切联系和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俄罗斯的社会生活虽然有全球化的破坏现象，深受基督教价值的影响。300多年来俄罗斯优秀的智者从未考虑过离开欧洲，并为欧洲主要国家赢得民主标准而高兴，希望俄罗斯有和欧洲同样的生活质量，作为内部发展的方向。可是西欧从未“真心”把俄罗斯看作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没有让它接近到在全欧震撼，需要它时的程度。今天，当共产主义已崩溃，俄罗斯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时候，西欧并不急于和俄罗斯“重启”关系，仍然按着“暂停”按钮。

应该说，今天的俄罗斯为欧盟拖延签订俄罗斯和欧盟新的基础协议，无限期推迟解决签证制度问题提供了不少借口。在俄罗斯可能看到大部份欧洲人难于想象的社会分化水平，令人惊骇的贪污水平，跨越了俄罗斯国界的有组织犯罪现象的增多。在俄罗斯自己不割除这些“肿瘤”之前，欧洲人有理由把俄罗斯当作欧洲的“异类”。

俄罗斯有历史理由的对欧洲的倾心必然伴随着它的外交更有力地影响欧洲政治的要求。可是仅靠俄罗斯纳入西方政治和经济结构，而且依照西方文明的重点准则与关于不可避免的“东方威胁”的理论是相当不理智的。世界秩序在根本演变，已经出现国际政治的新的中心和不断深入的美国和中国的竞争。欧洲本身处于“乐观时代”的末期（从柏林墙崩溃到财经危机的开始），这表现在对欧洲一体化水平不可动摇的极大怀疑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上面。

在世界力量对比变化条件下俄罗斯领导面临选择-或者满足于已有的“保险”-核武器和“动力外交”，或者作为积极的多极世界的拥护者，集中力量把俄罗斯变为这样的一个极。历史证明俄罗斯力量和威信的提高首先与其内部问题的成功解决和奉行维护作为两大洲的大国的战略地位的民族外交政策相联系。

注解:

1. 俄罗斯外长C.B.拉夫罗夫在伦敦经济学校讲话摘要二月15日2011 // 俄罗斯外交部网址 (www.mid.ru).
2. 基辛德 Г.外交. М.:拉多米尔, 1997. С. 223.
3.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July 1994.
4. 在线“人日报”(俄语), 2009年十一月19日。
5. 普里马科夫E.M.世界没有俄罗斯?. 政治的近视会导致什么 М.: ИИК «俄罗斯报», 2009. С. 168.
6. 葛罗米柯 A.A.纪念. 第一本 М.:政治出版社, 1988. С. 387.
7. 尔日谢夫斯基 O.A.战争与外交:文件、评论 (1941-1942). 科学出版社, 1997. С. 28.
8. 回答时代的挑战. 改基外交政策 «全球出版社», 2010. С. 328, 338-339.
9. 新欧洲宪章. 巴黎1990年十一月21日 // 真理报1990年十一月22日。
10. 俄罗斯联邦和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关于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1997年五月27日 // 俄罗斯报 1997. 年五月28日
11. The Alliance's Strategic Concept. Approved by the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meeting of the North Council in Washington D.C. on 23rd and 24th April 1999.
12. 俄罗斯总统B.B.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慕尼黑, 2007年二月10日 // 俄罗斯报。2007年二月12日。
13. Biden J.R. Advancing Europe's Security // The New York Times, May 6, 2010.
14. 俄罗斯总统Д.А.梅德韦杰夫关于俄罗斯-北约委员会会议结果的记者招待会。2010年十一月20日 //俄罗斯总统/事件网址, 2010年十一月20日。
15. 俄罗斯进入了“战略可能性时期? // 在线”人民日报“(俄语.), 2010年十一月22日。
16.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Brussels, 12 December 2003.
17. Carrère d'Encauss H. La Russie entre deux monde. Paris: Fayard, 2010. P.15.
18. 求斯京 A.尼古拉的俄罗斯. 政治出版社, 1990. С. 106, 182-183, 186, 254.
19. 基辛德 Г.命令, 文章. С. 275.
20. 语录. 尔热谢耶夫斯基 O.A.斯大林和邱吉尔. 会晤. 交谈. 辩论 документы, 文件、评论 1941-1945. 科学出版社, 2004. С. 374.
21. 戴维斯H. 欧洲历史. М.: ООО «出版社АСТ»; «图书运输», 2004. С. 752, 765, 771.

22. A.格柳斯曼对“新报”的谈话 // 新报№1. 2010. 一月11日.
23. 叶利钦 Б.Н.总统笔记. “星火出版社”, 1994. С. 394.
24. Agreement on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establishing a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 of one part,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the other part. Corfu, 24 June 1994 //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4 November 1997.
25. Is Russia a European power? The position of Russia in a new Europe. Leuven: Leuven univ. press, 1998.
26. Fischer J. Worsicht vor Russlands Geopolitik // Financial Times Deutschland, 8 August 2010.
27. 拉尔 A.相互理解的倒退 // 独立报2007年一月30日。

关键词：俄罗斯和欧洲，欧洲政治，历史追求，欧洲安全，力量平衡、北约推进，欧洲一体化，欧洲联盟，欧洲价值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国际生活

新
闻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在对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理解的许多中东和北非国家，复杂的社会-经济进程，长期以来在其深处发展，“政治大洋”表面呈现的相对的风平浪静，实际上是“死气沉沉的动荡”。”

弗拉基米尔·库兹涅切夫斯基：

“.....现在仅我国有能够推动这个问题解决的正式立场。仅在我们国家文件中有确定的对利比亚那种复杂事件的原则态度。这首先是俄罗斯联邦的外交政策理论，其中明确地写着：“XXI世纪调节国际关系和协调世界政治的中心仍然是联合国，它有独特的合法性并证明了自己的无可取代性质.....”

瓦季姆·鲁科夫：

“.....天金砖国家占世界总产值25%（按民族货币的购买力）、土地面积30%、世界人口的45%。在金砖国家经济总的超前增长的条件，在过去的一年增加了它世界总产值中的绝对份量，而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

尤里·沙弗兰尼科：

“.....应当将精力集中在自家的问题上，集中在像索尔尼琴认为是最主要的问题上——我们如何来安顿俄罗斯，安顿自己的社会，自己的经济。当然，邻居总是挺乐意去造型良好、舒适和好客的家。按惯例，他们不是空手上门。也就是说，在安排了自己的家后，就不会存在投资，技术熟练人才缺乏的问题。”

加列金·托苏尼扬：

“.....确实如此，近三年来，我们谈的尽是世界金融危机问题。就跟英国人惯于谈论气候一样。我已多次就此问题表态过：我国所经历的，同其它世界国家经历的事件，有截然不同的区别。我们的金融危机在于金融服务不足。现在，这一潮处于退潮阶段。2010年的指标呈现肯定的发展趋势。”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大学）教授

orlov_a@mgimo.ru



21世纪的首场革命

今年一月份突尼斯掀起的抗议浪潮席卷了大部分中东和北非地区。约十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其中（在撰文时），有两个国家的制度已被推翻，另3个国家处于极度复杂和面临崩溃的状态。还在不久前，人类欢庆新到来的2011年时，谁都未曾想象到阿拉伯世界发生的破坏性剧变迫在眉睫。因此，自然产生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何评定世界此区域今天出现的一触即发的进程？

对问题做最简单和表面性的推论，那就是将事件说成是以青年为主的局部的自发性暴乱。对这些青年，起初都不予以注意，接着是执法机构对他们评估又过低，随后则演变为进一步的群众抗议。当政权，特别是事发国的突尼斯当局开始惊慌，力图平息暴乱者时，已经晚了。滚压机已被启动，阿拉伯世界的标志性人物一个个下台——首先是本·阿里，接着是穆巴拉克，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越来越大的危机漩涡，将新的国家卷之内。看来这种推论也有其逻辑性，但显然是不够。

各种有关这是西方和伊斯兰幕后策划的“阴谋”企图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当然，其中少不了这种策划（幕后），但不能对其参与组织暴乱

估量过高。看来，发生的事件规模，无论对哪一方来说，都是出乎预料的。因此，对中东和北非的危机原因做这种简单和轻浮的解释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危机原因不在于表面，它们涉及到社会基层和上层建筑的基本问题，我们作为群众抗议的见证人，根据所有特征，可将其归为21世纪第一场真正的大革命。这场革命既具有同以往革命相同的特征，又有自己独立的和特性的表现。

在对我们现在有很大理解的许多中东和北非国家，复杂的社会-经济进程，长期以来在其深处发展，“政治大洋”表面呈现的相对的风平浪静，实际上是“死气沉沉的动荡”。所有危言耸听的剧情同阿拉伯世界极端伊斯兰影响力的增长是相连的，但绝非与往后有不同社会阶层介入的群众革命示威相连。这里，世界对中东冲突的特殊关注，无疑起影响作用，在其作用的背景下，原则上不再那么重要的区域国家的内部矛盾，退居第二位。

最终发生的是在经典革命理论上称之为的尖锐化——生计无着和被弃的社会阶层的需求和贫困高于一般水平。再说，被归为这一范畴的并非只是多半人，而是压倒多数的居民。现代资本主义在积极地再生社会的不平等。这个进程拥有通行性并涉及到所有国家。在发达国家其不那么明显，但也已易见，特别是在不知是已结束了，还是在继续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背景（世界主流专家就此问题产生分歧）情况下，尤为明显。在属于周边国家的中东和北非，社会不平等现象达到悲剧性水平，尽管其中一些国家因自己取之不尽的石油储量，在与邻国相比之下看来甚至很富裕。

相对来说，一些为数不多的，诸事顺利的社会部分——现代的贵族帮——他们在享受超越一切规范的福利，不予以其他部分居民任何可待之的东西，也不为自己天文标准的生存在这部分居民前做辩解。这种绝对失衡的社会-政治体系致以不负责任部分的执政阶级不可遏制的腐败和道德败坏的产生。

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经济因素与被当局对社会因缺乏实际民主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疏忽重叠。执政数十年的领导人有意将政权移交亲子为继承人，又以在外形上保留类似可控性选举的某些民主标志的同时，设立新酋长和苏丹。出现了许多作为革命共同特性的“上层”危机，在他们继续认为自己享有无限权力的同时已是丧失了权力的人。

在社会爆炸条件下，以作为制度稳定担保人的领导人为支柱，导致其像政治避雷针，将社会大部分人多年累积的反抗能量集中于本身，成为反面英雄。发生了形形色色的客观上和主观上所有因素的某种人格化，从而引向革命。推翻政治斯芬克斯的思想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力量，通常将不同一的抗议民众团结在一面旗下，并在初步阶段上予以起义一定的理性。

没人知道在完成推翻原受崇拜的领导人的任务后，革命的第二阶段事态将如何发展。起义者将争取达到何种目标，他们是否有这种目标，是否能理解自己贫穷的根源，还是以虚幻的目标来替之，他们行动上的独立性能有多高，还是等待他们的是受职业木偶艺人操纵的前景——所有这些问题日益居于首位。

下面我们就涉及阿拉伯世界当今革命的主要特性，当今的革命同20世纪大多数革命根本上的区别，包括1950-1970年在该地区发生的革命。

现代的政治风暴同以往比较更具有自发性，更难以控制。今天的革命不存在鲜明的，作为政党或是杰出领导人带领群众征服政治高峰的先锋队。革命不再是有觉悟地，受理智和心灵召唤加入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带领争取为现代超务实时代认为是不切合实际的崇高理想。现代的革命家不再是体现心目中自由和公正世界新思想的代表者。

以往中东和北非大多数标志性的革命政变，均带有浓厚的社会滋味的民族解放倾向。现在就没有。尽管今天推动革命的无疑是社会经济原因，但它被提出首先进行政治改革的要求排居第二。难道真的就像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富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预言的那样——发生了作为最终管理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通用化？看，阿拉伯世界不也就是为了争取这种民主而起来了么？有可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挺乐意从这个视角来解释今天在中东和北非发生的事件。

就民主模式本身而言——自由选举、诚实和开放的政治斗争、为向公民传递自己施政纲领的竞争方提供同等条件、排除为自己而损害政敌利益启用执政党或集团行政手段可能性等，不仅没引起隔绝，而是任何一个成熟的政法体系确定不移的条件。但美国对此模式理解，是以与东方“道德价值观”解说格格不入的无节制消费社会和实质上相当于为所欲为的自由的美国生活方式为必要附加条件。阿拉伯世界需要美国的生活方式吗？能接受吗？这种方式合乎东方民族的世代传统吗？对这些问

题做出的肯定是负面的回答。但美国人自己是否需要在中东和北非建立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模式？如果需要又将是何种形式？这也还是一个大问题。

通常认为，美国具有很强的分析力度，其由各种用自己的产品供养国家上层政权的“智囊托拉斯”提供。真是如此吗？这个分析机制就不失灵？有种感觉是美国人今天将摧毁阿拉伯世界一些关键政权的工作搞成程序化，并不在考虑自己政策的后果。使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阿富汗的情景。当时，美国以同苏联作对为目的建立的激进伊斯兰运动，成了现代世界秩序的“黑洞”，现在，美国人不得不自己来整顿秩序，但就事态的进展来说，也不见有多大的成功性。像在利比亚和叙利亚这样的国家——首先是这两个，名单中还有其它国家——如果制度垮台，除美国的欲望外，实际上又是靠他的扶持，上台的可能将是激进的伊斯兰，而对他们来说，代表性的民主赞美诗只是小孩玩的糖果纸。不知美国思想家是否懂得这一点，还是华盛顿兜里另藏有自己中东模式的纸牌卦？无论怎样，美国断绝了不少条退路，而这是一项负有责任的决定，如果不以具体的计划来充实，那就是一种投机，或是碰碰运气的做法。

就中东和北非的稳定前景而言，还是没有明确性。就在首先发生革命和取得所寻求目标的国家（突尼斯和埃及）——可憎的独裁领导人被推翻，远非未使局势完全正常化，民众不满情绪此起彼伏。一系列国家的群众抗议运动在继续增强，离结束还远着呢。阿拉伯世界的更新和发展潜力依然将非常高，抗议行动趋于低潮，也只是因抗议者疲劳的一种暂时现象。

局势还因暴乱者及其领袖（如果真有的话）对能满足自己的社会秩序模式没有明确的概念而复杂化。这种情况加强了今天革命行动中趋于自发性造反的部分人。对卡扎菲的小儿子和三个孙子遭北约空袭死亡，在本加兹乐开眼笑的欢庆人群上空飘扬起美国国旗的现象，不应当有错觉：人群中没有人因此就更喜欢美国，只不过是这一天，他们应当对北约干这起脏活表示感谢。再说，这些人对美国的民主也不见得会更崇敬：一旦掌权后，他们就会信仰民主和成为民主人士的典范，说实在的有点不可信。

中东和北非的事件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规律：在本历史阶段上，实质上为革命成果的，因一些其它原因，其中首先是社会-经济原因，由于缺

乏明确目标，能是不涉及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的转型。不公正社会的起因——反抗情绪的现实再生器，看来，不会被触及，而这意味无从保证民众抗议的不再显。

但这只是对未来的一种思索。没人知道这场革命在何时及何种结局结束，为社会又会带来何种实际变化。这种不确定性显著加强了外界对事态进程的干扰，这种干扰表现于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特种部队击毙，令全世界大松一口气，但对谋杀事件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没有明确性。这次成功的战役，能对阿拉伯世界的事态发展带来恰恰相反的，节外生枝的后果——自革命浪潮的平息和步入稳定状态到一定部分暴乱者进一步激进化，反美反西方情绪将加烈。

关键词：中东和北非的危机、本·拉登、社会的不公正、激进伊斯兰。

弗拉基米尔·库兹涅切夫斯基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主导科学工作者，历史学博士

smith@mail.ru



利比亚的非常事件和 国家主权问题

北非和近东国家三月和四月人民革命，特别是利比亚阿拉伯民众国的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在解决国际冲突方面作用的注意。辩论的核心，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辩论核心是世界社会对民族国家政治生活干涉的界限，即在现代国际条件下保持民族国家主权的问题。实际上这里指的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原则的命运*。随着利比亚事件的进展，西方和俄罗斯媒体都提出了关于是否放弃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原则的问题。例如，侨居美国的俄罗斯人尼古拉·兹洛宾，世界安全研究所俄罗斯和亚洲计划经理（华盛顿市）在俄罗斯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主权的末日”，其中实际上声明持续到今天的，基于威斯特伐利

* 按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建议在1945年二月于雅尔达建立基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原则的联合国，依照这两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的想法，应该保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维护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遗憾的是1945年四月12日Ф.Д.罗斯福逝世后，这种模式形成了两极世界方式。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还是保障了世界半个世纪的稳定。不管是朝鲜战争，柏林和加勒比海危机或其他事件都没能动摇这种模式的牢固性。但这只持续到了1990年代，当时苏联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联合国的作用被美国总统的政策所取代。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冲突都不再是联合国的事情，而主要是打着北约招牌的的事情。南斯拉夫、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已不是联合国的，而是美国领导的北约的事情。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及其严格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的原则已实际上被取消。

亚体系的国际法已成过去。兹洛宾写道：“日本和利比亚那样的悲剧不可能保持民族的中立”。因为在XXI世纪“在对待全世界社会重要利益时不能保持对民族国家全面主权的重视，保持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或者不容许世界社会力量保障国家、地区或人们安全的原则，否则世界社会将付出太大的代价。至少这是我从华盛顿的看法”。¹

利比亚事件的确对联合国，特别是对其执行机关-安理会产生了瓦解作用。

最早就“利比亚阿拉伯民众国过去和现在严重违反人权和国际人文法律”发表声明的是阿拉伯联盟、非洲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那样的大型组织。2011年三月12日阿盟委员会通过了决议，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对似乎是进行了消灭该国平民行动的利比亚政府的空军实行禁飞区。

法国根据这个文件，建议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利比亚局势，要求国际社会军事干涉利比亚事件。法国的建议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积极支持，它们支持法国的建议各有自己的原因。

2011年三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利比亚的1973项决议。尽管前言中强调联合国安理会“重申坚决支持利比亚阿拉伯民众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决议的第四条中特别说明“同时否定外国占领力量以任何方式在利比亚任何地区的存在”，第6和第8条却授权“联合国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在利比亚阿拉伯民众国领空的禁飞，以帮助保护平民”。

“必要措施”在决议条文中没有译释，可是西方世界国家利用这种模糊的文词作为武装干涉利比亚内部事务的可能性，把自己的武装力量支持利比亚内战的一方，实际上违反了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利比亚事务的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武装干涉使世界和俄罗斯社会舆论震惊。在德国导致了它拒绝参加对利比亚领土的轰炸。俄罗斯媒体中出现了分歧。部份专家认为俄罗斯在投票时本应使用否决权，另一部份则声明为了民族利益，应该采取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正确决定。

三月21日俄罗斯总统不得不作解释：“我们这样做是有意识的，这是我给外交部的指示”。

可是随后出现了影响俄罗斯立场改变的事件。

问题在于西方国家盟军的行动没有导致所期望的后果：班加西起义者节节败退。法国、英国、美国外长（阿列纳 久彼、威廉 黑格、希拉里 克林顿）就此声明，尽管联合国安理会2011年二月26日的第1970项决议“全面”和“立即”禁止“从利比亚阿拉伯民众国领土上或通过其领土直接和间接供应、出售和移交”“武器、弹药、军事机器和技术，半军事化设备和备用零件”，西方表示打算讨论实际向利比亚起义者供应武器的问题。

此后俄罗斯发表了一系列正式声明。起初是俄罗斯外交部代表，后来是谢尔盖 拉夫罗夫亲自发表了声明，指出1973项决议是“草率通过的”，西方国家对它的条文的“扩大的解读”，特别是干涉利比亚事务的不适宜的规模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俄罗斯外长提出两个理由作为对新立场的解释。第一，1973项决议中没有规定允许轰炸。第二，利比亚在进行着内战。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对利比亚政府军的大规模轰炸实际上是站在利比亚对抗的一方，这违反国际法。

三月25日中国和俄罗斯外交部同步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声明中国主张“尊重利比亚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主张“利比亚国家事务与未来应由利比亚人民自己决定”。2011年四月5日俄罗斯和中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当天在俄罗斯外交部的网页上出现了关于俄罗斯副外长亚历山大 萨尔塔诺夫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在莫斯科会晤的消息。双方就利比亚军事行动的继续，导致平民的伤亡表示“严重不安”，强调“十分必要立即停止战火和流血”。

此前不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解释了外交部的枯燥的记录性的报导。它题为“利比亚事件：西方国家应放弃管理世界的思想”。其中写道：“在保护和平居民利益的借口下西方主要大国不仅在经济方面保护西方的利益，而且仍然认为它们应管理世界。正是这种思想使法国、英国和美国毫无顾忌地在利比亚开始军事行动”。随后是：“领导世界的想法过去已为某些西方国家带来了不少麻烦。新的困难并不符合西方国家长远的利益。世界在变，如果总是坚持解决各种问题的老办法，就可能不仅损害别人，也损害自己”。²

中国用自己职业外交家的言论和“人民日报”委婉地呼吁西方军事联盟返回国际法律场地。实际上这里指的是深刻得多的问题。对1973项决议的扩大解读和随后西方国家盟军的行动不仅提出了利比亚问题及其境内事件，而更重要的是关于联合国在变化的国际实际形势中的作用的适宜性问题。甚至对这方面事件上的初步分析与世界媒体对它们的反映就表明：这里指的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原则在XXI世纪国际关系中的适宜性问题。

俄罗斯和西方的许多专家都认为：在利比亚局势中，西方国家把自己驱入了法律的陷阱。法国、美国和英国大声高喊应该排除卡扎菲在利比亚民众国领袖的地位，宣布他为国际罪犯，但对这一切没有提出任何法律根据。不管西方大国怎样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辩解，谁也不能否定M.卡扎菲是利比亚领袖的事实。因此西方不得不后退，开始劝说卡扎菲自愿离开利比亚。

现在美国官方已经不是一般地试图推翻卡扎菲，甚至杀死他（世界媒体有这种消息），而是劝他自愿放弃政权以换取关闭他在国际法庭的案件。英国在这方面更卖力。英国“卫报”写道：“美国和英国企图确立要求卡扎菲放弃政权的世界一致意见”。³

一句话，西方回到了重新承认卡扎菲是国家首脑的立场。陷阱盖上了。

可是，他们在自己钻进的陷阱里继续在确定他们自愿意钻入的行动的逻辑。这表现在法国、英国和卡塔尔劝说卡扎菲自愿下台的同时，突然仓促地承认完全不清楚的结构，没有组织结构，不知道由谁组成的结构，甚至在他们自己眼里都觉得毫无合法之处的所谓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合法政府。“卫报”公开承认：“对我们极其重要的是更好地了解他们是谁”，即构成这个全国委员会的人们。

实际上西方联合军队是在为实际上未知的力量取得政权扫清道路。西方军人（例如，北约的海军上将斯塔夫里迪斯）直接说：在这个国家委员会里有恐怖分子、“穆斯林兄弟会”、“基地”代表、利比亚运动“赫兹博拉赫，还有天知道是谁的人。

一句话，从联合国宪章第51条看来，西方在自己的行动中是完全糊涂了。这一条写明“在联合国安理会未采取支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措施之

前，如果联合国的成员国受到武装袭击，它有进行单独和集体自卫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2011年三月23日伦敦的“卫报”登载了埃德里安赫米尔顿的名为“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末日”的文章，指出世界“永远变了”，北非和近东事件是“全球更变的前奏”，其结果（结束的方式）不可预测。作者写道：“暂时我们还未接近对它的认识。但我确信：历史在变动，我们还是在变动初期”。

最有趣的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认为出路在于立即恢复联合国的作用。“年初，当奥巴马总统在追求自己的目的，而其他世界大部份都忽视了联合国时，联合国似乎是完全被排除出了世界程序并丧失了威信的机构”，但现在“联合国又像在冷战时期那样，被看作是国际合作建立的基础”。

俄罗斯专家们对此意见纷纭。

杂志“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主编Ф.鲁基亚诺夫在评论“利比亚旋涡”5时完全回避了国际对联合国在利比亚冲突中的作用，只以“某个最著名的欧洲外交官”的话掩饰。Ф.鲁基亚诺夫说，他阴沉地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全面的混乱可能是最适宜的结果。”⁴

“国际生活”杂志主编阿尔缅 奥加涅祥在三月24日说得比较具体：“联合国的最后决议势必导致这个组织的改革，而且将在重新审议安理会作用方面，这自然不符合俄罗斯利益”。⁵

莫斯科卡尔涅吉中心经理德米特里 特列宁说得更具体。2011年三月19日他对INOCMI.Ru发表谈话时对此的一系列问题提出思考。他说：“世界越来越不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国家模式。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人道原则越来越矛盾。在这种条件下怎样对待大规模违反人权的政府呢？武装干涉的界限是什么呢？立场的标准何在，谁是裁判和谁是执行者呢？闭眼不看这些问题，只批评入侵是不行的：全球化形成国际社会。不解决这些问题国际关系将越来越常成为那些为入侵制造理由和那些喜欢或不喜欢对它们做出反应的国家的人质”。⁶

怎样摆脱这种局势呢？是否需要摆脱它？看来，西方对此并不需要。主要西方国家的执政上层完全满意1991年后的局势：他们的国家可以

用武力解自己的动力、原料供应，在国外销售其工业、农业和信息产品的问题。正因为这样，还在2003年前美国国务卿根里·基辛德就急忙宣布“国家主权思想无意义”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灭亡”。⁷

可是美国国内对此问题意见也不一致。在“俄罗斯报”登载上述文章两星期后，西方大国盟军在利比亚的行动暂时失利，美国总统的那个俄罗斯顾问又在该报发表了大大更改了他原来的观点的文章。它名为“再谈世界秩序”，其中实际上是反映了他发明的新的绝对：“对利比亚不仅需要政治的，还需要社会的合法性”。

“按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利比亚进行的军事行动（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项决议中没有任何一个关于联合国安理会允许在利比亚进行军事行动的言词-B.K.）对世界社会提出了许多需要解决的新的困难问题。而且，第一，最好是共同寻找答案，以免增大世界社会的分裂，导致世界的严重不稳定，第二，需要尽快寻找，因为对新世界秩序规则、国际法基础理解的模糊是对国际关系的埋下的定时炸弹”。⁸

H.兹洛宾又故意地重复了自己错误的说法：“在利比亚的国际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在于它是世界新历史的空前例子”，但也不得不承认所谓“联合国的法律上的合法性不能使利比亚军事行动具有政治、社会，乃至人道的合法性”。

“结果形成奇特的局势：国际力量在利比亚完全合符规律和合法的行动（上面已说过，H.兹洛宾的观点并没有得到1973项决议本身的证实）似乎是发动的侵略并引起不同国家的抗议。造成的情况是，联合国在现代世界已经不能起调解国际关系的最主要的作用？如果是这样，我们面临着彻底丧失冷战时期给我们留下的国际机构，它对现代世界进程的适宜性。这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可能需要通过提出新的现代国际机构，避免使今天无极的世界秩序变为全球的混乱”。H.兹洛宾结束自己对第一篇关于利比亚的文章的“修改”时也像第一篇文章那样：“至少这是我从华盛顿的看法”。

结束语是有深意的。美国政府顾问承认美国对利比亚的行动引起了世界社会舆论的分裂，正因为这样美国在利比亚问题上决定让法国和英国独自去面对分裂的世界。

看来，利比亚问题的确成了今天美国执政阶层的转折点并迫使它更深刻地考虑自己最近20年来在世界上的行动的适宜性。

现在仅我国有能够推动这个问题解决的正式立场。

仅在我们国家文件中有确定的对利比亚那种复杂事件的原则态度。这首先是俄罗斯联邦的外交政策理论，其中明确地写着：“XXI世纪调节国际关系和协调世界政治的中心仍然是联合国，它有独特的合法性并证明了自己的无可取代性质……这就要求……进一步提高对支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承负主要责任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活动效率”。

与此同时理论强调必须“为了使联合国有计划地适应世界政治和经济变化的现实而进行合理的改革”。

暂时俄罗斯外交政策理论是世界上唯一提出了在国际一致的基础上按国际现实改革联合国的任务的正式文件。

怎样达到它呢？

今天的出路只有一条-法律道路。为了避免依赖人们、社会集团、个别国家政府在国际社会应该（或者相反地，不应该）干涉某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联合国应该制订相应的国际规则并按照大多数国家-联合国成员国（或者一致通过）的意愿固定它。确定这种干涉（或者相反地，不干涉）的相应的准则。

利比亚复杂事件至少对俄罗斯政权提出了两个迫切的任务。

修改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理论，使之更明确地写明保护国家领土完整与国家合法政权的合法可能性，如果对我们的独立出现外来和内部的侵犯。

开展关于确切联合国宪章第52条的辩论，尽量确定什么是外来势力和内部暴动力量和组织对民族国家的国家主权的侵犯。更准确在写明保护合法政权免受国内外侵犯的保护机制，同时从国际法观点确定国际社会进行合法的干涉（或不干涉）的极限。

这里谈的是考虑1946年以来国际条件的变化对联合国基本文件，首先是联合国宪章的较大“修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依据俄罗斯对外政策理论，有一切理由建议开始对联合国宪章进行适应雅尔达协议以来世界变化的修改的国际规模的讨论。

注解：

1. 俄罗斯报。 23.03.2011.
2. <http://russian.people.com.cn/95460/7338559.html>
3. Guardian, 29.03.2011.
4. www.globalaffairs.ru/redcol/liviiskayavoronka-15153
5. www.rian.ru/authors/20110324/357382681.html
6. www.inosmi.ru/op-ed/20110319/167517176.html
7. Die Welt. 05.05.2003.
8. 俄罗斯报。 06.04.2011.

关键词：利比亚阿拉伯民众国。民族国家主权，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际法。利比亚复杂事件。

瓦季姆·鲁科夫

俄罗斯总统驻“八大国”副代表、俄罗斯外交部驻“二十国”和金砖国家问题协调者、特任全权大使、历史学博士

vblukov@mail.ru



金砖国家 —— 全球意义的因素

金砖四国首次峰会（2009年六月16日）以来，它的工作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这不足为奇。按我国的建议建立的组织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了国际政治的实际因素。

参加它的有五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共和国。今天金砖国家占世界总产值25%（按民族货币的购买力）、土地面积30%、世界人口的45%。在金砖国家经济总的超前增长的条件下，在过去的一年增加了它在世界总产值中的绝对份量，而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

2011年四月14日在三亚市（中国海南岛）举行的第三次金砖国家峰会表明这个国际组织地位从上次在巴西举行的峰会（2010年四月15日）以来得到了很大的巩固。

金砖国家在这段时期证明了自己的世界经济活跃力量的作用，它们经济增长速度和发达国家的比较证明了这一点。

2009年-2012年金砖国家国家国内总产值的变化表
比前一年的%，2011-2012-预测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巴西	7.5	4.5	4.1
俄罗斯	4.0	4.8	4.5
印度	10.4	8.2	7.8
中国	10.3	9.8	9.5
南非	2.8	3.5	3.8
美国	2.8	2.8	2.9
欧盟	1.7	1.6	1.8

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1.

今天金砖国家各国的增长将近点全球国内总产值的50%。一年来。在金砖国家各国经济超前增长的条件下，增加了它们在世界绝对总产值中的比重，而中国成了世界经济第二大国。金砖国家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种情况：正是依靠它的努力，建立的和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地位得到加强。

这次峰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首次成为有南非参加的“五大国”峰会。2010年十二月接纳非洲联盟首领之一、不结盟运动的权威成员加入扩大了金砖国家规模，增加了它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共同行动的可能性。

金砖国家的第三次峰会的特别意义是它在所有“五大国”都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工作的时期举行。

从峰会的结果中首先应指出如下一点。

在三亚的峰会上确定了金砖国家在现代国际系统中的地位，确定了它的活动原则。“金砖国家成为经济、财政和发展方面对话和合作的主要平台之一。我们坚决在金砖国家范围内，在实际态度的基础上和依照开放团结与相互帮助的原则，为了共同的利益，进一步逐渐地发展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我们重申这种合作只是相互性的，不反对任何第三方。我们敞开和非金砖国家成员国，特别是和建设着市场经济的和发展中的国家，还有相应的国际与地区组织合作”-与会者在总结宣言中发表了这种声明。

这样，“五大国”明确表明自己是按照多极世界逻辑活动的联盟。金砖国家不打算建立新的，在经济或政治军事方面反对其他国家的联盟的“极”。相反地，年轻的联盟表明自己是愿意进行最广泛的伙伴合作的结构。

金砖国家在现阶段活动的基本重点是纳入“二十国”职责范围的财经问题。

第一，金砖国家伙伴们正是在这方面形成了共同的战略性利益。金砖国家的所有成员国都主张深刻改革世界财经结构，主张使之符合世界经济的新现实，其中出现和顺利发展着几个新的力量中心。形象地说，金砖国家是国际财经关系改革者联盟。上述共同的根本利益是位于四个大洲，有不同的历史的国家长期合作的强大动力。

第二，全球财经危机事件上表明不仅国际经济安全，而且在安全这个词的广义上的国际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世界财经系统的“结构”。保持既不能预测危机，也不能采取高效地防止或局限危机的措施的散乱的系统是危险的。因为世界社会不能允许重复类似规模的全球危机，特别是考虑到2008/2009年危机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尚未消除，它们的深刻的原因也未排除。

我们要强调的是：金砖国家的伙伴们推动国际财经机构的改革并非仅关心自己的利益。它们看到所有正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五大国”提出的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纲领证明了这一点。它建议巩固所有国家在国际财政结构中的关键地位。

大概金砖国家峰会是首次如此详细地讨论了世界政治上最灼热的问题。

辩论的焦点是利比亚和较广泛的近东、北非和西非的局势。

所有与会者都强调北约国家对利比亚的，更改国际社会议定的目的的方针。联合国安理会第1970和1973项决议的目的被另外的“人文入侵”和更换不满意的政权所取代。峰会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利比亚冲突应该用政治-外交方法解决的理论，而金砖国家国家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范围内加强协调行动。

“五大国”领袖在峰会宣言中声明：“我们对近东、北非和西非的不安局势深刻关切并真诚希望事件涉及到的国家能达到和平、稳定、繁荣

和进步并且按其人民的合法愿望在世界上居应有的地位。我们应该避免武力。我们认为必须尊重每一个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与此同时，峰会上指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碰到共同的威胁和挑战，它们要求统一行动。这是不断增大的恐怖主义，贩毒、海盗、信息犯罪的威胁。俄罗斯总统Д.А.梅德韦杰夫就此提醒伙伴们对我国关于在联合国范围内起草反对信息方面犯罪的万能公约建议的注意。由于在国际法范围内尚未制订出向信息通讯工艺(ИКТ)方面的威胁作斗争的机制，这种文件是必要的。

峰会上就“二十国”峰会即将在法国召开(2011年十一月)着重讨论了财经问题。

金砖国家各国对即将举行的峰会的议事日程中的关键问题：关于实现自信、稳定和平衡的增长的协议的途径，关于国际财经系统的改革，关于为了防止投机资本“转流”休克而调节资本市场，关于减少原料商品的价格波动等问题有很近似的立场。

峰会的宣言中反映了这种共同的政治基础。它的宣言中说：“我们支持国际货币系统的改革，有广泛的国际储备货币系统将保障稳定和可预测性。我们欢迎正在进行的关于在现有的国际货币系统中借贷权(СПЗ)作用，包括特别借贷权的货币篮子成份的辩论。我们更加注意与今天建立市场经济国家碰到的跨国资金本大量移动有关的风险。我们呼吁进一步改革国际财政调节，加强财政调节和监督方面的政策和合作，协助全球财政市场和银行系统的稳定发展”。

峰会上尖锐提出了关于保障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汇率稳定的必要性和发行储备货币国家奉行负责的宏观经济与货币贷款政策的必要性。

提出了呼吁减少大量资本跨国移动造成对“新经济”风险的具体建议。例如，提出了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订国际财政市场参加者某种行动准则的思想。这种准则使有可能减少突然的行情起伏的不良后果从市场的某个地域转到别的国家和地区。还提出了委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监督跨国资本流动的建议。

峰会上对减少国际市场原料价格起伏问题也给予了很大注意。

最近几年这种价格的急剧起伏给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带来了严重问题。事实证明，价格上涨越高，随后的意外下跌也越严重。例如，从2008年四月到2009年四月石油价格从每桶110美元下跌到了40美元，相当于三

分之二，后来，到今年四月初又上涨了两倍半，达到100美元。2010年铝、铜、镍的价格平均上涨了38，5%。

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起伏特别严重。由于食品和农作物生产方面的不景气，对食品的需求在可预测的未来将明显超过生产增长速度。这已“预定”了物价上涨的趋势。此外，还有其他因素，例如，某些发达国家为扩大生产第一代生物燃料减少食品种植面积，使2010年世界市场的玉米价格上涨了1，3倍。

考虑到这些因素，三亚峰会提出了减少原料市场价格变动的具体建议。在农业市场方面建议为增加食品生产而加强国际合作，使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话积极化。强调加强市场监督措施，限制食品市场的投机行动的意义。

在中国的峰会后西方媒介出现了对金砖国家各国的批评，说它们企图“指使”“二十国”行动，在“二十国”中建立某种“院外活动集团”。可是，这里引起反问：难道财政“七大国”停止了存在，没有就“二十国”议事日程的关键问题协调西方大国的立场？难道在“二十国”中没有实际上为封闭的协调立场的机制的欧盟的领导参加？我们要特别强调指出：金砖国家对“二十国”议事日程的态度是完全公开的，它致力于协作，甚至努力和“二十国”的其他参加者在任有共同利益之处一起制订决议。例如，在多伦多峰会前，金砖四国曾和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印尼、墨西哥等国家建立了同盟，反对实行所谓银行手续税。

在峰会“会场”上签订关于金砖国家跨银行机制（参加的是各国的国家发展促进银行，代表俄罗斯参加的是对外经济银行）范围内的财政合作框架协议是为扩大相互贸易和投资创造良好条件的一大步骤。

不仅注重“二十国”或联合国安理会范围内的合作，而且注重金砖国家本身的合作是峰会的重要特点。现在，依靠南非的加入增加成员国之后，金砖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首要任务应是深入和具体相互的合作，建立金砖国家对外联系系统。毫无疑问，和“二十国”协调立场仍是合作的重点。

在金砖国家范围内发展科学技术和投资的多方合作原则重要。这里“五大国”有巨大的相互弥补的潜力。它们有发达的科学基础、独特的

技术发明、高水平的劳力、科学密集型产品的广大市场。按俄罗斯方面的建议在宣言中写入了“五大国”在科技和创新方面发展合作和条文。

俄罗斯在峰会之前就向自己的伙伴们提交了这方面协作的具体建议名单。它们覆盖从飞机制造、微型电子器材到生物工艺的许多联合工作方面。

峰会通过的行动计划为实际合作，而且比过去更广泛的合作奠定长期坚实的基础。除了已有的工作方式（举行峰会、关于安全问题的高级代表、外长、财长和民族银行行长、农业部长、统计部门、主级司法部门代表的会晤）之外还规定了一系列新活动。这里指的是举行金砖国家的夏尔巴人和超夏尔巴人会晤、卫生部长会晤、姐妹城市与地区的论坛。“五大国”在已经计划的讨论科学、药理学、技术、文化与体育运动方面合作可能性的论坛也可能很有成效。

值得特别指出就任金砖国家主席的中国的积极创造性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峰会的成功举行和通过那么重要的“五大国”行动纲领应归功于中国伙伴。

三亚峰会证明：金砖国家的发展矢量已确定，具体的工作计划已议定。金砖国家一步一步地成为全球意义的有影响因素。¹

注解：

1. 在俄罗斯外交部网页(www.mid.ru/brics.nsf)中. 可以了解金砖国家的活动以及俄罗斯参加这个组织工作的情况。

关键词：金砖国家，金砖国家第三次峰会，峰会宣言。

尤里·沙弗兰尼科

“石油天然气联盟”跨国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
“世界政策和资源”基金会主席

referent@cng.msk.ru



俄罗斯联邦-欧盟：论坛之外 ——

如何安顿与发展自俄罗斯秋明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地区

“国际生活”：尤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说，“俄罗斯联邦是欧盟的极大伙伴，而欧盟是我们最大的伙伴”。俄罗斯-欧盟商业对话主席马里奥·蒙梯声明说，“俄罗斯-欧盟战略伙伴关系愈加为综合性的，相互间的依赖水平也在增长”。您同意这种评估吗？

尤里·沙弗兰尼科：拿在俄罗斯的法国“托塔尔”石油天然气公司（开采量占世界第四）的活动，法国人愿意为俄罗斯海军提供“西北风”直升机航母，我们同欧洲人的药物商贸等方面来说，毫无疑问，这种合作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联合项目的数量在增多。如果不从成交的数量，而根据伙伴的能力和就俄罗斯急需的，规模性的基础建设项目而言，那么，这种项目的数量少的可怜，而且进展也不显著。

“国际生活”：原因何在？

IO.沙弗兰尼科：其中有几个原因。我只涉及几个对业已形成的局面较重要的原因。首先，第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错误，是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时声称，“欧洲是我们共同之家”。此错误至今束缚着我们的心理、政治，甚至世界观。尽管至今还未打下统一

的大陆基础，但1993年形成的欧盟和现代俄罗斯——这是两个有极大区别的家。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没让任何人随便上自己的家，今后也不会让他上自己的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断地企图使欧洲人信服（还使自己相信）他们的共同之家非常需要俄罗斯人。

实际上，需要的是别的。应当将精力集中在自家的问题上，集中在像索尔尼琴认为是最主要的问题上——我们如何来安顿俄罗斯，安顿自己的社会，自己的经济。当然，邻居总是挺乐意去造型良好、舒适和好客的家。按惯例，他们不是空手上门。也就是说，在安排了自己的家后，就不会存在投资，技术熟练人才缺乏的问题。（这样，可以相互串门，说不定还能联合做些事。）但目前我们所见的，是我国大脑外流和自家资本倒流的现象。

第二个错误。不知为什么，我们老是向欧洲人解释他们同我们合作有绝对的好处，同时，又指责他们通过对我们不利的决定，如“欧盟能源新政”就是一例。

“国际生活”：这个新政计划对我们确实“有害”……

IO.沙弗兰尼科：问题到不在于它。欧洲人在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他们的每个步骤都经过仔细讨论并以压倒多数通过定为法案。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但应当作为既定事实被接受。不该对他们做出的决定进行批评，而是在考虑这些决定的情况下，寻求自己可能的利益。

“国际生活”：但是论坛结束后，还是出现不少像欧洲之家在打开大门的报道。似乎每次会晤后，双方的立场更接近，相互理解加深。不是如此吗？

IO.沙弗兰尼科：在论坛上的伙伴发言中，这种相互理解说不定还有加深的说法，但政策和经济是由以立法形式确定的倾向和方向来决定。欧盟根据其政治家对将竞争变得更尖锐，能打击能源资源供应方的垄断之见的文件为指南。

“国际生活”：但无风不起浪……

IO.沙弗兰尼科：我认为，欧洲人为将欧盟变为社会经济绿洲有点过分。因此，未经酝酿成熟的统一的欧洲发展战略被为自己创建理想的生存条件：理想的反垄断、理想的统一、理想的能源、理想的节能……战术游戏取代。但这是昨天的一种战术（在其联合初期阶段上可能是有效）。其结果，从哲学-世界观对选择的道路和欧盟发展手段的认识，大多数人

还是落后于历史现实的要求。比如，跟不上对没有比俄罗斯和欧盟建立进行避开中介，由生产方直接供应消费方的方式更大利益的认识。从经济角度来看，最佳方式是当石油开采方能“延伸”到加油站，而天然气开采方则到热电站或消费厂家。

这是双方最有利的合作形式。但我们的邻国不接受，以垄断主义来吓唬自己。因此，在同伙伴的辩论中将此课题“吊上来”是有道理的……我们在建造自己的家时，力尽使其将是最现代的，最有吸引力，同时注视邻国的成就，建议联合建造一些有益的东西。其结果往后再看：能谈妥，那就好，谈不下来，就算谈不下来。但我要强调，不能放松在此方向上做的努力。因为别无其它选择。

“国际生活”：您提到的规模性项目的必要性是指什么？

IO.沙弗兰尼科：如果是说能源的话，我指的是类似“北溪”和“南溪”的项目。我完全支持此项目的实施，但在建立液化天然气生产方面，我总感到我们落后了15年。“指挥”未来的碳氢化合物市场的将是液化天然气。因为，液化天然气易于向消费者指点的任何一地——欧洲、亚洲，甚至往南极都可以运输。是的，为解决液化天然气问题，必须要有不少资金，但生产方将会被松绑，说的确切些，不再受管道的束缚。

“国际生活”：生产方受管道的束缚力有那么大么？

IO.沙弗兰尼科：非常大。只要你铺设一条例行管道，而且是在没有欧洲人融资参与下，靠自己的血汗钱铺设的，你就加强了自己对消费者的依赖。投下几十亿美元是为了将自己绑的更紧。

“国际生活”：如和解释欧洲伙伴这种不愿让步的做法？难道就是为了阻止我们的发展，伤害我们么？

IO.沙弗兰尼科：说不定有人有这种打算。但问题不在其中。欧盟的管理体制是由其27个国家以压倒多数的表决对自己共同的经济做“判决”。但这些压倒多数不拥有像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样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也没有现代化的油气化工，作为这种现象的后果，他们在俄罗斯建造和发展这种生产也就没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就“刹车”。

还存在就像我说的，他们自己用俄罗斯公司的垄断来吓唬自己，否则就无法解释，比如，为什么拒绝“北方钢铁”投资项目。这个项目能为欧洲创建上千的工作位置。我不是说自己主张这个项目（更好的是如果

有针对俄罗斯东方的项目)。我只是说,此项目在欧盟被砍。前不久,欧洲委员会也拒绝了“天然气工业”购买天然气交易所。欧盟的官员认为,“天然气工业”借助此项交易能“奴役欧洲天然气市场”,尽管此交易所上买卖的清偿直接与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直接挂钩。这种例子数不胜数。

“国际生活”:这在竞争领域是自然现象么。

IO.沙弗兰尼科:这完全是一种很反常现象!如果干脆就不让你进入市场,还有什么竞争可谈。再说,不能视竞争环境为死沼地。其一定受到世界发展动态的影响。当然,这个动态可能无意中被放过,或是被蔑视,在这种情况下,败局早晚是必由之路。我看,欧洲人在对全球竞争性质的认识上落后有15年。在采取“传统的”竞赛形式时,他们不考虑我们重大部分的经济不可避免地会转向,现在已可以说是世界工厂——中国。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您明天在欧洲的天然气上赚了一笔钱,但自己的所有生产设备向中国一国购买,因为这更合算。以前,我们向德国和意大利购买钻井设备,向德国和奥地利购买管道。今天,这两项又向谁购买呢?没错,向中国购买,因为中国人在不断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在抬高其价格。这是今天,但明天.....

“国际生活”:这样说,欧洲明天不就被挤到世界竞争的后院么?

IO.沙弗兰尼科:没有必要将欧洲的未来戏剧化,但对她的某种程度的挑战确实存在。众所周知,欧洲一系列企业的关闭是与中国产品的扩张相关。此外,欧洲的联盟史为老欧洲添加了其本身就存在的不少问题。就拿希腊来说,为挽救他的经济,欧盟发达国家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经济安康”。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德国向希腊放贷刺激了自己的生产。

“国际生活”:这怎么回事?

IO.沙弗兰尼科:很简单,缺乏资金——按欧洲标准——的情况下,希腊能向德国购买什么?但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的尺度完全能被接受。这里就需要大家懂得,谁是欧盟真正的竞争对手。俄罗斯从定义上来说,既不可能为欧洲的竞争者,也不可能为中国的竞争者:我们是能源资源的卖方,他们是买方。

“国际生活”：我们同欧洲发生过“天然气战”。是否应当更积极地开拓中国市场？

IO.沙弗兰尼科：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但欧洲还是一个好客户，他出价不错。没人会放弃这样一个客户。

“国际生活”：中国算是什么好买主，我们至今就价格谈不下来。

IO.沙弗兰尼科：中国也是一个好买主。不过，我们得自己懂得，存在不同的市场，特别是天然气市场。比如，美国一千立方米天然气价格为163美元，而欧洲为360美元，中国现在的开价低于欧洲的价格，这个价格也应当低于欧洲的价格。

“国际生活”：低多少？

IO.沙弗兰尼科：低到双方都能接受。对我们来说，主要的是打入中国能源市场。因此，必须尽快就价格公式达成协议，并要考虑到这是另一个区域，另一种金融标准，庞大国家的另一种能源-燃料的平衡。这种平衡非常机动：他们在成功地利用煤炭，在掌握太阳能、再生能源。此外，中国今天能得到俄罗斯和土库曼的天然气，明天，如伊朗“开放”，也将能从其巨大的储备中得到天然气。再说，澳大利亚也拥有大批天然气。这里还得加上任何生产方能提供自己的液化天然气并运抵目的地.....

就因此，我们作为生产方应当同所有消费者构筑特殊关系。所以，返回我们谈的话题，我强调一下：欧盟-俄罗斯在能源战略伙伴关系上，在落实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联合项目上的重大突破，对我们和对欧盟来说都是必要的。

“国际生活”：那我们有没有为这种突破做有准备呢？

IO.沙弗兰尼科：我们在立法和投资游说方面，说得婉转一点，不够完善。尽管如此，我想，看来也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仅仅呼吁进行合作，这还不够。联合项目只在双方有利和具有具体项目明细单的情况下，才会有生命力。我们还是得向欧洲，其工业领先者——德国、法国、意大利——提出一些重大的项目，首先是涉及石油、天然气和化工深加工的项目，其次是飞机制造业、药物项目。随后一起决定在哪里和如何建造以互利原则确定的项目。

在说石油和天然气化工时，我指的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秋明一带未经开发的资源。这里应当出现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企业，起码得有五个现代化生产中心。

“国际生活”：那我们又如何“引诱”伙伴呢？

IO.沙弗兰尼科：为参与建立这些中心，我们有义务提供对联合资源、资金、市场有利可图的，或是说有吸引力的项目目录表和产业集群。此外，我们必须在国家担保下创建所有必要的条件。再说，重要性不在于一般的条件。俄罗斯是一个领土广阔的国家，其欧洲部分的生活已接近欧洲标准。但拿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或是雅库特来说，哪里的劳动和生活，可以说，还没开始安顿。毫无疑问，为迅速建起产业集群，必须输送廉价的天然气、电力（许多国家在自己的领土上创建多元化发展条件，以便相应地吸引投资者）。

我重复一遍：这不是通常的一般条件（就宏观经济方面，政府做了不少工作），而是根据明细单中所列项目的特殊条件。有可能，估计也必将会为每个项目拟定由议会通过的单独法规……我们可以暂时将入世的事搁置一边，因为，目前主要是尽快将精力集中于项目，集中于建立带有提取利润特殊条件的有效企业——这种条件随便怎么叫法都行，产品分配也行，租让也行。

我提示一下，如果萨哈林项目（在外国伙伴的参与下）不是以特殊条件开发的话，那么，取代这个项目的实施至今还是无止境的辩论，就像有关施托克曼藏地至今还在进行辩论一样，尽管在鄂霍次克海冰层和激流下的工作更复杂。问题不在于，比如说，没萨哈林的资源，我们就活不下去。问题在于岛上的居民今天会怎样对待我们。再说，萨哈林项目为国库也带来收入。

主要的是，在启动互利伙伴关系机制时，国家间的峰会（包括圣彼得堡论坛）将会以具体内容加以充实——为顺利落实这或那个项目还需要什么加以明确：筹集资金、解决组织工作或是人才问题，等等的内容。同时，我强调一下，这里指的并非只是公司的商业战略，这里也涉及国家政策。

“国际生活”：又是国家调节？

IO.沙弗兰尼科：当涉及有重达经济、社会意义项目时，这种调节在不同程度上各地都有。我在这里指出，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

和“北溪”所以存在，因为是由政府提出这个问题，并在政府的监督下实施。因此，我想“南溪”也会获得生命。我暂时将这些项目预期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搁置一边。但仅是将资金用于事业和创建工作岗位来说，就已是一种很大的效益。

不过，在最终收入部分，我们就不如伙伴消费者。如果俄罗斯建立油气的服务生产，这种现象也能被挽救。设备会更便宜，创新发展也将成为现实，再说，将出现不少新的工作岗位。目前，仪器、设备、技术和工艺则都向国外购买。

“国际生活”：在卖成品上有更大的利可图的情况下，谁还会想在我们这里开展这项服务呢？

IO.沙弗兰尼科：会有不少人。为此都不需要进行任何宣传。只需要明确游戏规则，能被理解的活动条件。应当跟伙伴说的清清楚楚，进入我们市场的人占百分率的多少。剩下的必须是俄罗斯的生产。也许能在初步阶段上，向伙伴予以特惠，如果是这样，那么应当立刻就给予这种特惠。随后，就像基于产品分配协议落实项目时那样可以进行校正。当然，就此问题双方都提出过要求，但最终所有问题都予以解决。别看我们是这些项目的主要参与方，执行的项目也都长寿。

我再强调一遍：我们应当为建设我们东部的家园吸引外资和技术创建所有条件。

“国际生活”：那么，“欧洲——我们共同的家园”这种夙愿是好，还是不好？

IO.沙弗兰尼科：我不是说不好。杰出政治家戴高乐也曾抱有建立“自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的夙愿。夙愿还可以延伸至太平洋。当然，应当有作为夙愿的想象，甚至是必须有。但在经济和政治上，更为重要的是为自己提出具体的目标，跨出实际的、建设性的步伐。在上述情况下，这应当是自秋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宏大设想的基础设施项目。

关键词：“欧盟能源新政”、欧洲之家、“北溪”、“南溪”、萨哈林项目、“欧洲——我们共同的家园”。

加列金·托苏尼扬

俄罗斯银行协会主席



原则上，俄罗斯具有投资吸引力， 但资本有时却会有神经质太太的表现

转刊“俄罗斯之声”广播公司“与世界面对面”
项下的访谈

www.vizavi.ruvr.ru

“国际生活”：加列金·阿绍托维奇，请允许我们的交谈始于不为鲜见的，但令诸多人关心的问题：世界金融危机有没有结束？

Г.托苏尼扬：确实如此，近三年来，我们谈的尽是世界金融危机问题。就跟英国人惯于谈论气候一样。我已多次就此问题表态过：我国所经历的，同其它世界国家经历的事件，有截然不同的区别。我们的金融危机在于金融服务不足。现在，这一潮处于退潮阶段。2010年的指标呈现肯定的发展趋势。

众所周知，我国对石油、天然气有很强的依赖性，但不能以此来安慰自己。不要坐等第二次，或是第三次危机浪潮的袭来。必须进行工作。今天，无论在国际上，还是俄罗斯市场上，局势多多少少趋于稳定。但同时，大家也懂得还存在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国际生活”：请问，那么银行界蒙受的损失有多大？多少家银行许可证被吊销、破产？

Г.托苏尼扬：这些年来，不仅是危机的三年，包括其前几年，存在一些稳定的数字。这些数字甚至令人感到是有人设定限额的感觉。每年有30-40家银行的许可证被吊销。原则上，这是一种正常和自然的收缩与整顿的过程，但是，也有新创办的银行出现。再说，这也不仅是吊销许可证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合并与并吞的现象。

如果这是为确定银行数量，或假定说是规定精简限额的一种企图，那就是另一回事。我本人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市场会自行决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由它来决定该有多少参与者。

我们提议对“银行”的概念结构化。地区银行（在界定境内运营的）——这是一种规模和风险水平。在联邦层次上运营的银行，那是另一个问题。第三种是跨国运营的银行。这里能有不同的调节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名称应当反映其规模性。

“国际生活”：您认为，银行是否以更强的免疫力步出了危机的考验？是否提高了自己的专业素质，取得何种经验？

Г.托苏尼扬：无疑，他们经历了成长过程。当你经受压力后，你不仅会成长，也会变得办事过余谨慎，有时甚至会阻碍向前迈进。就这一点来说，自控风险的程度，向贷款人提出过高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影响到稳定。从银行不敢承担放贷风险，贷款人则也不承担风险的停滞角度来说，这种影响就显的更大。但是，其中也有肯定的一面。毫无疑问，成长已成立，而且贷款人也经历了成长过程。

“国际生活”：加列金·阿绍托维奇，世界汇市状态到底如何？美元的命运又将如何？

Г.托苏尼扬：世界在放弃单一货币，是显而易见的。60年代末建立欧元的思想本身，就意味是不再愿意接受美元强加的垄断。就是拿我们自己的市场来说，也能看出这一点。我国的储备货币有欧元和美元对半构成，这种比例不仅在十年前，就是七年前也还不存在，当时的储备货币明显地倾向为美元。总结上述所说的，现在显示的无疑是多元货币的进程。

“国际生活”：您对有关将我国能源结算由美元改用其它货币的提议有何看法？

Г.托苏尼扬：我认为，这完全合理。因为，在我们作为向一些国家提供能源的主要供应方的情况下，用第三国家的货币进行结算，这是一种毫无逻辑的做法，我们在手续费上，汇率的浮动上就蒙受损失。

“国际生活”：也就是说，要以卢布支付？

Г.托苏尼扬：对，许多国家就此已做好准备并提议这样做。再说，这种支付形式今天已被采用。

“国际生活”：加列金·阿绍托维奇，请介绍一下俄罗斯银行协会的情况。

Г.托苏尼扬：这是一个非商业性组织，其旨在一方面，联合银行行业，另一方面，统一利益，为他们在财政部进行疏通。构筑分支企业，金融市场系统及其基础部门，并推广于广泛消费者阶层。90年代初，当我们机构组建时，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种新颖现象。今年是协会建立20周年。有些系统性问题通过公共和民间机构方式来解决，更方便和更具有专业化。俄罗斯银行协会20年来就以这样的一个机构体现了自己。其受到非只是市场的局部“玩家”的关注，许多人都表示关心。

“国际生活”：协会使命之一，是代表银行的共同体利益与政府进行工作。这种接触进行的怎样？你们是否能出自协会的利益坚持通过一些所需法案的立场？

Г.托苏尼扬：我能理解公众产生的疑虑，但我还是谈我所知的。我们致力为涉及金融市场发展的法案进行游说，但绝非尽出自我们银行需求的角度进行。我们每个人同时也是金融服务市场上的普通消费者和公民。我今天不在银行工作，但在90年代我领导过一家银行，我懂得存在社会的利益问题。就社会利益来说，必须建立同时能维护银行体系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法律基础。

如果以为俄罗斯银行协会只代表银行（通常被认为是有害于他人）的利益进行游说，那是不对的。我们对发展市场抱有兴趣。银行本身希望今天的消费者能作为明天的客户成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同任何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其它现象一样，有许多例外、矛盾、磨擦。但俄罗斯银行协会致力选择系统框架内非狭义利益的路线。

我们参与许多议案的制定工作。几乎所有涉及到金融市场的法案，没有一项不经过我们的鉴定，或不在我们的参与下进行过讨论。但不是所有的事项能落实。

“国际生活”：在立法提倡领域的银行“透明度”是如何解决的？

Г.托苏尼扬：我就近年来发生的根本变化举几个例子。以往，银行能进行似乎是低利率的申报，但事实上，这些利率不切合实际。今天，根据央行、社会和立法的要求，在签署贷款合同时，必须得有随附合同的金额及最终利率偿还时间表的明细单。不同于其它机构，这种“透明”是同银行被责成每天得向央行提交报表和公布自己的负债表有关。上银行时，您可以要求了解他们的财政指标。但在某些地方您会遇到无礼的态度，或是不按您要求给您，这是另一回事，这也是我国后苏联的现实。

在立法上，我们同许多在金融市场上没有银行营业执照的机构相比，还是够“透明”的。从这一点来说，有了很大的进展，再说，这是我们自己提倡建立同样为贷款人本人极度“透明”的贷款史。

“国际生活”：今天对银行的保密又怎样？

Г.托苏尼扬：存在个人资料法，因此，一切涉及个人的信息，银行无权公开。但就涉及银行的整体指标而言，无论怎样也不会侵犯客户的个人权益。这里就同执法机构有时要求银行提供信息产生矛盾。存在保护个人信息和银行保密的立法。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例外。

此外，还有法律适用的实践，就此，遗憾的是，我们不总是能符合国际标准。

“国际生活”：在最高层次上经常说必须最大限度地保障我国的投资吸引力。可是资本外流现象在继续。怎么办？

Г.托苏尼扬：我们在90年代和世纪初，曾有过严重的资本倒流现象。继之，换成积极地流入。反之，1998年前，当开始发行高收入的国债时，流入的则是投机资本。这是由投资方的短期利益决定的，也就是所指的投机市场的一面。当我们提到重要的长期资本的倒流或是流入，这就取决于投资环境。如果他们相信稳定，看准了国家的前景和理解了其政策，通常这些资本就会返回。一旦出现不明确性，资本会暂时退居等待。

原则上，我国具有投资的吸引力。当我们说短期阶段时，资本就会有像神经质太太的表现。其可能退居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社会税抬高后。自然，这里立即显示了不利性，许多人将自己的业务转移国外，以便逃避这种过剩的税收。必须学会“开明”的工作。我们对这种工作作风的

适应性还不够。外跑和转入“灰色层”，这是一种相连的现象。所以，有可能未经深思熟虑的政策也导致外流现象。这是一种波浪式运动。

“国际生活”：那么，对离岸中心又该怎么办呢？是否也该整顿一下使它变得更透明，或是干脆就取消它？

Г.托苏尼扬：说实话，我到提议以一些后苏联国家为基础建立离岸中心。吸引资本，非将其吓跑。首先该取消的是那些已靠自己的地位取得一定的发展和达到足够的金融渗透水平的离岸中心。现在是希望它们能变得易于理解，“透明”和对那些有发展金融市场需求的人产生更小的竞争。

当然，最好是干脆就没有离岸中心。但这是不可能的，至少是现在。离岸中心的某些元素为资本创建吸引力。在当资本立足了脚，以“白钱”（这里不谈黑资本）取得发展，当其不仅在金融上，还在运输、公路上为自己打下基础后，也就是说，向经济肌体的所有必要的毛细孔进行输入后，你将会开始小心和逐步地提高要求的杠杆。因此，西方有他自己打击离岸中心的一套，而我们则与他们的方式有区别。

“国际生活”：依您看，为外资流向俄罗斯该做哪些工作？

Г.托苏尼扬：为此需要相应的税务政策、司法体系以及稳定。如果没有正常运作的司法体系，不保护投资方和所有者——不仅是大投资方的，而且也不仅是垄断方——的利益，那么，投资环境对投资方不会有吸引力。

关键词：金融服务不足的金融危机、放弃单一货币、多元货币、俄罗斯银行协会、投资吸引力。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国际生活

地缘政治

基里尔·巴爾斯基:

“.....上合组织的出现是它的创建者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总的失衡背景下不断增大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威胁的自然反应。为了克服不良的趋势，可靠保障自己和地区的安全，上述国家决定利用多方合作的工具。”

阿列克谢·瓦西里耶夫:

“.....西方早就知道在全世界碳氢化合物缺乏条件下非洲石油和天然气储藏量的重要性。投资在急剧增多。按各个主要跨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分析部门的评价，最近十年-十五年内非洲（包括陆架）石油年开采量将以6%上升。”

康斯坦丁·弗努科夫:

“.....今天朝鲜、中国和日本以及东盟国家人口占世界的31%，总产值-20%和世界贸易额的22%。如果加上东亚峰会的其他参加者（美国、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很明显：从全球经济和安全观点看来，东亚不仅是切身重要的地区，而且是今天建立新国际秩序的试金石。”

亚历山大·卢金:

“.....阿拉伯世界革命浪潮对中亚政治局势的潜在影响极其有趣。这个地区的政治文化只是部份近似阿拉伯世界。除吉尔吉斯之外，和阿拉伯世界不久之前那样，到处都是极权的，氏族的，贪污的，残酷程度不同的政权，而传播最广的宗教是伊斯兰。可是在这些国家中生活的毕竟是不同的人民，它们长期生活在苏联时代，因此比较有苏联人民的性质。”

基里尔·巴尔斯基

俄罗斯联邦驻上海合作组织民族协调者，特命全权大使

daap@mid.ru



上海合作组织： 世界政治的新词汇

2011年六月15日的节目烟火照亮了哈萨克斯坦的天空，庆祝上合组织的周年。十年前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国首脑在上海签订关于建立上合组织的宣言。在宏伟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峰会的上合组织国家领袖们总结了这个新的地区组织的成果。

做到了什么呢？我们在什么地方呢？以后要做什么呢？现在，组织进入第二个十年，正是讨论它们的时候。

上合组织的特点

能否编写国际地区组织成功的万能准则呢？未必。这是可以理解的：地区联合体的建立有不同的原因，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局势。它们规定不同水平的政治协调或经济一体化。历史本身会对地区政治计划做出评价。上合组织也不例外。

上合组织的出现是它的创建者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总的失衡背景下不断增大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威胁的自然反应。为了克服

不良的趋势，可靠保障自己和地区的安全，上述国家决定利用多方合作的工具。

这个步骤起了作用吗？对此可以按最近十年上合组织空间的情况来评判。在俄罗斯、中国和中亚对恐怖主义挑战给予了坚决的反击。上合组织国家的护法机关的共同努力防止了几百个恐怖事件。这个时期在六国举行的所有国际活动都顺利进行。制止了分裂主义的公开挑衅。极端主义势力不得不后退。

上合组织经过了几个危机时刻-2005年的安集延事件，2009年世界财政市场震撼的影响，2010年吉尔吉斯南方的混乱。说我们地区克服经受的考验时上合组织起了首要作用未免夸大，但上合组织国家采取的措施，它们行动的协调，上合组织本身的存在对这些局势毫无疑问起了稳定的作用。

上合组织的建立对于被冲突、不稳定问题蒙上了阴影的欧亚大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阿富汗和来自那里的恐怖与麻醉品威胁、围绕伊朗核计划的局势、中东冲突、叙利亚和也门的风潮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矛盾……在这种背景下，中亚成为真正的“稳定岛”。虽然这里内部安全方面的问题还很多。上合组织成为这个地区的重要安全保障，可以说是稳定自己这个责任区的某种“稳定锚”，尽管它不断受到世界和地区政治和经济风暴的袭击。

六国在建立上合组织时就已指望它不是一般的行动机构。上合组织的宪章中规定它的主要目的为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友谊和睦邻关系。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大部成员国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刚刚庆祝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十周年的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协作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提高，和中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增加了许多倍。不能说六国关系上没有任何问题，它们存在，需要解决。可是上合组织的政治“伞”毫无疑问有助于发展双边的友好合作。这是十分可贵的。

应该说：1990年代和现世纪初于前苏联空间曾努力实行了不同的多方计划。其中成功的计划中有：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联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海关联盟。有一些，例如，古阿姆集团（GYAM）是注定不能成立的。至于上合组织，它不是一般的建立，而且在过去的年代证实了自己绝对的必要性。这个组织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联合了前苏联境内形成的国家和中国，在它的对外政治和对外经济利益方面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居最重要的地位。在这种意义上上合组织无可取代。值得注意的是：对所有成员国来说，上合组织范围内的合作至今是它们的外交政策的优先重点。

按照上合组织宪章的第一条，上合组织的目的之一是“协助建立新的民主的、合理和适宜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在上合组织的十年道路上不难看到它为世界政治带来了许多新的良好的因素。

首先是上合组织以自己的范例提出了质量上新型的，大小国家真正平等，相互信任、尊重多元的文明、文化、宗教，国家制度的国际伙伴关系，趋向共同繁荣的发展理论。上合组织作为这种模式的哲学体现了多极世界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是它超越上合组织范围的意义。

这种模式不是一下子出现的。它起初出现在苏联和中国边界问题的多年谈判中，后来又经过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的讨论。上合组织的十周年正好是奠定了未来的组织的基础并促进了所谓“上海五国”建立的文件-加强边境安全信任协议签订十五周年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在发展安全合作为亚太地区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最初迫切问题之一的今天，上合组织成员国实现国家之间信任措施的经验十分有益。

上合组织建立表明，在现代条件下正是在地区水平上确立全球多极管理的因素。1996年进入了战略伙伴关系的俄中协作对包括我国、中亚和中国的地区的向心趋势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原则重要的是加入上合组织的六国不仅有共同的地理和历史的联系，而且有共同的观点为和价值，关切同样的问题，希望共同建设自己的地区，在保障自己的安全与福利方面合作。所有地区之外的国家都应该尊重自己掌握地区命运的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选择。

我们对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事件的记忆犹新。当时十分明显，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已处于全球议事日程中的前列。“上海五国”和乌孜别克斯坦是九月11日悲剧事件之前最早呼吁世界联合努力向这一邪恶作斗争的国家。

值得提到的是，上合组织不是政治军事联盟并且没有这种打算。在防御性方面的协作只是为了反恐怖主义斗争的目的。上合组织的活动不反

对第三国，它反对解决国际和地区发展的迫切问题的意识形态和对抗的态度。这是世界政治上的新词汇，是非集团联盟能保障国际安全的范例。

这种范例有巨大的原则性意义。我们生活在全球化进程，客观上要求降低军力在世界政治上的作用，而国际合作、经济适宜性、“软力量”迈向前列的时代。相应地，今天在欧洲-大西洋、亚太等地区得到具体轮廓的新的安全结构都应该是平等、透明、基于法律、非集团性的并且考虑到所有国家合法利益。上合组织的教训很简单：需要遵循时代精神，而不是逆流而进。

上合组织和变化的世界

今天世界变化迅速。全球化伴随着不断增大的相互依赖、活跃的一体化、不同国家和国际上的非国家结构的利益的深刻的交织。出现综合性的现代国际关系的模式，其主要的矢量是建立多极世界。

可是在人类可能全球化的同时，它的问题也全球化。尖锐出现的非传统的安全挑战和威胁，为久已存在的领土争议和国际冲突制造极其不良背景。周围环境的破坏、气候变化、越来越经常的自然灾害和工艺灾难也对我们造成不良的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对当代迫切问题解决方案的共同寻找成为全球和地区议事日程中的首要问题。自然，顽固的加强军事联盟的企图、陈旧的对抗思维、不愿放弃武力方法和超越法律范围行动的习惯已越来越不合时宜。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表明集团政策没有前途。取代狭隘的、非透明的军事集团的应是旨在建立的各国协作方式的新质量的多方外交。

这方面，正在高速建立实际上为新的地区结构网的亚太地区是典型例子。上合组织国家清楚看到了这个趋势，它在2004年提出了建立多分支的多方联合体伙伴合作网的建议。生活证明了这样提出问题的正确性，特别是对于亚洲。由于历史和地理政治原因，这里没有，大概不可能有建立严格的全地区结构组织的可能性。

现在亚洲的多方合作正是朝这种网式方向发展。它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上合组织为搞好与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区同体、东盟、经济合作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YHII OOH)、国际药物管制委员会(MKKH)、中亚反贩卖麻醉

品、精神病药物地区信息协调中心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合作而做出的积极努力。

摆在前面的任务是和新的伙伴建立联系。为什么不能考虑上合组织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与东亚峰会机制、上合组织与东盟地区安全论坛搞好联系的可能性呢？为什么不能声明上合组织愿意参加巴厘条约-对亚太地区安全关键的1976年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呢？所有这些都为了共同的多方合作利益。

上合组织在过去的十年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承认，被认为是关于地区和平与稳定问题的方便的，甚至是最适宜的合作平台。

这不是空口的声明。2009年三月在上合组织范围内举行了有36个代表团参加的关于阿富汗特别会议。从2010年一月开始经常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有观察员地位的国家的关于地区安问题的外长会议。参加会议国家有可能增多。

还有一个例子-上合组织在研究国际信息安全方面的先导作用。以俄罗斯为首的上合组织专家组起草了内容新颖的文件-“各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行动规则”。这毫无疑问是组织对加强全球信息安全的贡献。

专家们预测上合组织在地区政治和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只会增大。因此摆在上合组织的迫切任务之一是加强与扩大成员国对外政治的协商，外交部之间的联系的积极化，密切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裁军会议、亚洲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亚洲合作对话等机构的协调。上合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应该尽量以同一立场说话。这使我们更加有力，更能坚持自己利益并且协助国际合作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周年的阿斯塔纳

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上合组织国家首脑委员会周年会议聚集了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的领袖，来自观察员国家-印度、伊朗、蒙古和巴基斯坦的高贵客人，阿富汗的总统也和他们在一起。邀请了和上合组织有正式联系的国际组织-联合国、联合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区同体和东盟的执行机构领导人参加。与会的还有上合组织秘书长和地区反恐怖局执行局长(PATC)。

峰会不同寻常，成了国际规模的重大事件。这是真正的节日，使上合组织国家和它的伙伴们有可能隆重地欢庆取得的成就。与会者在讲话中

强调建立上合组织的决定是明智的及时的和有远见的步骤，是对恐怖主义挑战，地理政治的力量对比变化的回答，使有可能保障这个新的组织成员国的安全利益。上合组织在十年来证实了它是建设着的全球和地区结构的重要因素。它的作用在继续演变的国际系统、当代威胁规模扩大和复杂化的背景下特别明显。

与此同时，领袖们远非仅歌功颂德。意见交流，特别是在传统的人数不多的会晤中深刻分析了上合组织走过的道路和面临的巨大任务。

国家首脑们通过的最后文件证明了峰会内容的充实性。它们有两个-上合组织十年宣言和新闻公报。对这些文件值得特别注意什么呢？

第一，上合组织基本成就的明确的性质和当前的情况。宣言中说：十年来顺利地走过了从结构建立到各方面高效的协作机制的形成。为上合组织的旨在共同保障和平、安全和稳定，发展上合组织空间的政治、经济和人文等到方面的多方合作的无间断的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宣言根据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全球和地区问题的广泛共识表达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当代世界秩序的观点。专门的篇幅阐述了联合国的核心协调作用和联合国与上合组织的协作，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新的挑战 and 威胁，北非和近东形势，阿富汗局势，上合组织参加建立亚太地区安全和合作的新机构。六国重申愿意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密切协作。

最后，上合组织六国阐述了它们今后行动方针。明确声明在反恐怖主义以及其他新的挑战与威胁的斗争，扩大经济协作，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文化-人文联系的方针不变。

在峰会范围内通过了其他文件。例如，各国领袖们通过的上合组织2011-2016年反恐怖主义战略和它的履行纲领旨在大力推动反对非法麻醉品交易的斗争的联合工作。上合组织秘书处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合作的加强开僻了反麻醉品事业新的可能性。为此目的起草了相应的备忘录并在阿斯塔纳由上合组织秘书长M.C伊马纳利耶夫和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关于麻醉品和犯罪问题管理局副局长I.O.费多托夫签订。

关于申请加入上合组织国家的义务的框式备忘录已通过。这个文件的批准是制订未来扩大组织的法律基础的重要步骤，从而向希望加入我们组织的国家发出关于成员国忠于上合组织的开放原则的信号。

在最高领导面前签订了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关于卫生方面合作的协议，最近这方面的合作引起了特别的兴趣。已开始了实际的协作，签订上述协议使它得到必要的法律基础。

国家首脑委员会在阿斯塔纳会议上把上合组织主席地位移交给了中国。领袖们就此支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关于宣布中国主席年为睦邻友好年的建议。

未来的计划

上合组织的业绩明显。这是否意味着它的发展没有困难和问题呢？当然不是。上合组织地区不是平安的地区之一。对于它，内部政治的不稳定因素是有代表性的。全球财经危机后果起了不良影响，那里存在经济和社会问题，有些地方还有矛盾。恐怖主义组织，极端议势力，贩毒集团，犯罪结构为了自己的见不得人的目的在利用这些因素。

上合组织本身也需要完善，它应和过去一样作为全面的，负责自己“家务”的地区组织发展。上合组织是成长的机体，这个组织碰到的大部份问题是日常生活的问题，即所谓成长的困难。

十年来组织设计了调节它的各方面活动的不同水平会晤的良好系统，建立了上合组织常设机构并且在顺利地工作。仅俄罗斯参加上合组织方面合作的就有30多个部门，几十个科学中心和社会组织。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情况也类似。可是在第一阶段需要大大加强上合组织的预算和机制，提高它的工作效率，更加努力追求实际成果。

上合组织成员国首脑在阿斯塔纳提出了一系列思想和建议，旨在完成这个宏伟任务。哈萨克斯坦总统H.A.纳扎尔巴耶夫建议为了防止对各成员国的因特网袭击建立上合组织网警（从事防止因特网犯罪问题的机关）；建立调解领土和宗教冲突的会议，以制订在上合组织责任区的潜在“热点”的预防措施；为建立上合组织统一交通动力空间和完整的欧亚管道系统和输电线而建立上合组织国家结构一体化委员会；组建上合组织水-食品委员会；建立紧急状态委员会；研究实行用黄金保障的“健康民族货币”的问题；建立跨国研究所以制订上合组织发展的统一观点。

吉尔吉斯总统P.И.奥图巴耶娃主张在上合组织范围内建立边界安全委员会，支持建立履行协调反麻醉品方面合作的机构的思想，表示愿意在伊瑟库尔湖边举办上合组织青年会议。

中国主席胡锦涛建议在加强上合组织的机动反应潜力的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地区安全合作系统；推动地区经济的一体化；为贸易和投资创造良好条件；建立保障动力、财政和食品安全的合作机制。

塔吉克斯坦总统Э.Ш.呼吁解决上合组织投资法律和谐化问题，确立最近十年对欧亚空间统一发展战略的基本立场，使上合组织在阿富汗方面的工作计划适宜化。

乌孜别克斯坦总统И.А.卡里莫夫支持在上合组织空间实行公路、铁路和航空机构的建设和现代化，建立现代的物流中心，主张上合组织参加建立中亚-海湾的国际交通走廊。自然，不能指望所有这些思想都能在建议的形状下得到实现，但各成员国毫无疑问将认真研究和讨论它们。

俄罗斯联邦总统Д.А.梅德韦杰夫在阿斯塔纳峰会上阐述了自己对提高上合组织活动效果途径的看法。他在扩大会议上主要谈到了发展上合组织在保障地区安全，加强地区反恐怖机构(PATC)的财政和人才基础，努力防止非法的麻醉品走私和计算机威胁。谈到上合组织的经济方面活动时，Д.А.梅德韦杰夫说它是联合工作的“第二个重要目的”。他呼吁伙伴们参加今天举行的上合组织政府委员会关于实现俄罗斯方面提出的多方经贸合作纲领的“路线图”会议，结束建立上合组织的作为对计划的财政伴随的专门核算机制的工作。指出建立上合组织的风险基金和统一的实业合作中心的建议很有前途。上合组织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方向是扩大人文联系。因为正是在这个方面确立任何组织的社会基础。

上合组织“在第二个十年之后”将成为怎样的呢？需要怎能样做才能保障这个组织在XXI世纪在第二个十年的传统发展呢？

原则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首脑都在阿斯塔纳强调了上合组织在保障安全、反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贩毒等跨国犯罪现象的斗争方面继续工作的首要意义。可是这些威胁的水平要求上合组织采取相应的行动。例如，在俄罗斯，而且在其他许多国家都认识到上合组织地区的麻醉品走私达到了威胁国际和平与稳定的规模。这意味着上合组织国家反贩毒合作部门的合作需要大力扩大。

单独不可能对付恐怖和贩毒的威胁。上合组织在防止它们的工作中需要扩大与观察员国家以及国际机构，其他感兴趣的“角色”的协作。上合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之间存在巨大的潜力，应“全面加以利用”。

阿富汗值得最认真注意，国际协助安全力量的外国军队打算在2014年年底之前从那里撤离。上合组织已为了解决这个受尽苦难的国家的这个问题做出了不少贡献并愿意继续为此而努力。总统X.卡尔扎伊是一向参加上合组织峰会的客人，上合组织成员国早已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搞好了密切的协作，为阿富汗提供各种援助。

某些时候之前阿富汗朋友们曾请求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为该国提供上合组织观察员地位。看来，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加入“上合组织大家庭”将有助于解决阿富汗的问题，在该国建立真正独立、和平、中立、繁荣，没有外国军队存在的国家。

上合组织拥有一系列明显的优势，使它有可能大大增大经济协作。这里有活跃发展的中国的财政投资可能性，进行着现代化的俄罗斯工艺潜力和中亚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此同时，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的不同，现阶段上合组织范围内的合作应该集中于实现符合大部份国家利益的计划。这里指的是交通、动力、结构建设、电讯、食品安全等方面。这里对观察员国家和其他对话伙伴也有意义。搞好地区经济动力方面的监督和对危机预测的机制有助于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除了上合组织外，许多多方联盟，首先是欧亚共同体和独联体也在前苏联空间顺利地从事经济合作。海关联盟的建立形成了地区经济一体化方面的原则上新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最正确的是确定这些机构能够为保障地区所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利益和谐地，没有不需要的竞争和没有重叠地相互协作。上合组织、欧亚共同体和独联体已有这方面必要的法律规范-关于这些组织秘书处之间相互理解备忘录。

在诸如紧急反应、反贪斗争、财政监督、移民、生态、海关调节、标准化、传统医学等问题方面的共同工作使上合组织的合作更加“结实”。这种工作已在进行，而且相当积极，它的“马达”是合作解决共同问题的相互利益。

上合组织不可能没有人们之间的广泛接触，文化的交流，共同教育空间的建立-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文化的相互丰富和渗透，人民的相互理解。这里我们各国也有值得骄傲之处。在继续实现上合组织青年委员会和网络大学计划的同时，应该积极开展新的方向和形式的工作：旅游、运动、文明之间对话方面的协作。

上合组织是开放的组织。它的宪章规定了这个原则并且在过去的十年内一直在实际履行它。这些年代印度、伊朗、蒙古和巴基斯坦成了它的观察员。2008年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得到了它的对话伙伴的地位。

友好国家和上合组织进行更密切协作的追求把为了扩大组织制订条件的任务提到了实际平面。在这里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一系列法律、组织、财政方面的细节还需研究确定。这一进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我们的工作方针仍然应该极其明确和透明。

还要提到的是，还很少人知道上合组织。不仅在世界上，在上合组织国家中也一样。至于西方国家，媒体对上合组织的报导往往是偏向的。因此，重要的是使上合组织制订和系统地实际履行自己的信息政策，以便在国际上和在各各国尽量广泛地散布关于上合组织的知识。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在阿斯塔纳峰会上强调指出的那样，下一个十年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是关键性的。必须使上合组织作为强大，团结，扩大了自己队伍，全面控制地区安全局势，有助于经济合作和提高公民福利状况，为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提供广阔空间，开放协作，在世界上起重要作用的高效多功能的组织迎接下一个周年。

按历史的尺度，十年是不大的期限。然而上合组织在这些年代成了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不可分割的部份。世界倾听它的意见，关键的国家、权威的国际和地区组织希望和它搞好联系。

可是要做的事还很多。进入自己的第二个十年的上合组织在继续发展和完善。不变的基本原则，考虑快速变化的国际局势的主要活动方向的传统性确定它的未来。

上合组织在世界政治上已说了自己的话。新的庄重的话。但言论之后向来都应该是行动，具体的行动。

关键词：上合组织，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

阿列克谢·瓦西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

dir@inafr.ru



俄罗斯和非洲在争取矿物资源的全球斗争中

有关于俄罗斯的神话。有黑的也有白的。其中任何一种都歪曲实际情况。一个白神话硬说我国在矿物资源方面自给有余，说我国地大物博，应有尽有，说我们到国外寻找资源，例如，去非洲，-是谎话。

只需要量列举几个例子，就可以证明实际情况。

我国依靠进口或利用积累的资源，足够供给工业需求的锰将近100%，自然界的铀-80%，铬铁生产的原料-55-60%，铝土矿-55-60%，我国还大量进口用于生产锡和钛、铌铁和锆的原料。

最近十年或更多的时间里我国开采矿产仍将是为经济现代化或者用现代语言-经济的创新，保持社会的稳定、保障民族安全的主要资金来源。

我想，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依赖石油或石油天然气的程度，考虑到我国出口方面对安全的不可容许和危险的原料性质。也许非洲正是在这方面和我们竞争？

出现在矿物原料方面利用国际分工合作潜力的任务，例如，和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包括我们缺乏的资源的非洲合作的任务。

自然这里不能不提到非洲的黄金和铂金（铂金矿）几十年来非洲（南非）一直是公认的黄金生产首领。在财政危机条件下国家的储备和私人的收藏的黄金都增多，价格也上升。生产也增加了，因为过去缺乏

利润的矿山重新开工。世界上黄金出口仍是南非居首位，而进口是印度领先。去年生产的领先者，无需猜测-己是中国。

大量已证实的储藏量、矿物中 useful 成份的中高含量，较容易的地质勘探和自然气候条件、在非洲一些国家已存在的结构，还有廉价的劳力使这里的开采和精选加工都有高度的竞争力。俄罗斯的国营和私营公司已明显致力于吸引非洲较有前途的产地纳入自己的轨道。我国不多的具有高度竞争能力的高工艺部门之一是核电站的建设。但核电站需要精选的铀的保障，而我国这方面的产量不够。这促使我们参加在非洲、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的铀开采。这里我们碰到来自西方和中国的激烈竞争。

现在谈谈石油天然气资源。我们在世界开采方面居首位。但石油储藏量远非领先。

众所周知，最近几十年内大概还没有取代碳氢化合物的能源。

非洲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与出口方面居何位置呢？非洲居民占世界人口的15%，但仅占世界动力的商业需求的3%。非洲国家总共生产占全世界将近12%的能源（按需求的动力计算）。这个数据还有上升的趋势。

到2025年巴西、中国、印度等国的石油需求量将增加一倍。暂时只有巴西发现了大石油产地，但它能怎样满足自己的需求，还未可知。

西方早就知道在全世界碳氢化合物缺乏条件下非洲石油和天然气储藏量的重要性。投资在急剧增多。按各个主要跨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分析部门的评价，最近十年-十五年内非洲（包括陆架）石油年开采量将以6%上升。危机只是有限地抑制了对非洲石油天然气方面的外国投资。2009年增加了4%，而全世界在这个时期下降了16%。

预测到2030年全世界对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的投资将主要在非洲。有远见的美国为了监督交通路线和总的局势专门对非洲建立了军事结构-非洲指挥部。

暂时大部份石油储藏量集中在五个国家：利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阿尔巴尼亚、苏丹。在非洲发现的石油越来越多。继前面五国之后的有埃及、加蓬、刚果共和国、赤道几内亚、乍得、突尼斯、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国也发现了石油。

按“BP”公司经济侦察局的资料，2009年非洲每天开采了9,7百万桶石油。主要生产者依次如下：安哥拉、尼日利亚、阿尔巴尼亚、利比亚、埃及、苏丹、赤道几内亚、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

乍得、突尼斯、喀麦隆按我们习惯的吨计算，非洲开采量为4亿5千9百万吨，相当于俄罗斯产量。¹

自然，大部份开采是跨国公司进行的（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英国石油”，“壳牌”，“合计”）。但这里需要指出新的重量级的竞争对手-中国。

我们考虑到中国总产值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里还没有计算与中国密切联系的香港、新加坡、东南亚居住的华侨商人的潜力。到2011年三月底中国黄金外汇储备为3,04万亿美元。²可以肯定地估测中国已制订了最大限度购买非洲矿物资源的战略。

2009年从非洲向中国的石油出口为6千3百万吨，向美国-1亿零7百万吨，向欧洲-1亿2千4百万吨。对中国的主要供应者是安哥拉（14%），它超过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第二是苏丹，第三是赤道几内亚。中国包揽了苏丹石油出口的三分之二（在苏丹分裂为两个国家后情况并未改变），向石油勘探、开采和加工运输方面投资，这是在西方公司离开苏丹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且丝毫不顾西方对哈尔图姆的制裁。中国石油公司还在安哥拉、尼日利亚、刚果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科特迪瓦、纳米比亚、埃塞俄比亚这样活动。

中国对非洲的渗透是多菱面的：贷款、无息贷款、保障金、建设铁路和公路、发电站、住房区、贸易中心、学校、医院，供应武器、在中国培养数万非洲人，经常举行峰会和高级互访。在非洲的中国饭店早已多过“麦当劳”。

最近几个月许多非洲国家庆祝了自己的五十周年，因为1960年是非洲年，当时几十个殖民地获得了独立。中国赠给每一个周年国家五十架豪华的小汽车。中国人为亚的斯亚贝巴非洲联盟总部的建设赠送了一亿美元并且迅速完工。许多国家的外交部和议会大厦都是中国的赠品。铁路、公路、机场的建设都利用中国的贷款，换取的是非洲的财富。非洲人不反对，尽管也有摩擦和矛盾。

在评价非洲的碳氢化合物前途时值得注意如下因素：这里石油开采的高峰未过，非洲对跨国公司的生态和其他要求没有其他地区严格；从产地运输比从中亚运输方便也便宜。政治风险比近东小。

天然气是特别的问题。主要的生产国是阿尔巴尼亚、埃及、尼日利亚、利比亚。2009年欧洲从非洲运进了约780亿立方洲天然气。总的来

说，欧洲在2006年从俄罗斯运进了35%的天然气，从非洲-21%。2009年从俄罗斯运入了30，7%，从非洲-18%。³

从北非洲到欧洲建设着三条新的天然气管道。北非国家天然气综合体的分工合作使有可能在危机后得到发展。从埃及和利比亚出口天然气的管道出现后每年将对欧洲市场增加供应约460亿立方米天然气，使竞争激烈化。可能三个北非国家会逐渐建立某种非正式的联盟。跨北非天然气管道可以实际加强它，建设此管道的思想早已存在。北非还可能以超过挪威出口能力的天然气供应者在欧洲市场出现，对俄罗斯的出口能力挑战。

赤道非洲国家，例如，尼日利亚在积极开发欧洲市场。在它的天然气液化工厂里计划建设第四条工作线，以后再建第五条。很快地安哥拉也会参加非洲液化天然气出口者俱乐部。

尽管尼日利亚和安哥拉计划的实现推迟了，2010年后北非和西非国家向欧洲输出的总数可能再增加650-700亿立方米，接近年1400-1500立方米。据估算，南欧的主要进口者-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需求只增加约550亿立方米。非洲天然气可以供应中欧，成为对俄罗斯已有的地位了实际竞争者。危机阻碍了这些计划，但它们有取消。

暂时非洲-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的竞争还不是全面的，只在个别地区，主要是地中海北部。此外，非洲和俄罗斯暂时感觉到的还不是相互的，而是来自“旁边”的，首先是近东国家（卡塔尔）以及其他天然气供应者的压力。

尽管世界经济上存在危机现象，在可预见的时期，保障主要工业国原料资源的问题还会不断增大。非洲作为最晚广泛开发的碳氢化合物资源之一的作用不仅保持，还将增大。世界大国对非洲能源的争夺将激化。争夺的将主要是三个中心-欧盟、美国和中国。中国作为非洲自然资源的消费者将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存在，排挤西方。其他选手只能局部参加这些进程。

最近十年内俄罗斯瓜分非洲“碳化硅在蛋糕”方面的作用将不大，可是在局部的一些方面（天然气，建立石油、石油-天然气结构）俄罗斯对西方和中国是实际的竞争者。

至于俄罗斯在非洲的地位（2008年我们的贸易额-63，4亿美元）⁴，首先我们应该是现实主义者。那里占上风的是欧盟（2009年总贸易

额-3741亿美元)。美国(1341亿美元)⁵略超过中国(1061亿美元)⁶。当然,在2009年和2010年这些数字有些下跌。按比例,中国在20年来和非洲的贸易额增加了29倍,美国约6-7倍,欧盟-约2,5倍。俄罗斯-2倍。⁷(资料基于我们海关统计,部份商品是通过分公司、免税区等运出的)。趋势和俄罗斯的地位很清楚。

俄罗斯的老问题:“是谁的错和怎么办?”

谁的错-很清楚。是1970-1980年苏联经济系统的低效(BTC代替了和非洲的经济合作)和国家财产被瓜分的失败的1990年代,当时已顾不上非洲。

怎么办?

1.确定重点-我们实际需要什么?

2.准确地确定我们努力方向-要对哪些非洲国家特别注意?对于我们哪种活动较有前途?

3.确定哪些资源-国家的和私营的-可以用于达到提出的目的?同时牢记我们的不幸:我们的行动迟缓。我们在非洲活动的人士没有实际的协调。甚至不能和中国行动相比,那里常常利用“China Inc”的词汇,即“中国公司”。

对于和个别非洲国家(从俄罗斯看来关键的国家)的经济合作和保障在这方面活动的俄罗斯实业的国家支持的深思熟虑的国家政策作用特别增大。而且,这里指的既是财经、法律、政治的支持,又是科学研究、信息-宣传的支持,世界上较为重要的国家都又看到了后者的作用。

4.确定在非洲谁能成为-暂时不是盟友,而是可靠的,国家和私人水平的友好伙伴。非洲的某些国家的政治、军事、知识上层是在苏联形成的。例如,现马里总统曾在梁赞内务部学校毕业,安哥拉总统的第一个妻子曾是俄罗斯女人。安哥拉国防部的所有领导人都讲俄语。非洲的这代领导人在五年-十年后将离去。现在需要利用过去残存的可能性并且恢复对非洲人才的广泛(而不是现在那样可怜的)规模的培养。

尽管有这些问题,现在非洲平均的发展比整个世界快。它还会相当快地发展。俄罗斯的任务是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注解:

1.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0. P. 6, 9 // <http://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2. 中国打算保持自己三分之二的外汇储备。// Zero Hedge. USA. 24.04.2011 // <http://www.perevodika.ru/articles/18439.html>
3. 按计算: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7. P. 30; 2010. P. 30.
4. 2009年俄罗斯联邦和主要国家的外贸 // <http://www.customs.ru/ru/stats/arhiv-stats-new>
5. 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9: Table A12 – EU, USA //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09_e/its2009_e.pdf
6. 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9: Table A14 – China //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09_e/appendix_e/a14.xls
7. China-Africa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Annual Report 2010;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N.Y., 1991, June; 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9: Table A2, Table A12; 2009年俄罗斯联邦和主要国家的外贸 // <http://www.customs.ru/ru/stats/arhiv-stats-new>

关键词：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非洲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量，非洲的矿物资源。

康斯坦丁·弗努科夫

俄罗斯驻南韩特命全权大使，历史学副博士

rusprotocol@gmail.com



俄罗斯和怎样的亚洲一体化？

不久前的两个主题相互呼应，发人深思的辩论使我提起笔来（如果在我们的计算机时代可以这样说）。

第一个是我国一些政治学家、东方学家和外交家在“国际生活”¹杂志上阐述的关于俄罗斯内外政策中“亚洲”矢量的观点。B.尼科诺夫、K.巴尔斯基、Г.托洛赖、B.苏姆斯基和其他参加者以不同的情调，或多或少的乐观主义对主要的问题有统一的看法-俄罗斯有愿望，总的来说也有良好的条件正确地建设XXI世纪最有前途的地球部份-亚太地区并在其中居自己的位置。我确信，2010年外交分析的结果和实现最高领导提出的和亚太地区一体化和西伯利亚与远东发展相关的任务过程使有可能肯定地回答辩论的主要问题：“俄罗斯在向东看？”

我认为对于我们，亚洲人自己怎样看待自己的地区，它是否能变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角色，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通过太平洋两岸国家的潜力的算术总和得到的抽想物质的问题并不次要。它们的经济强劲增长是使它们悦目的客观现实。

在这种意义上，今年二月底在首尔举行的，聚集了地区许多国家的700个代表的题为“东亚在世界上：前景和挑战”的国际会议给人不少“思索的素材”²。会址选在南韩并非偶然。正是这个国家在几十年来

从落后、荒废和军事极权统治状态做到了飞跃的突破，成为世界上15个政治和经济发达国家之列，2010年在亚洲大国中第一个光荣地承办了“大二十国”峰会。南韩还在亚洲危机（1997-1998年）就得到了克服严重后果的“诀窍”，不仅能以最小的损失绕过今天全球财政危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6.2%）的礁石，而且表明愿意和“二十国”、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东亚峰会和其他一体化组织成员们分享自己解决经济、财政、气候变化和保障“绿色增长”问题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首尔会议组织者提出自豪的口号“全球的韩国-2011”的原因。

南韩总统李明博在讲话中阐述了对东亚局势和发展前景的原则评价。

今天朝鲜、中国和日本以及东盟国家人口占世界的31%，总产值-20%和世界贸易额的22%。如果加上东亚峰会的其他参加者（美国、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很明显：从全球经济和安全观点看来，东亚不仅是切身重要的地区，而且是今天建立新国际秩序的试金石。

阐述在这种原则上不引起异议的定义之后，李明博还认为必须提到东亚素有的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没有的多彩文化、民族和宗教，这里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诸多不同。南韩领导人指出各国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原因选择和别的国家直接对峙或加入对抗集团的时代已成过去，完全正确地称理解和尊重上述的不同，利用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东盟³，东盟地区论坛等重要会议搞好慎重的地区合作是时代的新的要求。

他认为，安全方面合作问题复杂得多，因为东亚保留着与对历史的不同见解、围绕领土和海洋空间的争议有关的不稳定因素；由于缺乏信任，这里的军备竞赛比地球上的其他角落紧张得多。

完全可以理解，南韩总统专门谈到了朝鲜半岛的局势，那里从冷战时期保留着民族的分裂、激烈的军事对峙和其他过去的残余，不消除它们就谈不上东北亚安全方面的真正合作。自然，这里少不了对民主朝鲜的呼吁，呼吁它停止发展核武器、销毁已有的这种武器，像中国、越南那样走开放改革道路，和南韩一起建立和平制度，建设经济共同体作为民族统一的基础。

大概，方式和内容都最吸引人的的讲话之一是从教授生涯来到政坛的陈钟元在会上的讲话（顺便提提，他得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国立远东大学荣誉博士的称号），直到不久之前还是南韩总理。

陈钟元在不否定东亚增长的总的潜力的意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中心的同时，指出了一系列严重的“不确定”和挑战。它们组合为三个组。第一是与全球气候变化和重估碳氢化合物作用有关的挑战。第二是地理政治性质的不稳定。有些人认为“二十大国”时代到了，另一些人指出新的力量中心的出现。南韩政治家指出了中国和印度影响增大的不可否定的事实，它们迫使其他大国（美国和日本队）制订和它们打交道的新规则和在地区行动的总的行动方针。最后一个是世界经济的不稳定。

在回答东亚国家面对这些挑战应该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时，陈钟元按东方的方式提出了三个“更加”思想。即“更加开放、更加有远见”（特别是在克服过去历史不良影响方面-实际上这是对日本的直接呼吁。）此外，还要“更高水平的相互信任”，首先是南韩、日本和中国之间，使之纳入保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轨道，自然包括共同努力使北朝鲜变为“负责的选手”。他还建议东亚国家“更加积极出口”商品和“思想、经验和希望”。总之，陈钟元确信地区在XXI世纪不仅应该得到经济增长火车头的称号，而且要成为地区协作的模式。

北京大学教授汪其猷的讲话毫无疑问地引起了兴趣和活跃的辩论。他呼吁慎重对待关于东亚将在世界上起主要作用的言论。理由是地区并非一体化的选手，应该说，教授列举了相当有力的论据，冷却其他演讲者的激情。首先，地区国家虽然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至今未能缩小它们的历史分歧和达到明显的政治一体化。这里仍有两个-中国和朝鲜民族的分裂，日本仍和邻邦-俄罗斯、中国、南韩，还有一系列南海国家的领土争议。此外，东亚没有安全、保障和平与稳定方面有生命力的协议或机制。例如，中国强调指出对美国和日本、南韩军事联盟，特别是在2010年联合军事演习背景下军事联盟的加强感到严重不安。是的，东方的习惯和道德和西方不同，中国政治学家认为，说统一的“亚洲价值”，特别是民主、法律高于一切、信仰自由等基本概念未必恰当。此外，“东亚的升起”是相当不平衡的：例如一边是中国和越南，另一边是缅甸和民主朝鲜。

与此同时，总的来说汪其猷对幸福并不悲观，他指出地区经济份量的增长、贸易、交通和社会联系发展的加速使有理由对东亚发展的路线感到乐观。说来奇怪，但是地区的不平衡和差距却使“开放的地区主义”可能并得到赞同。

在讨论东亚能否按欧洲模式搞好合作并建立地区共同体的问题过程中，南韩前外长（现汉城民族大学教授）尹龙金在“先驱报”3发表的文章引起了一定的兴趣。

西方的，或者所谓“自由”理论的拥护者建议三个组合点：政治民主、经济的深刻相互依赖和用于实现多方协作的有生命力的机构。前总理认为：美国早已用作欧洲一体化的核心的头一点(Pax Democratia)，由于东亚的政治系统的多样化至少对它是不能适用。1997-1998年财政危机后得到的经济相互依赖性极其重要，但是未必能保障地区国际关系的稳定，去年美国和中国、日本和中国对抗的爆发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联合的另一个不能接受的条件，即制订调节各国（按欧安组榜样）行为的准则和规则，对于由面积大小、发展水平和政治经济系统都根本不同的国家组成的东亚，是相遥远的未来的事情。

出于保障地区稳定与发展的迫切需要，东亚政治的创造者着重于这里出现的组织（东亚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加三等等）的范围内的“结构化”。可是这是相当政治化的进程，伴随着主要“选手”之间秘密和激烈的斗争。这里尹龙金劝东亚人采取务实态度：不要花大力气追求宏伟的，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不现实的欧盟式机构，而要集中力量建立规模较小的功能性质的组织和联盟（欧盟也根源于过去的煤和钢联盟），为和平、稳定与发展创造相互协作的组织。教授提到了已成功工作的所谓清迈倡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谈判。南韩教授强调：它“虽然还没有取得重要成果，但它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机制”。

前外长欢迎继续这种一体化进程，认为日本“福岛”核电站灾难后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建立核安全的地区机制。考虑到仅在日本、南韩和中国就有88个核电站，还有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的北朝鲜宁边核中心，仅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显然不够，必须建立地区核安全方面的合作机制。

从我们亚洲伙伴上述意见片断就可明显看出：亚太地区，即使拿其东部来看，它不仅经济蓬勃发展，而且处于自我确定和制订地区协作模式的重要阶段。这里很清楚，东亚和整个亚太地区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的特点，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还有大量潜在的冲突可能性，和其他地区，首先是欧洲根本不同。去年围绕南韩护卫舰“天安”号沉没的对Enphendo岛的炮轰引起的1950-1953年朝鲜战争以后两个朝鲜空前的对峙和地区“主要“选手”们关系的紧张就证明了这里的冷战惯性多么强大，status-quo多么脆弱。只是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在2010年十一月-十二月期间的紧急努力才防止了38线两边的两个按人数和现代军事装备都最强大的军事集财的武装冲突。

这些事件证明不仅朝鲜半岛，而且在北亚都迫切需要建立可靠的，法律上必须执行的和平与安全机制，没有它经济一体化进程必将停滞不前。正因为这样，自己远东的公民的安全和发展我们地区的大规模计划的实现都和东北亚局势有直接联系的俄罗斯，承担了朝核问题六方谈判范围内相应的工作组主席的作用。

顺便提提，显而易见的是，在上述材料中，还有其他国际会议参加者的讲话中，即便谈到我国，往往只是稍略带过和“打逗号”。“国际生活”杂志上一月辩论的参加者合理而且相当全面地指出了它的原因。为了克服冷战时代（某些还涉及到沙俄时代）的陈规陋习，消除担心和猜忌，确立有助于解决地区的政治、经济问题的，从实业观点看来现代的、民主的、有吸引力的威信，需要我们的政治家、外交家、实业家和科学家进行双边和多边范围内的长期不懈努力。许多事情已在做，成功举办2012年秋天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旨在巩固已有的成就，为我们开辟新的前景和可能性。

注解：

1. 《国际生活》. 2011. №1. C. 62-86.
2. 南韩杂志《Diplomacy》关于会议的汇报. Vol. XXXVII. № 2. C. 20-22.
3. 《先驱报》. 2011. 五月2日。

关键词：亚太地区，地区合作，一体化，“开放的地区主义”。

亚历山大·卢金

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大学）东亚和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

asia@mgimo.ru



中亚和阿富汗在俄罗斯战略中

苏联解体后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大大减少了，但俄罗斯仍是不可忽视的大国。因为苏联解体后得到独立的很多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西部，相对地，俄罗斯的亚洲地区和它外交政策亚洲方向的意义自然也增大了。

中亚和整个南方对于俄罗斯重要还因为主要的战略威胁来自这里。今天俄罗斯处于对自己独特的形势-它没有严重的外敌。世界大国中没有企图消灭或者大大削弱它的国家。即便某些不大的邻邦有非本分的，仍生活在反“苏联扩张主义”的旧思想中的统治者存在此愿望，他们没有实现自己幻想的能力。

可是这并非意味着没有严重威胁，包括对我国生存的威胁。它们的来源不是某个国家，而是跨国的运动、意识形态和与之相关的组织。在这些威胁中，大概最危险的是来自南方阿富汗-巴基斯坦枢纽。这首先是得到极端伊斯兰主义培植的恐怖主义和按照某些资料，已把将近五百万俄罗斯人变为吸毒者的麻醉品。正是在俄罗斯一些地区传播的极端伊斯兰主义刺激大部份的（尽管不是全部）恐怖主义集团和支持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运动。

阿富汗

今天国际社会在阿富汗碰到了最大的难题之一。它在于阿富汗的局势很难解决。今天难说谁对阿富汗国家的解体和现在的混乱承负最大责任——是推翻了相当开明的国王的阿富汗人自己，为“保护革命成果”而派驻了军队，后来双撤兵，抛弃了自己原来的盟友的苏联，相互进行武装斗争的阿富汗贪污集团，消灭了文化价值并支持了“基地”的“塔利班”，还是粉碎了“塔利班”。但没能消灭它和搞好秩序的今天的国际力量。谈到后者不能忘记，第一，对“塔利班”的军事行动是2001年九月一日纽约恐怖事件后进行的。第二，今天试图稳定局势的国际协助安全力量是按照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建立的。尽管美军起了主导作用，从2003年起由北约指挥，参加行动有四十多个国家。其中有不少非北约成员国。

尽管进行持续了十年的巨大的努力，国际协助安全力量没能控制阿富汗全境局势。使问题复杂化的是，看来“塔利班”的大部份拥护者，还有“基地”领袖们都没有住在阿富汗境内，而是在巴基斯坦政府没能控制的边境地区。形成了恶性循环：不控制这些高山地区难于解决阿富汗问题，而巴基斯坦军队却不能，也许不愿意这样做。向那里派进国际部队会导致本已不稳定的巴基斯坦爆炸，使局势更加复杂。

理解到军事行动没有前途，B.奥巴马政府真诚希望撤兵。接近俄罗斯和中国军方的人士中关于美国企图以反恐怖主义为借口而固定在阿富汗，以便影响中亚的的险恶阴谋的看法纯属臆想。撤兵是B.奥巴马竞选诺言，得到大部份美国选民的支持。今天，在财政极其困难条件下很少有人会愿意对毫无前途的战争花钱。不过，愿望还不等于可能。离去后让“塔利班”重新归来意味着完全丧失威信，返回2001年的局势，承认自己无能向恐怖主义作斗争。

美国军人向来都说他们必胜，只需要增加军队、资金和努力。苏联军人也曾这样说过。可是到头来都不得不毫无光彩地退出。因此，美国大概会这样行动：军队分批撤出，逐渐把控制权交给阿富汗军队并保持军事基地，以便在一旦局势恶化时部份返回并对“塔利班”打击。2014年将宣布结束军事行动和撤兵，但将在今天加紧建设的某些关键基地上保持一部份力量。

这种战略能否成功，未来将告诉我们。它在伊拉克总体是成功的，但阿富汗的情况原则不同。阻碍稳定的有巴基斯坦因素、复杂的高山地形、旧的国家机构完全解体和民族众多。因为“塔利班”主要是普什图人的运动，普什图人虽占多数，但那里还有塔吉克、乌孜别克的军事武装，他们坚决反对“塔利班”。与此同时，“塔利班”完全可能长期在某个省份进行游击战，某些省份及其省长和军队可能从这一方转向另一方。

国际协助安全力量行动总体符合俄罗斯利益。对我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正是来自阿富汗，首先是恐怖主义和麻醉品威胁。按联邦药物管理局的资料，每年阿富汗生产800吨海洛因，而且阿富汗的麻醉品中35%进入俄罗斯。俄罗斯的吸毒者已将近达到五百万人，还在不断增多。“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胜利将导致伊斯兰主义在中亚的传播，它又将从中亚进入俄罗斯。

最近十提来，即反“塔利班”行动开始以来，阿富汗的罂粟种植增加了将近39倍。但这并非美国希望把麻醉品摔给俄罗斯，使之陷入灾难（这是一个流行的“爱国主义”神话），而是因为国际协助安全力量不敢对麻醉品进行坚决的斗争。种植罂粟是阿富汗农民的唯一收入，失去这种收入，他们就会投向“塔利班”。正因为这样俄罗斯奉行正确的方针，指出必须更坚决地向麻醉品作斗争并且全面协助（除了军事）国际力量。解决阿富汗问题，包括限制麻醉品交易的问题应该依靠共同的努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使之得到其他收入来源，协助阿富汗领导建立高效的机构。在这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和主要角色-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利益完全吻合。最近阿富汗的各大邻邦对该国问题解决的兴趣急剧增大。例如，印度拨款20多亿美元用于恢复和发展阿富汗。印度专家们指出必须和俄罗斯在这个国家协调行动。中国也开始了为阿富汗培养军事和民事专家的计划并且积极开采阿富汗的原料资源。国际联盟的协助和发展与阿富汗的经济和政治合作有助于国际协助安全力量的撤出和稳定该国的局势。

俄罗斯和中亚

阿富汗的麻醉品、伊斯兰主义和恐怖主义主要通过中亚渗入俄罗斯。这个地区局势的不稳定促使威胁根源直接接近俄罗斯边界，恶化它的处境。可是这并不减少中亚对俄罗斯的意义。作为原来统一国家的主要部份的俄罗斯保持着对中亚的很大影响。可是这影响已不是垄断性的，俄罗斯领袖们承认这一事实。这里美国的政治影响，欧盟和中国的经济影响在增大。和地区有传统的文化与民族联系的印度、伊朗、土耳其在这里也有一定的威信。例如，今天中国已是吉尔吉斯的重要贸易伙伴，塔吉克斯坦的第二个贸易伙伴（尽管暂时俄罗斯还是这两个国家的第一个伙伴，但中国按进口额已超前）和哈萨克斯坦的第三伙伴（次于欧盟和俄罗斯）。从土库曼有唯一不经过俄罗斯领土到达中国的天然气管道。

俄罗斯自然希望保持自己在地区的影响。可是这种愿望和苏联类型的扩张主义、迫使独立的中亚国家服从自己的政权，把某种政治系统强加给它们没有联系。俄罗斯和苏联或者美国不同，它不奉行基于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不试图把自己的发展模式或自己的价值（它自己也不太理解）强加给别人。它奉行基于民族利益的政策。它在中亚的利益如下：

1. 尽量减少来自南方的威胁。

2. 经济合作积极化。中亚国家是俄罗斯重要的经济伙伴，包括在动力方面。

3. 一体化的积极化。没有扩张计划并非意味着前苏联空间的居民不希望更密切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突然出现的边界和原来一个国家的组成部份之间的障碍阻碍在最基本基础上的经济合作。因此，独联体空间里在不同效率的情况下毕竟发展着各种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计划：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最有效的应该说是海关联盟，参加它的有哈萨克斯坦，中亚的其他一些国家也希望参加。海关联盟消除海关边界，简化普通公民之间的接触。

4. 保持文化共同点，支持俄语和增加对俄罗斯文化的兴趣，保护俄罗斯公民利益。

俄罗斯保障自己在中亚的民族利益既不违反地区国家的利益，也不违反其他大国的利益。而且这些大国-俄罗斯、中国、印度、还有美国和欧盟在地区的利益大致是吻合的。所有各种基于境外各大选手势必激烈争

斗的“大棋盘”和“大博弈”的思想如果不是把自己希望的当作现实，那就是因为对生活的知识不够和试图标新立异。

主要选手在中亚的利益至少有如下三点是吻合的：

- 护政治稳定（谁都不希望政治爆炸导致极端伊斯兰运动取得政权。
- 保护非宗教政权。
- 加速地区国家经济发展，只有它能成为政治稳定的基础。

俄罗斯、中国、印度、美国和欧盟都支持这个方针。在这种意义上它们每一方在中亚的经济、文化积极性都不能被看作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保留了冷战时代思维的保守者往往是这样，而且远非仅仅在俄罗斯有此情况）。如果欧盟或中国向中亚经济投资，支持那里的文化和科学研究活动，并非意味着对俄罗斯的利益的危害。因为此种努力最终将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反对类似的行动是愚蠢的，是“不利人也不利己”的做法，会引起中亚居民的反感，而且在当今世界也未必行得通。至于俄罗斯要表现自己并不惜为类似计划投资，那是另一回事。

当然，国家根本利益的吻合并非意味着没有各国不同公司之间的竞争。许多公司，包括大型的国家公司，例如，动力公司将在这里争夺市场，有时还得到自己政府的支持。可是不能把个别公司的竞争和国家之间的斗争混为一谈。这种竞争往往在最亲密的盟国之间展开。我们记得1982-1983年美国 and 加拿大的“马铃薯战”和涉及到美国、英国、欧盟和拉美一些国家利益的“香蕉战”。那是尖锐的经济冲突，但没有导致恶化基于牢固的联盟基础的政治关系。俄罗斯政府必须保障本国公司的利益，包括在中亚的利益，但这并不是说要在那里和根本的国家利益吻合的国家进行政治冲突。

中亚的民主化和尊重人权问题有些独特。自然，谁都没有在理论上反对民主化。可是在发展薄弱的国家中往往是在稳定和混乱之间，而不是在民主和极权主义之间作选择。西方许多人，尽管不是所有人，习惯以理想的，而不是实际的观点看待这个问题，不顾后果呼吁在这里立即民主化。因此，在中亚行动的主要境外选手的看法可能不完全相同。而且其中还有担心“有害的自由思想”在自己境内传播的人。

在这方面，阿拉伯世界革命浪潮对中亚政治局势的潜在影响极其有趣。这个地区的政治文化只是部份近似阿拉伯世界。除吉尔吉斯之外，

和阿拉伯世界不久之前那样，到处都是极权的，氏族的，贪污的，残酷程度不同的政权，而传播最广的宗教是伊斯兰。可是在这些国家中生活的毕竟是不同的人民，它们长期生活在苏联时代，因此比较有苏联人民的性质。

未来的研究家大概会研究关于阿拉伯世界事件有多少阿拉伯特性，能否把它们看作是世界反极权革命的部份，能否形成民主化的“第四浪潮”。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运动的结果，民主政权是否能巩固或者只是一个极权政权取代另一个极权政权，甚至增加伊斯兰因素。暂时吉尔吉斯的经验表明民主化是可能的，但存在对稳定的严重威胁和可能激化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

大概，今天在混乱扩散方面最危险的可能是乌孜别克斯坦的局势。这里执政的是较强硬的家族型政权，很像原来北非的统治者，何况推翻它的尝试已经有过。塔吉克斯坦的局势也很紧张。土库曼情况表面上还安静。总体稳定发展的哈萨克斯坦局势也相对稳定，尽管这里存在政权更换的问题。吉尔吉斯已经有过二次革命。威胁它的更主要的是混乱和分裂，而不是新的反政府浪潮。

不管怎样，保持地区稳定符合俄罗斯和所有境外选手的利益。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事件表明，即使有外国的重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极权制度不是永恒的。贪污腐化、氏族专政、裙带关系迟早会引起居民的仇视，任何理性的考虑都保不了它。我们俄罗斯和其他在中亚有利益的所有国家都要考虑这问题。摆脱此局势的出路是制订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共同的计划。为此所有主要力量和选手都要合作，应有对可能性的危险的共同理解。

关键词：威胁、恐怖主义、“塔利班”、“基地”、国际协助安全力量、联邦药物管制局、麻醉品威胁。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国际生活

PRO ET CONTRA



俄罗斯目视东方？——辩论



未来的概念和战争——辩论

辩论

俄罗斯目视东方？

“国际生活”杂志总编，俄罗斯外交部长顾问 阿尔曼·奥加涅祥：去年是亚洲事件大丰收年：在日本举行了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河内——俄罗斯-东盟第二次峰会，俄罗斯参与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亚峰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和其它等国际论坛。与此同时，俄罗斯在亚洲方向上存在不少问题。我提议现在进行一个小结，瞻望下未来并就前景问题进行讨论。

俄罗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安全指数”杂志总编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俄罗斯作为一个欧-亚大国，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了平衡欧亚方向的原则性方针。在对内政策上，通过了包括截止2025年远东、布里亚特共和国、外贝加尔斯克边区和伊尔库茨克州的发展计划。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任务——减轻此方向道路上的工作和保障国家安全。但存在严重的内部问题。就地理上而言：对离联邦中心9000公里远的区域难以管理。就人口而言，乌拉尔山以东的人口有700万，但大城市间相隔的距离不少于400公里。缺乏能对联邦中央、区域和俄罗斯亚太地区邻国具有同等重要的大规模的和战略吸引力的项目。最后，根据专家的看法，俄罗斯缺乏发展远东的明确战略。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谈谈俄罗斯作为应有的伙伴，非以小伙伴的身份融入21世纪亚太地区的可能性问题。看来，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2012年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有突破，要做许多工作。但不能将亚太地区方向政策孤立于俄罗斯亚洲政策的总体来谈。

我们首先该谈的是南亚和中亚地区。普京曾强调指出将俄罗斯远东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落实地区上的对外政策任务相结合的重要性。他说，首先，作为重点发展的是能源基础建设，创建新的工作岗位，并可能还得比其它地方更积极地发展创新活动，旨在使我国远东应当为亚太地区自然的组成部分

但是，如果没有具有吸引力的规模性项目，我国的远东不可能融入世界经济。我们的印度同事就说，俄-印关系上一切都好，就是没有能将我

们的合作向前推进的新战略项目。重要的是，使俄罗斯和印度的新一代人能感受到存在比一般的友好、合作的言论和军技合作领域僵死的合同更多的东西。印度同行提出过奇特的建议，比如，让50万旁遮普人前往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俄罗斯的农业。俄罗斯不应当畏惧移民，应当视其为是俄罗斯居民，俄罗斯国家在政治上能被利用的一种可能性。

鉴于将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罗斯应当在同自己地区伙伴的关系上解决几项任务。其中有像解决核能上的高新技术合作问题（越南、中国），进行包括在安加尔斯克浓缩铀国家中心为平台的国际项目，纳米技术，宇宙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在安全领域，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导弹技术和双重技术的扩散，抵制恐怖主义，特别是抵制为恐怖主义进行融资方面的合作。梅德韦杰夫就俄罗斯将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主席国表示，我们有意在整个亚太经合组织空间针对保障能源、运输、粮食、生态和信息安全继续进行合作。

石油天然气联盟”跨国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世界政策和资源”基金会主席尤里·沙弗兰尼科：我是从能源角度来看亚洲地区。土库曼首次铺设了通向伊朗的管道（这条管道今后有可能会得到发展），首次结束了通往中国的管道铺设工程。目前，这还是一条未最终形成天然气轴心，但行业内围绕其周围的事件将会得到发展。自伊拉克北部和伊朗，早晚会上建造通向土库曼和欧洲的管道。鉴于此，俄罗斯将面临的不仅是能源层面的问题，还将出现如何对待这条天然气轴心和如何决定优先性的思想问题。

从我的角度来说，对俄罗斯、伊朗核和土库曼所有三个国家来说，优先性将归于数量、方向和价格。俄罗斯面临着重大的经济、能源和政治任务。但在这方向，我们什么都没做，除了发表一些专家的讲话。如果为了下调价格增多生产，又何必呢？

我们必须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当我们谈论与中国的相互关系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能源。中国是能源资源的大消费国。得始终记住这一点。1950—1990年我们曾向中国提供技术。有一天，我们将从中国取得技术。这里有值得思考的问题。就这个问题，说实话，我抱有更大的悲观主义和负面态度。

我们在进行基础建设和建造管道。但是，就像我六年前所写的，管道连40%的石油量都不能保障。如果从秋明泵油，我们将失去欧洲的市

场。就拿今天的征税制度来算一下，按万科尔斯科输往太平洋的石油价格，这块油田早就得关闭，因为无利可图。这是俄罗斯自1990年以来最好的油田，除了苏尔古特，这条管道一带很少有人作业，再说，那里也没有3000万吨的油。至少得过10年，这条管道才能运作起来。世界上几乎没有在海岸的管道终端设厂的事。工厂都设在接油地段上。在接下自海运的廉价石油后，就在当地进行加工。然后，不管以什么形式，石油产品形式也好，就是化工品也行，在加工后往内地转运。但为4000美元的石油价建新厂，你必须有一个你在为那个市场建厂的明确概念。市场已全被占居。中国人向日本买厂更划算。因此，从亚洲的能源方向角度来说，我更倾向于作为一个消极者，因为，在对此东方动向不进行认识和承担风险的话，我们胜任不了这一能源方向。

俄罗斯外交部第三亚洲司司长米哈伊尔·加卢津：在从事东亚和大洋洲国家，即，日本、东盟10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双边关系问题方面，我试图通过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总体利益来分析我国同这些国家关系上的当今趋向。首先，这是确保俄罗斯更进一步地融入亚太地区的任务。

过去的一年，从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地位的加固来说，是卓有成效的一年。从俄罗斯利益的角度来看，区域的情势比以往更好。在东南亚和大洋洲经济危机后的迅速恢复和亚太地区国家寻求保障能对在区域以多种方式参与为重点的安全模式需求增长的情况下，对俄罗斯的需求也有所增长。我国被视为是具有前景的投资和商品市场，而在政治军事方面，视以是在地区复杂的军政情况下具有分量的稳定因素。不稳定现象显示于以下全球性挑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蔓延、国际恐怖主义、跨国性犯罪，以及一些陈旧和相对新出现的区域问题和潜在冲突局面——自朝鲜半岛的核问题至南海的领土之争的问题。

亚太区域对俄罗斯需求的的增长，近来，无疑是以通过俄罗斯加入东亚峰会机制，参与“欧-亚”对话论坛，提高我们在亚太经合组织的侧面，东盟国家致力同我们以各种形式紧密合作的显示物质化。

我国在区域的地位得到加强，还靠与本区域一系列有影响力玩家双边合作的推进取得的。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推进靠同这些国家在高新技术和创新领域合作的激化取得的。

我想强调我国同越南显著加强的战略伙伴关系。2010年10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河内结果，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其中主要的是

涉及两国核能领域的合作协议。俄罗斯将帮助建造越南首座核电站，建立敷设的科研基础设施，培养人才。我国同越南在政治、国防、教育、文化-人文领域具有牢固的凝聚力。

我国与作为此地区大经济、科技和金融中心的新加坡的关系，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以俄罗斯副总理B.B.沃罗金为首的双边高层委员会于九月份开始运作。两国签有相互保护投资的协议。我国同新加坡为在俄罗斯境内实行建立“电子政府”的新加坡先进经验，进行系统性的合作。

我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关系也明显地活跃了起来。同堪培拉新工党行政建立了紧密的、相互信任的接触。俄罗斯-澳大利亚在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合作协议批准进程的结束，具有原则性意义

同新西兰领导也建立了密切的接触，启动了海关联盟（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新西兰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的正式对话。根据俄罗斯专家的评价，这个项目对我们带来极大的好处，因为，新西兰的经济编织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系统。

过去的一年，显示了在东南亚国家经济高新技术部门工作的俄罗斯公司成功地进行工作的范例，尽管其规模不算大。例如，俄罗斯的Vimpelcom，成了东南亚移动通信领先运营商之一。有向地区供应苏霍伊超级100支线（SuperJet）飞机和其它一系列项目的良好起点。

同日本的关系与合作，从其规模性及其战略分量的角度来说，以前是，现在依然是非常重要。遗憾的是，这种关系因背负往年的包袱——日本要求俄罗斯归还领土而不良。此因素的负面影响，显示于日本对梅德韦杰夫总统视察国后岛做出的反应上。但与此同时，两国的双边关系，包括经济领域继续保持向前发展。梅德韦杰夫总统和日本首相菅直人在2010年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的会晤上，定下了这种关系的方向。两国领导人谈妥像在经贸合作，亚太地区的合作，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更紧密的协调方向上加强关系。希望这将为进一步就和约问题的对话创建良好气氛的前提，再说，两国领导人都表示同意继续对话。

希望我国同东南亚国家双边关系上出现的良好趋向，将在2012年我国为亚太经合组织主席国的峰会上会有继续。

如果不谈大规模的战略项目，就从自己为地区一体化做出规模性和战略性贡献的角度来说，俄罗斯至少也有能带上何种项目走向市场的构想。萨哈林项目是如何启动的，是众所周知的。在日本的参与下，在南萨哈林建造了亚洲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厂。现在也有对西伯利亚大铁路进行现代化改建的重大方案。一个具有前景的课题——在亚洲建立应急反应的合作。最后，还有像电信通讯这一行业。但我们在推介经周密考虑的战略项目上做的工作，比我们能要做的少得多。

俄罗斯国家亚-太理事会安全合作委员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在总结过去一年时，可以说，这是俄罗斯政策转向东方，转向亚太地区的一年。俄罗斯国务委员会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了有关加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地位问题的会议。会议上委托了拟定加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地位的新构想。其反映了因经济危机而加速了将全球中心移至亚太区域的当代世界的主流大趋。亚太地区国家在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发动机，肩负了近五百年来由欧洲扮演的角色。今天，亚太地区国家的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60%，占世界投资总数的40%。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日本位于亚太地区。“G20”的半数是非亚太地区的国家，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比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多快。这种战略手段对俄罗斯来说很重要。在我国60%的外贸取决于欧盟国家对我国能源需求的情况下，将经济与欧洲“挂钩”，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陷阱，特别是显示在危机期间。

亚洲部分的亚太地区——政治改革模式重要的世界实验场，其并不以纯粹的西方化被接受，而是以民主管理形式和地方政治文化的聚合为基础的特殊发展道路被接受。

从亚太地区具有的冲突潜力来看，要求予其特殊的关注。在亚太地区对安全的挑战和威胁的增长，直接涉及到俄罗斯的利益。首先，这当然是朝鲜半岛问题。围绕在变为世界大国地缘政治利益交织的南海问题趋于尖锐化。存在许多还未能予以解决的边界问题，此区域一系列国家存在失去内政稳定的严重危险。

亚太地区的重要性还在于国家间的军-政角逐的重心在移往此地域。五个拥有军队人数最多的国家——俄罗斯、美国、中国、印度和北朝鲜都位于亚太地区。今天，亚太地区在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发达国家此进程则恰恰相反。除美国在增长速度上处于领先地位外，还有中国、

印度、日本和韩国。任何酝酿成熟的冲突能变为大祸，因此必须对此区域的进程予以特殊的关注。

因此，俄罗斯的欧亚方向应当具有三合一的任务：利用迅速增长的邻国来发展远东，变俄罗斯为亚太地区经济的一大组成部分和加强俄罗斯在安全问题上作为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玩家的作用。

与拥有大市场的迅速发展的地区毗邻，予以了我们进行经济改革，增加资本出口、增多对我们的投资、建立联合企业和通过俄罗斯融入地区、世界一体化进程，将高新技术生产局部于俄联邦境内的可能性，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应当指出，在危机前的2008年，亚太地区对俄罗斯的投资占对俄罗斯经济投资总额的5.8%。危机彻底改变了这种现象。在西方不再对俄罗斯进行投资的情况下，在危机年代，亚太地区对俄罗斯的投资增长了两倍。今天，亚太地区对俄罗斯的投资份额总计为21%，这是不小的增长。

我们能在极不相同的方向上进行合作。我们对亚太地区国家进行的传统出口商品——石油、石油产品、煤炭、初级加工钢材、木材和海生物。近期还会有电力和天然气的出口。但目前，我们在地区能源和资源的平衡上不占有重要因素。如果从地区的需求上来看俄罗斯的出口份额，那么，石油占1.7%。天然气为0.002%，煤炭0.8%。

在对加强我国资源地位予以极大地关注的同时，重要的还有推广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项目，特别是在工业领域的先进技术方面实施联合项目。这里说的是我国在越南的核能领域及核燃料循环系统的项目，但同时，日本也突破了越南的电站市场。如果我们拿到的是55亿美元的合同，日本则拿到140多亿美元的合同。而且日本人以贷款来凝固自己的合同，但俄罗斯还未确认提供相应贷款的事。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这些越南的邻国，对首次在东南亚由“俄罗斯核能”在越南要落实的项目经验，都予以极大地关注。

与亚太地区国家在太空领域——在韩国建造发射台，火箭和火箭发动机（日本和韩国），提供商业性太空发射服务（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进行具有前景的合作。

鼓励向俄罗斯进口高新技术生产设备，属重要计划。我们已具有生产汽车的巨大经验，亚洲的几乎所有大型汽车制造方显身于我国市场上。现在提出的还有像医疗设备、药剂、电子、机床、运输、机器制造业方

向的经营活动。俄罗斯有吸引日本和韩国及其它国家的公司参与对船坞，化工综合体企业进行现代化改建的项目。有更全面利用过境俄罗斯潜力的项目，首先是利用西伯利亚大铁路，甚至存在搞好通过远东港口向亚太地区出口粮食的项目。目前我国在远东没有转运港，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用于本国经济进口的粮食占世界38%。

俄罗斯在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系统中的正确立场和更积极地参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至关重要。此地区对俄罗斯的态度各不相同，一方面，我们被作为具有对政治进程能起重大影响作用的政治上的超级大国被接受，还有许多人以我们是同其它超级大国抗衡的力量被接受。另一方面，俄罗斯又被视为是经济侏儒，因此，持有包括文明层面的谨慎待之的态度。

今天，俄罗斯已融入区域所有大联合体：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太地区论坛、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俄印中三国合作、金砖四国、上合组织等。2010年结束了一个重要阶段，我们在各种一体化项目的竞争上和多年来在构建亚太地区安全的角逐上，到达某种过渡期的终点。就我本人的感觉，其以现实尺度，愈来愈倾向于领先地位，并亦能被解译为“东盟+8”的东亚峰会扩大形式得到充实。估计正是它将是构建21世纪亚太地区构架的主体。地区上不是所有国家对这种形式表示满意。东盟地区论坛的领导阶层对此形式的抵抗情绪在增长。如果以前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地区认为自己在安全上扮演主角，那么，现在这个角色将在有国防部长会晤上提出扮演。首次会晤已于2010年10月在河内以“东盟+8”形式，或称东亚峰会扩大形式举行。就俄罗斯而言，这个形式比任何其它形式都更有利。俄罗斯以全权身份参加。

现在，亚太地区的合作是俄罗斯对外政策和发展俄罗斯远东的重要取向。我提请大家注意人口因素：自贝加尔湖以东的整个俄罗斯远东的人口为700万人，中国边境地区的人口为2.8亿，北朝鲜人口2400万，韩国已将近有5000万。相当于堪察加面积的菲律宾人口有9500万并以一年200-300万的人口速度增长，不用说5500万人口的越南了。

就中国战略公布的报告结尾有这么一句话“中国政治家在90年代末推出北上，稳西和南下的策略”。俄罗斯可以将自己近十年的地缘政治活动表述为：靠西、稳南、东进。西方是高新技术之源和有利的投资，南

方是对安全构成主要威胁之源，东方则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中心，销售市场和拥有为进行一体化及全方位合作的可能性。

我认为，中美关系是21世纪世界发展的轴心。被作为“两强”谈论的中美关系，是绝对不可能的。美国自一开始就视中国加入游戏后，会同意起小弟弟的作用。众所周知，美国不存在非小弟弟的伙伴。中国从中觉察到美国将会影响其本国内部进程的可能性，因此，“两强”的思想永远不会实现。世界大国没有一个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满意。俄罗斯持中立立场。但美国明显地在企图建立遏制联盟。就此问题上，美国不仅依靠自己在本地区的传统伙伴，但也将赌注下在印度一方。应当从这个视角来看美国的阿富汗政策。我可以肯定地说，美国近期和在可预见的未来绝不会离开阿富汗。根据运往阿富汗的水泥量来判断，他们在积极地建造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并非建造在塔利班分布的地区，而是更靠近于北部和东部。无疑，中国在变为当今世界的第二个超级大国，对他来说，同俄罗斯的战略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俄罗斯是其战略的大后方。

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院长亚历山大·帕诺夫：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地位加固的角度来说，我完全同意2010年是俄罗斯外交上成功的一年。我们最终被接纳为东亚共同体和欧亚会议成员国。在地区组织中，俄罗斯唯有未参加的是亚洲发展银行。顾及到我国同日本的关系，近期也不会接纳我们。在此，我提示一下，就接纳俄罗斯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问题上，日本直至最后，一直反对我国的加入。只在1997年举行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会晤后，日本改变了立场。

15年来，我国的对外政策依靠贫乏的——外交、对外政策、经济手段，还是争取到俄罗斯被视为亚太地区大国。这些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确实是微不足道。尽管也列举了许多我们在做的事情，但做的事情也明显地不多。我们接二连三地在通过各种构思，战略也被一个接一个地通过，但在现实生活中并没见有变化。我国总统2010年夏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国家国务委员会会议后在自己的推特中写道：“说的话真不少，但我就没听说有谁提出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和建议的话。我感到遗憾。这哪是工作。”

现在没有必要劝解任何人使其信服俄罗斯必须走向东方。以前说的要一体化的说法，是对的，但我们又是如何理解这一体化进程。我们进入了地区，但不让任何人进入本国。这种做法在远东深有感受。哪一个外

国人能在那里办业务，特别是较先进一行的业务。我们的经济模式，就是在远东也同样排挤创新和现代化。在顾及人口问题和经济上的落后现象，远东应当有一种特殊的模式。将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看来会取得成功，但会后，这个地区又将会陷入无生气状态。好在还会留下两座桥和完美的远东大学新校园。

我从事亚太地区问题的工作已有20多年。在此期间，我没见到对我国远东和亚太地区发展的经济政策有根本的转折。无疑，最后被弃之的是希望。不知是否现在正在营造的构思会改变局面。说实话，我本人不抱有这种乐观的期待。我们想在所有区域论坛上显示自己，处处提出倡议，试问，我们何苦这样积极？是否应当集中精力去支持和发展由区域国家自己主张的提倡。不要自以为是比他人更了解在区域该做什么。但在有些问题上，我们可以，而且也应当更具有主动性。

朝鲜半岛的局势在趋于尖锐化。除了返回六方会谈外，没人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这种会谈并没能阻止朝鲜进行核试验，没能带来预期的结果。为什么就不以新的始点进行有关朝鲜半岛课题的谈判呢。对平壤来说，核问题并非是主要的。这是朝鲜玩的一张牌，在没达到其追求的目的之前，他将会继续玩弄这张牌。因此，我认为，应当返回到1953年的事态现状。这意味：必须以和约来换取朝鲜半岛的停战协议并来解决围绕其的一些派生问题。如果我们能与中国就此问题提出联合倡议，并当平壤见到新形式和谈判内容具有吸引力的议事日程后，他也能坐下来谈判。

近来一段时间，我们同日本进行的工作不多，或是根本就不进行。当然，举办文化联欢节，不能说不好，但其不能带来使大家将俄罗斯视为是友好国家的效果。近来围绕千岛群岛的事件，加深了日本人对俄罗斯的负面态度。我们需要日本不仅是将其作为经济和科技伙伴，同时也是为了平衡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我们不仅应当同日本在高层次上进行对话。我们对日本的政治特权几乎没有任何了解，特别是现代的，我们未曾与其工作过。我们也不了解具有影响力的日本媒体代表，也不同日本学者进行工作，除非是与那些30-40年前就有所了解的学者。必须与日本人搞好广泛的对话。岛屿问题将会继续存在，目前也无法展望何时能解决。因此，应当返回90年代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交流和在岛上，或是其周

边进行的合作。当年，这对彻底改变双边关系的换将和就和约谈判的背景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上述一切作总结时，我们可以说，东方对我们不构成任何威胁。我们在这里享有几乎是无限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因我们自己薄弱的经济发展，缺乏有学识的思想而受限制。如果能克服这一切，我们在东方将具有极好的前景。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欢迎俄罗斯既作为经济伙伴，有作为军政局势的稳定器在当地多层面上的存在。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外交关系学院（大学）东亚和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亚历山大·卢金：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处境非令人乐观。有关外交政策必须保障国内目标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如果外交政策不以国家的成就和实力，不以其影响力和在本地区的存在来加以充实，其也将不可能是积极的。这也是事实。我们喜欢谈论俄罗斯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在俄罗斯养精蓄锐时期执行的合理政策。但那时俄罗斯确实在养精蓄锐。当时正在各领域进行了重大改革，这场改革带来了现实的经济增长，促进了军事实力增长的军队改革，教育、自治权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改革吗？说得好听一点，我们的改革只在初级阶段上。有些改革也在进行。但这些改革的结果是否会像19世纪的改革那样的杰出，现在做结论还尚为过早。我们有像当年一样出色的外交家，一些现在也在场，但他们有困难，特别是在亚洲方向上的困难。因为，俄罗斯至今在亚洲的存在不够。

我们这里谈到一些项目问题。同以往相比，状况有所好转（例如，萨哈林项目）。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罗斯岛上和市内确实在进行一些建设项目。在此之前，那里没进行过任何建设。另一方面，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居民都在向外跑，当地人口与苏联时期相比减少了200-300万。投资环境跟在全国各地一样极糟。当地还存在一个严重的劳力和其它问题。不说别的，就拿造桥来说，为了推动项目，为了开工，总理为此不得不亲自两次前往工地。在这种基础上哪谈得上什么重大发展。在美国和中国没有什么领导人上工地和说服大家建桥的事。

是的，俄罗斯现在必须为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影响力的逐步提高进行工作。为此，我们拥有那些强有力的因素呢？军事因素将依然存在，就像大家都说的，因为具有实力，但近来，其意义有所改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此手段，但得特别谨慎。就经济方面来说，这则是最

薄弱的环节。此外，问题还在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不被视为是地区的一部分。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研究亚太地区国家的部门，但其中没有一个针对俄罗斯问题的专家，俄罗斯不属于他们的范畴。但那里有单独研究俄罗斯和中亚问题的研究所。俄罗斯主要以欧洲国家被接受，而亚洲国家则作为其中的一小部分。

近来，危机年代例外，我国与亚太地区一系列国家的贸易在增长。尽管如此，俄-中贸易额同美-中贸易额相比，要少七分之六，与日-中贸易额比较，要少几成。我们的贸易额甚至比韩国与中国的贸易额还要少。危机前，我们与日本的贸易增长很快，危机阶段又大幅度地下跌。

下面我们谈谈文化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从整体上的所谓“软力量”来说，那么俄罗斯又能向亚太地区国家示范何种楷模呢？我估计是屈指可数。遗憾的是，我们的团体、作家和其他文化工作者主要都面向于西方。这个资源应当被更好地加以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看法是，俄罗斯政策应当是持重的，就像A.帕诺夫说的那样。不过，其原则上现在也很合理。

我们老改不了苏联时期犯有的庞大狂习气。当年的苏联一定得在所有问题上推出某种全球性的思想。我认为，在当今条件下，这是没道理的。有几个方面我们确实可以进行活动：同现有的组织机构进行工作，促进在亚太地区经济上的存在，鼓励这种存在，致力有计划地确保俄罗斯参与国际组织和区域的各种进程。

必须发展双边合作，促使贸易增长，改善贸易平衡。我国同所有国家都存在很大的贸易赤字问题。例如，自2007年起，同中国就出现贸易赤字现象。必须完善贸易结构。

我想，现在不是从事全球项目的时候，因为，我们应当着手工作，以便为国内的发展和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一步一步地、有计划地创建增强力度的条件。

俄罗斯外交部亚太地区合作司副司长基里尔·巴斯基：我同意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帕诺夫提出的有关在远东和亚太地区没人对我们进行威胁的论题。确实是这样，我们不见有哪一个对我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这是俄罗斯在地区定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允许我们在亚太地区无例外地同所有国家发展合作，构筑平静的、始终如一的、综合性的路线。

但是，另一个方面，这个地区非常复杂，其积累的问题、争端、冲突的策源地、互不信任之多，使之地区安全威胁现实地存在。其紧张力度甚至达到极点。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主张在亚太地区构建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我们认为，亚太区域需要灵活的、多层面、多维的构架。亚太地区不同于欧大西洋，其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安全体系——没有类似赫尔辛基的最后文件，没有像欧安组织的安全与合作组织。需要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平等的，基于非集团性的，以国际法准则原则和最大限度顾及到地区所有国家利益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架构。就是为此超级项目，我们提议地区的所有国家在今后几年进行工作。

我向提请大家对以下非同小可的情况予以注意，这种构想并非是我们一国提出，亚太地区国家也同样提出这一构想。2010年9月份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北京进行会谈时，俄-中联合提倡加强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合作。我们对外政策思想也得到印度伙伴的分享。10月份在河内举行的俄罗斯-东盟峰会的总结文件中，我们与东盟“10国”就未来地区格局变数上阐明了共同视角。换言之，有一种感觉，似乎为重大变化必须的“临界质量”开始逐步形成。

所有希望此地区获得政治稳定及把保障稳定发展的国家，都应对亚太地区的可靠、有效构架抱有兴趣。无疑，这也迎合在目前亚太地区总体上处于的良好条件下我们进行推进的利益。

今天，我们在这里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角度谈论了不少问题。这都属于现实问题。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奥尔洛夫在自己的讲话中推出——要肯定地说我们已稳居于此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前，还得做大量工作的论题，是无庸置疑的。我们还得做比我们已做的还要多的事情。其前提也确实不错。

你们自己来判断：我们同中国建有多年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与印度也建有特殊水平的伙伴关系。我们较近的伙伴有：越南和蒙古。危机后同日本和韩国贸易量的恢复速度令人可观，投资合作也在迅速发展，而且不仅仅是在远东。呈现一种同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关系增强的新现象。有意思的是，在与美国的对话中，出现越来越多涉及亚太地区的共同课题：朝鲜半岛局势，打击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注意到2011年和2012年俄美将相继轮值为论坛主席，保障亚

太经合组织发展的继承性问题，等等。简言之，俄罗斯外交在此地区有诸多的工作要做，肯定的趋势也呈现在眼前。

今天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中能听到悲观的音调，其中有关亚太地区国家是如何看待和接受俄罗斯的问题——“不相应”、“不同一”、“不视我们为自己人”。这种说法，我认为，只是部分地有其道理，因此，这也有待我们去做的一项工作。

与此同时，我可以这样说，根据我们的评估，此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真心诚意地希望提高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侧重面。地区的每个玩家，当然都出自各自的国家利益。但总体上，我们伙伴眼中的俄罗斯——起稳定、平衡的因素，能保障地区“动态平衡”，建立“牵制与抗衡”，阻止当地发生大的冲突。我想，对俄罗斯作用的这种新的认识，在2010年为我们开辟了通向东亚峰会和“欧-亚”论坛机制的道路。

还有一点，就从其重要性来说，应当将其放在首位。这就俄罗斯高层领导对我国亚太地区的政策，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社会经济予以的史无前例的关注。而这些问题是相辅相成的。

对俄罗斯国内外政策的东方取向对国家命运意义的深刻理解，并为确保国家在地区未来的力量布局中占应有的地位开始采取实际行动，对我们外交官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这种实际行动显示于对远东发展计划融资的大幅增长，通往中国支线的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的启用，其它一些能源项目的落实，俄罗斯边境地区和州与中国东北省协调发展计划的实施和为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采取基础建设的措施，等等。

为加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地位，现在正在拟制庞大的行动计划。其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项工作得有各部级机构、地方政府、各公司和公民社会参加。同时，我们也还在考虑针对国内，而更主要的是对地区国家，更广泛地阐明我们亚太政策的综合措施。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要做的工作，有许多值得取经的地方。

在总结上述所说的，我想强调一下：我们拥有向亚太地区推进的条件，并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这我们可以大胆地将其列为优点。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具有学识地利用历史予以俄罗斯有机地步入地区的机遇。

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我认为，在亚太地区形成共同的科学-教育空间，俄罗斯不仅有能力，而且也应当将其作为自己投资的一项。否则，

无论我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峰会上如何卖力，俄罗斯不会被新一代专家、政治家、企业家视为是亚太地区的一部分。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有关共同的教育大纲问题。远东国立大学已在考虑此问题。鉴于此，就涉及我国对外政策而言，考虑如何吸引地区的青年，乃至地区各国的青年，在基于我国的学府和科研机构学习、深造、培训和进行辩论，就至关重要。再说，我们在这一方面，尽管目前经验还不够，但已有肯定的成绩。我们同“俄罗斯世界”和俄罗斯政治研究中心的同事举办的国际安全夏令学校，已名符其实地成为国际性学校。应当将一些我们一度关系较深那些非官方关系吸引于此环境。这在用于科学辩论平台，并非不重要。

当我们按“软”和“硬”的传统安全计划工作时，包括不扩散核武器问题在内，我们当然也能在发展亚太地区核能方面表现更大的积极性。正在出现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将会参与这些进程的国家：越南、印度尼西亚，说不定还会有其它国家。我想，俄罗斯在这方面该向别人学习。不仅是单纯地建造核反应堆，还是培养这些国家的工程师，而是参与在这些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形成核不扩散的文化素质。我们应当自己编制这些计划并对这些人进行教授。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国际合作司主导专家瓦季姆·佩斯托夫：不顾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利用核能的问题在许多国家愈来愈显示了其迫切性，特别是在原子能在世界复兴的条件下。不少国家对自己发展核能的可能性重新进行评估。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资料，今天约有60个国家表示有意发展本国的核能。已存在发达能源实力的亚太区域国家（韩国、日本、中国、印度）和一些在核能领域相对年轻的国家（越南、孟加拉）表现尤为积极。鉴于此，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在短期和长期前景的优先方向之一，视为是与其它国家在和平利用原子能上进行合作。如，建造核能项目、出口核技术和提供此领域的服务。

就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在2010年签署了将近20个政府间和跨部门的协议、备忘录。同越南签署了建造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现在正在同孟加拉就签署建造核电站的协议进行积极地讨论。在印度和中国都在积极建造核电站。

在地区上的工作也在积极展开。2010年7月，我国专家出席了东盟国家地区论坛，并介绍了俄罗斯的核能技术和在国外建造电站的经验。9月

份，在河内举行了由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公司参与的“在亚太地区和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科技研讨会。举行研讨会的目的，是介绍俄罗斯拥有的潜力，俄罗斯与东盟国家间在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可能发展的合作，推广俄罗斯核能创新技术，包括像建造核电站，核研究中心和在俄罗斯国内外其它核能项目的建造，核燃料循环科技保障，在顾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推荐要求，调节核能利用领域的法律规范，为核能行业培养本国人才，提供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利用核技术——同位素产品、核能医学、净水处理等方面商业化可能性和应用信息。

参与此讨论会工作的有东盟秘书处，东盟能源中心的代表以及东盟十国：文莱、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的代表团。讨论会上就研究和推广相应的创新研制和核能工业科研组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进行了成功地对话。为讨论会参与国之间就此领域合作进一步发展组建了平台。2010年12月，在雅加达为印尼专家就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举行了科技研讨会。东盟秘书处代表和其它对此问题抱有兴趣的公司和组织代表也出席了讨论会。

根据举办的这些活动结果，正在拟定和落实针对扩大科技合作，交流技术工艺，促进俄罗斯具有前景的技术在东南亚国家商业化，以及组建在此领域建立直接联系的有效机制和发展国家与私人伙伴关系的措施。

俄罗斯联邦做好带着具有竞争能力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建议走向国际市场的准备。鉴于此，拥有在世界各国实施核能项目巨大的国际经验的俄罗斯，将继续加强自己参与亚太地区主导的多边联合体的活动。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康斯坦丁·科科列夫：俄罗斯必须走向东方。这是一个双面进程。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就是我们不去那里，会有别人去。如果今天不采取紧急措施，那么我们在远东将会是多余的一员。东盟国家对我国东部地区也抱有兴趣。这里就需要我们进行细致和周密考虑的工作，旨在以为俄罗斯谋求福利的应有形式来答复这些兴趣。如何进行这项工作呢？做出的提议、计划都不少，其中许多被一致接受，如，被俄罗斯和中国接受。在集中努力上表现不会和无组织性，在为争取具体目标，哪怕是不大的，但标志了前进的目标，是一个主要障碍。应当有一个能对所有进程置于控制之下的，从事组织工作的机构。咱们就看中国是怎样做的。那里存在严格控制所有这些进程的国家委员会。

亚太地区的局势确实很复杂。为什么会这样？地区国家之间在对经济和局势问题的态度上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现在说的，是地区的一个将成为强大联合因素和为安全服务的结构。这就是东盟形式。如果分析源于中国的资料，像“东盟+6”或是“东盟+8”的形式，根本就没有，如果有也是极少见。这说明在这种形式框架内的工作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以便取得对问题的某种共识。此方向上的复杂性和困难性还将会有所显示。我们在亚太地区，就像上述说的，在经济上确实是“侏儒”。比如，我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额，2009年为30亿美元，中国则为5000亿美元。为合作与关系的发展存在障碍，例如，地区企业的水平。

“为了俄罗斯的统一”基金会副会长，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朝鲜计划部主任 格奥尔吉·托洛拉亚：我想就是否有来自东方、亚洲对俄罗斯安全构成现实威胁问题进行的辩论加以解释。今天，我们在这里对2010年进行总结，这一年的主要特征，即，认为可以靠经济上的相互协作，仅借助“软力量”来解决所有问题，从而可以注销安全上的“硬力量”想法，还尚为过早。朝鲜冲突、中-日围绕南海纠纷的尖锐化，美国显示遏制中国的意向，在中国周边构筑一定的盟友关系和军事驻留，都说明了这一点。

说亚洲安全问题的作用不如南亚，或是中东安全作用重要，那就不对了。例如，我国远东在历史上的存有200-300年，与具有千年历史的邻国相比，是历史现实上的小插曲。但不能就此现实置之不理，必须懂得，将会有可能出自此现实的非仅仅是领土上的，也包括军事上的威胁。这里能发生严重的冲突。例如，朝鲜半岛、朝鲜，这我们将不去监督。但其发生的冲突后果将会影响我们。所有问题都将取决于维持国家安全的多边机制的有效性。在此问题上还得懂得努力炒作和公共外交手段的区别，以及为解决问题的现实可能性和现有渠道和行动之间的区别。

我认为，建立像旨在任何情况下迫使参与工作的专家进行会晤，考虑这些问题，对存在的问题予以关注的所谓“工作网”（network）这样的机构，及其重要。去年举行首次国防部长级会晤，是一件重大事件。我认为，不能在这些进程中当旁观者。俄罗斯在经济上想在亚洲占居领先地位还远着呢。但作为政治上的平衡器，作为具有重大外交实力的大国，对我们还是有需求的。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以较小的资源代价和

投资不大的手段维护和推进自己的立场。这不一定得是自己的构想，如现在正在进行辩论的巴厘协议-2。我们应当在现有进程中表示自己的立场。

如果是说“软力量”，是说塑造俄罗斯的正面形象，我也理解，为在此项工作上争取效果要耗资多少的问题。但目前，我们没有这笔钱。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朝鲜和蒙古部主任亚历山大·沃龙佐夫：远东地区的问题，在于那里有一种似乎中央对他们执行殖民政策的感觉。我们看到的是对此区域自然资源执行的是剥削的政策：所有盈利归莫斯科，当地除了得到被污染的环境外，一无所有。就拿在萨哈林科尔萨科夫市建造的液化天然气厂来说，据说是该厂安装了新技术。但生活在当地的居民却又另有感受——工厂用的陈旧技术设备。人们抱怨环境被污染。对同中央存在的这种不平等的伙伴关系，应当纠正。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始建造的净化设施，实际上，这是首次着手解决社会领域问题俄事例。不仅只是建造桥梁，而且开始建造净化系统。在此前，所有污水排入大洋。

有关移民。大家口口声声地说那里缺少人口。说必须改变现状，要组织一批移民前往该地。但此现状的主旨是：你先为当地的居民创建正常的生活条件，尔后，我们再来谈扩大人口的问题。

过去一年，是美-中两国广泛领域中的冲突加深的一年。美国强化了对中国的遏制，包括借助周边地区，在中国边防附近建立军事机构。朝鲜问题为进行军事演习创建了良好条件。出现的似乎两朝在不久将来能统一的梦幻，被华盛顿用于旨在对中国施加压力，使北朝鲜摆脱中国的怀抱北朝鲜国内的制度本身极其稳定，但这种压力能导致朝鲜半岛上按最糟的剧情产生的冲突局面出现，从而为我们造成复杂局面。从对我们国家的利益来说，是保留朝鲜半岛的地位。有必要强化与中国的联合努力，采取政治和外交步骤，提出旨在将冲突转为和平渠道，转为谈判进程的新倡议。

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大学）东盟中心主任 维克托·苏姆斯基：我想就上述涉及的某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大家似乎都同意，在亚洲方向上，我们无须与某种特殊的，伪全球的角色来相衡量，应当谦虚一点，得将意向和可能性来相比量。与此现象是没什么可争论的，但也有难以争辩的问题：东亚本身——当今世界最全球化的地

区之一。在自己的亚洲政策中摒弃全球性量度，只因为将其同出自自己的全球性视角看法而确定相互关系的做法，将注定自己的失败。我们在亚洲，就像在整个世界上一样，需要同时为现实性的和全球性的政策。

至于是否有对俄罗斯来自东亚的威胁，那么，像当年苏美对峙和莫斯科同北京发生分歧的那种军事性的挑战，现在当然不存在（尽管我还是劝大家不要忘记美国反导防御系统东亚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随着东亚总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冲突潜力也在增长。近年来，在寻找地区合作与安全构架上显示的顽强性，是针对这种潜力做出的回应。其中，首先是针对美-中为主宰全球和地区进行的角逐日趋加强的征状。那么，我们是否值得作为盟友介入纠纷的任何一方呢？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霸权，就像所说的，非我们的课题。我们介入这些纠纷，不会有渔翁得利的结果。反之，将蒙受巨大损失。如果美-中两国在澄清关系的进程中，东亚丧失其保证经济增长最低限度的政治平衡，那么，它也将不会在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事业上为俄罗斯的伙伴。

实质上，这里所谈的是形成能促使削弱两极化和冲突趋向，能鼓励进行合作和提高地区继续进行社会-经济和平转型机会的积极地和独立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我想，我们得在区域政治空间安排和占居类似前历史阶段上为不结盟运动占有的缺口。在这个缺口中，我们周边还出现许多抵抗对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同一选择，并绝不希望两者之间发生破坏性对峙的，特别是东盟这样的玩家。类似这样的政策，将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全球性。

关键词：亚太地区、东盟、亚太经合组织、欧-亚会议、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俄罗斯远东、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俄罗斯东方政策。

辩论

未来的概念和战争

阿尔缅·奥加涅祥，“国际生活”杂志主编，俄罗斯外长顾问：遗憾的是，新千年没有给人类带来和平。在全球的议事日程中除了现代的挑战外，仍然是安全问题、冲突的调解、防止新战争。认识到课题的重要性，“国际生活”编辑部和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大学）建议聚集专家和分析家们讨论今天世界上制订怎样的军事概念在未来的军事冲突中可能使用怎样的武器。

尽管政治家们、军人们、专家们热中于此问题，给人的印象是军事概念和军事挑战的课题还未彻底领会。工艺的发展将怎样影响军事理论和概念性质呢？

我想您们会同意，我们处于洪流的中间，还未彻底认识武器种类及其使用的很重要的质量变化。不久前俄罗斯和美国军人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一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对伊朗核设施的网络攻击。许多人说现代战争将主要在宇宙和因特网中进行。我们不能低估这些事实。

科学技术进步和军备竞赛：XXI世纪的新质量-这是第一个讲话的题目。

格里戈里·波沃洛茨基，“国际生活”杂志观察家：按斯德哥尔摩世界问题国际研究所资料，2010年世界上的军事开支比2009年增加了1, 3%，为1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专家认为财政危机阻碍了某些新武器的发展，因为减少了美国对军事研究工作和科研试验工作的投资，缩小了一系列军事研究计划。

今天美国军费仍居首位（占世界的43%），此后是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去年的军事开支份额为3, 6%）、日本、后面是沙特阿拉伯、德国、印度和意大利。经济因素如果说不是限制，至少是对军事技术的发展很不够。

现代军事研究工作和科研试验工作的特点是什么呢？这是与完善武器系统两个方向有关的军事技术工作的新质量：第一，大大扩大现有武器种类的战术行动可能性，使之得到新的军事性能。第二是创建原则上新的，包括非传统的军事技术种类。

远程高度准确武器、超敏感传递器和自动控制系统的出现大大提高常规武器的命中能力，其影响水平已可以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相比。

民用科学和两用产品生产纳入军事研究具有巨大的危险性。这意味着吸引更多的物质生产用于军事目的。反对人类军事化的呼声正是来自这里。如果技术发明、发现、工业革命能扩大而不是缩小文明选择的范围，那么，无控制的军事技术进步不仅隐藏着对某个潜在的敌人的，而是对全人类的威胁

是否需要限制军事研究工作和科研试验工作呢？看来暂时谁都不能这样提出问题

新型战争的开辟者（依靠现代军事科学发明）被认为是两个美国人-戴维德 伦菲尔德和约翰 阿库伊拉，«RAND Corporation»的两个工作者，他们在2000年出版了名为“群体和未来战争原则”。正是那时候了现了“网络战争”、“网络中心行动”、“网络中心打击-侦察伞”、“军事平台”和“战斗集群”等军事专有名词。正是这些思想导致了无人驾驶的打击-侦察的飞机和直升机、战地军事机器人、轨道炮-利用强电射击600多公里之外目标的武器、速度高于10米的超声波火箭、最新的军事技术电子信息工艺、军事和侦察宇宙飞行器等等，包括影响人的思维和行动的武器。

美国在军事科学研究方面已经在军事竞赛中超过了全世界“一环”。可是美国打算在军事科学研究方面超过全人类“整整二环”，以便长期处于无法追赶的超级军事大国。它可能希望以军事力量的分配来补偿其经济、政治、财政等方面非领先的地位。

美国军事研究中心数量没有减少。只减少了为美国武装力量成批生产产品的工厂。它们结合为强大的工业群体。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过去和现在都从事军事技术研究。而且，最近几年美国利用苏联的经验，建立国家的研究所，美国武装力量已建立的世界闻名的分析机构«RAND Corporation»不仅从事科学报告的编写。此外，美国还有诸如“杰克逊社会”和“马杰斯季克-12”的完全秘密的研究组，它们已经数十年从事制造美国武器的最秘密的计划。

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都谴责了战争，渴望永久的和平并且制造订了世界和平的不同计划。它们的共同观点是：战争是邪恶，人类必须战胜它，否则人类就没有活下去的道路。

格里戈里·季申科，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科长：到1960年代中期大量军事方面工艺流入了民用部门。现在相反地民用工艺成了军事方面进步的发动机。例如，在美国有命令，按照它，在军事系统中不能进行科研试验设计工作，如果在民用部门中有它们。

值得指出，今天民用部门的研究工作超前军事部门5-7年。我国和外国对大型新系统的研究过程约为12-15年。然而在这段时期它早就过时了。

美国武装系的使用不止一个年，例如，按官方资料，B-52将飞到2040年。美国改进B-52和其他飞机，节省资金。现在武装力量结构由面临的任务和武装力量得到的资金确定。2012-2016年的美国预算决定省钱，不发展武装力量，不制造新武器。

A.奥加涅祥：俄罗斯应该依靠军事还是民事专家来发展军事工艺？

Г.季申科：我觉得，如果实际看待提出的任务和以最少和经费来加以实现，首先应该依靠民用部门。国防部应该搞好民用工艺转为军用。

维克托尔·米津，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学院（大学）国际研究所副所长：略谈两用工艺。完全具体的形势是：INTEGRITY行动系统管理美国的军用F-22和民用A-380飞机。这意味着如果某种零件仅用于军事系统，对它的监督将比两用的零件严格得多。如果系统可以民用，那么，工艺将很容易落到恐怖组织手里。它们在发展高工艺武器方面将会有相当快的和质量上的飞跃。因此，监督问题还未能解决。

制造类似的管理飞机的行动系统是很复杂的进程，需要15-20年的时间。我不认为将会在俄罗斯商业市场上有人要上这种系统。不必隐瞒，俄罗斯的主要设计院至今利用外国的软件保障，没有努力发展和研制自己的。或者把这些发明留在设计所作为自己的财产。

A.奥加涅祥：我想返回辩论开始时我提出的关于新的武器影响军事概念和相反的问题。

K.西夫科夫，地理政治问题学院第一副院长：这里可以谈到相互的影响。一方面，出现新的武器系统促使武装斗争的方法和种类发展。而大大提高搜集信息可能性，采取决定速度，把信息传给军队和武装力量的信息系统的出现摧毁这些新系统。所有这一切造成了质量上新的信息斗争领域。它在现代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可是，也出现了进行斗争的新可能性。

另一方面，武装斗争新方法的出现对武装的系统提出新的要求。这些新的要求在10-15年内进行的新创造中得到体现。对武装斗争性质的准确预测是关键。因此在研制武器系统时科学活动、科学预测问题十分重要。

武装力量进入战争时往往使用不符合战争性质的武器。例如，美国歼击机F-14是很好的飞机，可是它对美国海军力在局部战争中的任务却完全不适用。这种飞机用于完成具体的任务：阻击苏联海军的带火箭飞机。但在完成伊拉克和其他冲突中任务时它的效率不比F-18高。

A.奥加涅祥:问题在于对军事改革者提出什么重点任务？我想特别提出主要的三点。毫无疑问-机动性。例如，德国军事改革首先针对着它。

第二是节省有生力量。在直接接触时本身有生力量的损失总会有政治上相反的效果。

第三是节省资金。

我想继续这个话题，谈谈网络中心战争概念，有些国家在美国首次宣传它之后没有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标效仿。您们认为俄罗斯是否应该走这条路或者这对俄罗斯不适宜？

K.西夫科夫:当然适宜。问题在于怎样利用网络中心战争。

它很容易受到信息资源影响。例如，利比亚。美国相当高效地保障了对有射线系统的火箭系统综合体的命中。可是出现了命中防空部队的问题，因为后者没有无线电雷达的导射。

到2007年总参谋部考虑了在信息方面全面自我保障的所谓自动系统问题，消灭众多的这种系统成问题。在存在网络中心战争的等级系统时就可以保障对这些系统的消灭。个别的黑客都可以使这些系统瓦解，更不用说专门的影响。因此，如果讨论这种概念在什么程度和按什么方式可以在俄罗斯采用时，必须确定我们将用什么方法来完成我国保障到2030年，或更好地保障到2040年对可能的军事威胁的防御任务。

B.米津:十分明显出现又一种趋势-控制信息空间。

K.西夫科夫:是，这是今天的关键问题。可是怎样理解“控制信息空间”这个词呢？在何种水平上呢？

如果说在战略水平上的控制，那并非意味着战术上的控制。因为战术水平的数据完全不同。我们可以保障战术水平的控制，而抛弃了战略水平的控制。这不是说我们输了，一切取决于我们进行的战争的性质。

H.季姆列维奇，国立莫斯科鲍曼技术大学“安全“地区教学-科学中心媒体计划顾问：美国宣布网络空间和海陆空为军事行动区。为了认识到俄罗斯能在网络空间采取哪些进攻或防御行动，必须有现在俄罗斯联邦还没有的法律保障和协调管理机关。例如，美国有网络安全部。法国、德国、中国也有类似机关。因此，我认为在军事概念的重点要求名单中应该加上美国所说的“进行信息行动的无间断性”。如果我们从2000年看起-有阿富汗、伊拉克、大中东。现在我们看到叙利亚和北非国家事态的发展。我们还记得对布舍尔（伊朗）的网络攻击，此后美国、法国，特别是德国在伊朗总统选举时利用网络进行了出色的军事行动。美国人认为无间断的信息战争可以得到具体的最终成果

Г.季申科:我想对可展望的未来军事力量和军事概念谈谈一些看法。现在不仅我国,而且全世界的军事科学都处于某种危机状态。过去年代曾侈谈所谓军事方面的新革命。但革命没有出现。军事方面的革命是什么呢?首行是作战组织方式的革命。如果我们看看网络战争和空中、宇宙行动,那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在技术水平上采用过的旧的概念。只不过贴上了新牌子而已,在过去已知的基础上加以扩大,现在成了所谓“网络中心战争”。

如果谈到军事方面的革命,曾等待的是科研试验设计工作方面的某种突破,在发动机、传递器方面的突破成就。可是今天技术性能的改善只有10-12%。还谈不上军事科学方面的突破进展。

Н.乌瓦罗夫,俄罗斯审计局副局长,中将:一切都围绕着网络空间转。在网络中心战争中主要和优先的原则是美国人所说的“全面了解”。美国军事建设的所有计划实际上都渗透这个原则,包括2012年的预算。在军队、空军和海军、海军陆战队-到处都在大量试验从战术环节(即连和营的)到战略性的不同水平的«Global Hawk» и «Predator»型无人驾驶飞机。

这里谈到了建立网络安全部的必要性。俄罗斯武装力量中已有在联合战略司令部下属的网络指挥部或网络空间军事行动指挥部。它从事进攻行动,而不仅是保护自己。这是战略指挥部。

所有人都理解,“网络这东西”容易损毁。正因为这样,几天前北约代表说:我们到了必须建立后备系统的时刻,以便在一旦所有电子系统被摧毁时使用它。以后怎么办?只得重新采用传统的、通常的军队管理办法。

我对主要讲话有几点意见。财政危机实际影响了军事技术进步。不久前五角大楼首脑罗伯特·盖茨发表了纲领性讲话。他声明:美国能为榴弹炮支付二千万美元,为轰炸机支付20亿美元,为可控火箭武器支付60亿美元的时候终于到来了。需要省钱。

这不是说美国放弃军备竞赛。它转向完善另一个平面。科学工作在继续,但放弃成批生产,把它们“放到架子上”。这里没有任何新东西。军人们记得在约·福特时研制了B-1(克服我们的防空系统的轰炸机),但另一个约·卡特政府来了。两种飞机虽然经过了试验,被“放到架子上”。新政府P.里根来了,飞机恢复了生产,轰炸机成功使用。科研工作积累长期的资源,这是平常的做法。

曾经有过军事技术超前民用工艺的时期,但这个时期即将结束。

评述网络中心主义，可以列举如下例子：1970年代美国最高统帅和前沿地区的营长联系需要15分钟时间，尽管有强大的通讯系统。1990-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这种时间减少到了三分钟。现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依靠IP电话在一秒钟内可以和任何排长联系。

И.季莫费耶夫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大学）国际研究所分析监督中心主任：我讲话的题目-现代军事冲突和危机和今天什么战争导致国家发展。

我想，开始辩论的主要论点是：确定武装力量发展、工艺变化、工艺政策的因素中包括利用这些工艺的武装冲突类型。现代战争、武装冲突比过去的冲突复杂得多。相应地，冷战时期可以顺利使用的工艺在今天的局部冲突中无效，因为它们有完全不同的规律。因此我想弄清现代的三种（三类）冲突（自然，任何分类都是假设的）并谈谈每一种对大国和冲突的直接参加者的工艺政策的影响。

看来，属于第一批的是今天移谈的国家危机引起的局部冲突。相应地，这里的冲突通常始于内战。这里指的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冲突是社会经济问题激化，民族冲突的结果。当某些外来国力量加以干涉的时候，它们就有国际的意义。而这种干涉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干涉公民或内部事务旨在增加自己对该国的影响或者破坏竞争者和影响。这里2008年格鲁吉亚局势是鲜明例子。冲突由于格鲁吉亚恢复国家时就存在的地区的民族问题引发。逐渐地冲突局势和内部的潜力受到外来势力的挑拨。最后以快速，但相当严重的冲突结束，激化了大国之间的关系。我们记得，可以说是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和俄罗斯军舰首次接近于动用武器的距离。事态发展的预测性，说得轻一些，不大。

第二种的干涉性质是试图控制世界政治的所谓“灰色地区”。指的是出现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达成协议的民族力量所控制的领土。这个领土成为恐怖或国际犯罪集团的避难所。阿富汗是最鲜明的例子。我们不知道控制阿富汗“灰色”领土的企图如何结束。美国人乐观，我们的专家们却悲观。索马里也是控制这种地区不成功的例子。“灰色地区”和控制它的企图早已有之。我们不知道利比亚的类似局势会导向何方。变利比亚为“灰色地区”将会有不良的后果。

略谈工艺方面。在类似的冲突中，由于力量的不对称，首先将是试验某种工艺。这里有可以试验新方式的现代战斗，新武器和军事技术的比较适宜的条件。在阿富汗有许多例子；利用无人飞机不仅进行侦察，而且进行打击。不久之前美国开始利用气球观察地区情况。这是一种试验场。

但这里值得提到它的反面。要知道在类似的冲突中不仅那些干部涉他们的国家试验新工艺，对方也试验新工艺。“非对称的冲突”这个名词也反映工艺改变的双重性质。是的，发达的国家试验新工艺。可是那些在“灰色地区”的力量也会适应它们。那是另外的反抗行动的组织，和居民做工作，对地方政权采取恐怖行动等等。我们系统地监察阿富汗的局势，利用得到的来源。发现了自从去年B.奥巴马宣布新政策-加强对反对力量的斗争以来的趋势。盟军的团结努力的加强却没有影响塔利班行动的数量和频率，也没有影响盟军的损失。塔利班俘虏的统计数字有些变化：更多人投降和投向政府。只是不知道对他们怎么办，以后他们到何处去。

这里也表现在工艺的对比上，它自然不是直线的，盟军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发展新工艺，完善装甲技术和整套新技术，从加强装甲到火灾时分开军事综合体的技术。投入的资金巨大。塔利班作出什么反应呢？在公路上埋放遥控的六英寸地雷。更简单的是利用敢死者带着爆炸物进入基地（这较少）或者在靠近设施和车队时引爆。六英寸地雷不可能和坦克的炮弹、新的合金、材料、监督设备相比，但效果却相同。令人注意的是对阿富汗居民点遥控袭击导致的伤亡惨重。我们根据公开的来源许计算了这些损失。塔利班行动造成的损失比盟军误炸造成的损失多八倍，但地方居民对盟军打击造成的损失的反应却强烈得多。

地区水平国家之间也发生第二类冲突。由于技术状况不能研制多种武器，它们不得不向一些国家购买。而这些国家就有可能试验新工艺，如果不是在公开的冲突中，至少可以在教习使用的实践中。

第三种冲突是世界中心力量的冲突。首先由于和这些国家有核武器，存在核威胁，类似冲突的可能性很小。这里我们还未讨论过，但新的工艺有可能缩小核因素的影响。如果能够得到这些工艺，力量平衡，总的军事计划和军事建设的预测都难得多。最近时期能否建立这样的工艺和反导弹防御系统呢？

K.西夫科夫: XXI世纪的战争和军事冲突结构没有改变。形态却有了很大改变。

预备时期大大增大了。如果过去（XX世纪初期和中期）的准备时期通常为数月或数年，现在为了在道德-心理上准备某种战争需要很多的时间。军人的道义-心理、思想政治和信息因素大大增加了。没有它们战争不可能胜利。最后的战争-阿富汗战争、继续着的伊拉克战争、2008年的格鲁吉亚冲突、利比亚战争表明了军人的精神道德状况的重要性。而

且，武器较差而斗志较高的军队可以取胜，尽管对方有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

和以前的战争相比，特别行动的作用也大大增大了。在很多情况下，特别行动是武装斗争的唯一形式，这里指的是紧张程度低的冲突。无接触战争、机器人战争的思想已被埋葬。

A.奥尔洛夫，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我想谈谈战争准备。您说以前战争的准备是几个月，而现在为数年，但最近的战争往往是突发的。您提到了阿富汗。九月11日后，对阿富汗土地的轰炸已在月底开始，实际是是纽约事件几星期之后。西方的确系统地预先准备了伊拉克的战争：它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向所有人展示了内部有某种物质的试管。还有在伊拉克公路上开着的拖车的照片。说是移动的实验室。所有这一切旨在使世界社会相信伊拉克政权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且时刻在完善它们。美国国务卿在联合国安理会令人信服地证明（引用从来不犯错的美国权威机关的信息）在伊拉克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后来对此十分后悔。这已经是历史，但是令人费解的阴谋“伊拉克骗局”已成为某种经典的体裁。记得2008年在高加索的战争也是相当突然的，尽管地区的确有不断升级的紧急局势。至少是俄罗斯对此战争的准备非但没有几年，甚至不到几星期。俄罗斯对格鲁吉亚“鹰派”使睡着了的茨欣瓦利以及其他城市的数百，乃至数千平民处于被消灭边缘的闪电战作出反应的方式的决定是几小时内，甚至是几分钟内作出的。尽管格鲁吉亚大概在自己外洋的类似行动和情节的庇护者的精心指导与看管下，数年准备了这个战争。

K.西夫科夫：我谈谈趋势。趋势要求有分散的参数。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向来都有长期准备战争的侵略者和被迫很快作出回答的受害者。

至于阿富汗战争，我们记得此前的整个时期，进行了道德心理的准备，谈到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必要性。进行了经济准备，建立了集团军。

至于利比亚，那是在整个近东挑衅的例子。有人会对反对我的说法，但一切不会是偶然间，同时，按同一种情节发生的。

A.马诺伊洛，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高级科学工作者，数学-物理学副博士：今天许多观察叙利亚执政政权和以主要民众的名义行动的，组织良好的暴动集团的冲突的人士都提出问题：叙利亚局势是否会按利比亚的情节发展，使地区卷入内战的混乱和军事入侵？这种担心不是偶然的。

利比亚战争已表明在现代条件下不满意政权的软弱和散乱的集团的个别行动依靠西方国家直接干涉大型国际冲突能多么速度地起初变为武装冲突，然后变为内战。

与此同时，今日世界局势那么紧张，任何国际冲突都可能成为新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世界战争的目的是重画世界政治地图、历史形成的国家和民族边界。至于什么边界，并不重要。这里指的是“已过时的”前欧洲殖民地边界或新地理政治边界和在“世界文明”之间划定“自然生活空间”“界线”-这很容易划改。

另一方面，今天美国正是希望对世界的这种重新划分，它有意识地显示世界结构的雅尔达模式，声称必须重新审议前欧洲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碎块的“人为的无生命力的”国界的必要性，美国认为它们表明了自己的不能成为世界政治的独立主体。在这个进程中利比亚和卡扎菲只是进行新的世界划分的借口，而军事入侵是对那些忽视其意见者，包括前殖民地国家土著居民的最后手段。

“棕榈革命”浪潮扫除了与美国关系密切的突尼斯和埃及政权，但显然在叙利亚受阻：“颜色革命”情况总是如此，如果国家的领袖能在形成的局势中表现坚强。在乌孜别克斯坦的“颜色革命”也如此，当时政权宣布安集延武装集团的行动为武装叛乱并利用忠于政权的军队残酷镇压。现在利比亚的“颜色革命”也是这样。西方特工机关在两个地方都错过了机会：“颜色革命”的枪声已响，但没有得到立即的成果（和别的国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专门行动的力量总是退入阴影，掩饰自己对政治事件的参与（因为迟缓的每一天行都大大增加暴露行动秘密的风险），把位置让给以迫和神话作掩饰进行直接侵略的部队。因此叙利亚局势按利比亚情节发展的可能性不仅很大，而且不可避免。当然，条件是美国不放弃涉及这个国家的某些“改建”近东计划。

与此同时，叙利亚政权的倒台会有巨大的后果：叙利亚和埃及是阿拉伯东方的两极，随着阿萨德政权的下台地中海东部的整个联盟系统都将崩溃这符合美国的主要目的之一，它指望利用“棕榈革命”工艺把近东的北非卷入可控的混乱，从中建立更符合它的利益的国际关系，其中伊朗和中国都可能没有位置，而俄罗斯的影响将受到严格的局限。

Г.季申科:我想重新谈谈作为技术发展的最新方向的无人驾驶飞行器。但我可以说这里产生复杂问题。第一，无人飞行器控制的人才培养很昂贵。第二，从成本和效率观点看来怎样处理来自无人飞行器的信息也是问题。较容易派遣地面侦察破坏小组去完成任务，而且较省钱。

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军事大国，例如，俄罗斯和美国应该建立关系的理论基础。如果分析年初以来美国军事建设、民族安全方面的所有文件，就可以发现可怕的趋势。它主要依靠利用高度准确的武器进行第一打击，而不是用核武器。这原则上改变我们的关系。遗憾的是我们在战略理论上还没有研究，确定这方面的趋势，而美国又回避对它的讨论。

B.米津:核武器已是贫穷者的武器，而高度准确的武器大概只有两三个国家能制造。这方面俄罗斯的境况欠佳。

И.克拉姆尼克，“军事工业信使”报政治观察家:我的讲话题目是未来使用什么武器和怎样作战。

最近30-40年内，甚至50年内难望在战术和战场上使用的武器的性能方面有奇迹般的突破。可以说，战术-技术性能不是武器的主要质量。战术-技术性能的高峰是在1960-1970年代，当时进行了速度、射程和深入程度的竞赛，建造了最高速的飞机，最远程的火箭等等。与此同时现在可以看到新武器的一定的神化，特别是那些尚未存在，媒体已经渲染的武器。这首先涉及到气象武器、气候武器、构造武器甚至精神武器。这些武器还没有，但它们已成为恫吓的武器。甚至这种议论也能为主要使用信息武器的信息战场行动创造根据。在最近的战争中它将起一定的作用。

如果谈到大国之间的战争，特别是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今天实际上不可能。英国的俗语说得好：“住在玻璃屋里不值得扔石头”。今天实际上世界所有国家都在玻璃屋里。

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俄罗斯和北约欧洲国家的战争将成为使文明后退几百年的自杀行为。大国将继续相互竞争，参加第三国家的局部冲突，就像苏联和美国在冷战时期那样。

武器在技术上越来越复杂。例如，在空军中，每一代的飞机的研制时间都比前一代的长一、二倍，而价值也高几倍。现在美国人为F-22飞机支付将近2亿美元，而F-15在成批生产初期只值2千多万美元。军事研究工作的价值也上升数倍。再以美国作例子。现在“波音”、“洛克希德马丁”和“诺斯罗普格鲁门”三个公司从事美国航空技术的研制。它们吞噬了几十个其他设计院。俄罗斯也有这种进程。我们看到从事军事技术研究的设计院已大大减少。

怎样出现某种基本性的突破，谁也不知道。可是在这之前我们不得不用利用根源于1960-1970年代的航空技术。可以确信，一旦出现可能的冲突，我们将看到F-18, F-15飞机的轰击。

A.奥加涅祥:另一个话题-未来的军事冲突。

K.西夫科夫:在远东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局部战争,包括西方国家参加的战争。

中亚地区的可能的军事冲突有可能使俄罗斯卷入,因为需要保护自己盟友。不稳定区在亚态地区,例如,柬埔寨和泰国。

所有这些冲突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建立新世界秩序的全球矛盾有关,这种新世界秩序通常依靠战争建立。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例证。现在新世界秩序在成熟,因而局部的冲突可能演变为地区的大型冲突。还存在最近发生内部冲突导致俄罗斯严重不稳定的可能性。

A.齐加诺克,政治和军事分析研究所军事预测中心领导人:如果谈到军事冲突的原因,最近三至五年内可能发生争夺水的冲突。由于涉及到中亚的局势,俄罗斯不可避免地卷入。在高加索、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也完全可能发生冲突。如果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用军事方法解决此问题,俄罗斯处境将相当艰难。我们和阿塞拜疆关系良好,没有任何冲突,但在亚美尼亚驻有俄罗斯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怎么办呢?第三个可能的冲突在远东。我不认为伊朗会袭击巴基斯坦、欧洲或美国。军事行动可能会针对沙特阿拉伯。

A.帕杰林,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军事历史科学研究所高级科学工作者,退役上校:2010年二月5日公布了俄罗斯军事理论。这次它显得较为具体,没有过多的一般词句。表现了强硬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有警告语调。

第一,能感到对现代和将来可能的冲突的性质的理解:确定完善反导弹防御和反宇宙防御系统的必要性,指出低估信息战争的危险性,有限的地区冲突及其长期的性质。

第二,对俄罗斯军事建设方面应做的工作有明确的认识:武装力量数量的适宜化、提高他们的战斗准备(机动性)和军事训练质量,应有的社会保障和军队的改装,向贪污现象作斗争。

上述情况使有可能作出结论:俄罗斯联邦新的军事理论证明俄罗斯坚决致力于建立现代的和训练良好的,能应对XXI世纪挑战的军队。

与此同时,重要的是对现代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性质的迅速变化的应有考虑。不确定性对世界军事-政治和军事战略局势的发展、对紧张和冲突区的形成,对战争和武装冲突性质有很大的影响。应该指出:未来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将不是某一个,即便是很重要的因素引起的。引起它们的是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民族和宗教矛盾和原因的总和。在揭示未来武装斗争的战略内容时应该考虑到它们。

完善侦察系统对防御有决定性意义。系统应该有统一管理中心和保护良好的搜集与处理武装力量和特工机关的所有种类侦察信息中心。必须在极短的，接近实际需要的时间内把处理好的信息提交所有有关部门。这种侦察使有可能及时了解敌人袭击的准备并采取预防措施。

E.皮亚德舍娃，“国际生活”杂志负责秘书，历史学副博士：我坚信著名的真理“要想和平就要准备战争”，希望这里的重音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建立世界全面安全的多年的努力不会白费，相反地，体现在未来的和平理论上，而不是在未来战争的理论。上。达斯维达公司不会成为我们的现实。

看来我没有枉然提到“星球大战”演员的名字。记得几十年前美国声明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和与之相关的军事行动名为“星球大战”。

美国军事概念及其实际的体现迫使我们返回过去，评价自己曾有过的军事潜力并开始建立（改进）需要用于对付西方正在并将继续在欧洲部署的反导弹防御系统的自己的系统。

利斯本条约化为青烟，特别是在不久前美国和罗马尼亚议定了2015年部署美国的截击火箭SM-3之后。

俄罗斯方面发表了理由充分的声明：俄罗斯和西方应该签订有法律效力保障的文件，确定美国和北约的反导弹防御系统不瞄准俄罗斯的洲际导弹火箭。俄罗斯的立场十分简单：欧洲主要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应该得到平等的参加，对所有欧洲国家应有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安全。

最近几届美国政府相当积极扩大自己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在全世界建立链接的防御系统。因此我们的要求是合理和及时的。与此同时，出现了对任何签订的条约都需要讨论和通过的理解。

至于美国的参议院联想到最后的战略进攻武器条约通过的情况，很少人能对关于反导弹防御系统的，甚至是设想的条约的批准有乐观的预测。

正像我们的军人所指出的那样，2015年之后，当美国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大大改进，反导弹防御系统的军舰组达到40艘，并将近有400架截击火箭之后，对俄罗斯将是实际的威胁。

这就是我们要生活的最近的未来。

再说几句关于信息—通讯方面的现象，将来它不仅可以说是大规模警告的，而且是杀伤的武器，我指的是社会网络。

北非和近东国家的事件表明，当需要唤起大众干什么事的时候，通讯和因特网联系能多么高效地工作。昨天和今天依靠«Facebook»推翻了政府，明天可能开始挑动国家之间或集团之间的冲突。

一切都是工艺的事。

A.奥加涅祥:最后请“国际生活”杂志伙伴和我们辩论的共同组织者阿尔谢尼耶维奇·奥尔洛夫讲话。

A.奥尔洛夫:谢谢。未来中的武器直接联系到它的可能使用。在当代世界,这对西方的军队特别具有代表性,明确表明了最大限度地使军人远离所完成的军事任务,即命中目标的趋势。飞行员或者火箭发射者远离目标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只在自己的电子计算机显示器上指挥。在这后面是流血、死亡,往往是很容易被当作军事目标的无辜的人们,崩溃的民用设施,-他对此无动于衷。

这些人远离悲剧,在地面上出现的一切对于他们,实际上等于计算机上的战争游戏。完成任务后他们反回自己日常用的生活,喝热咖啡或饮酒,根本不会有内疚,甚至会认为自己是消灭了某种邪恶的英雄。而听从自己主子按预定程序行动,轻而易举地歪曲事实的媒体更使他得意。与此同时,他丧失了与野兽或未来的电子人不同的之处,即人性。每个正常的人都能理解的复杂的精神道德概念却从现代的无接触士兵的行为准则中消失,他成了聪明的机器的附属物。

正如预测的那样,类似的“遥控凶杀”系统随着技术上“先进”的武器的发展将只会更加完善。现代社会的重病的最可怕的症状是道德堕落。在军事方面的道德堕落特别明显。西方进行的无接触战争及其对许多国家和人民的后果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A.奥加涅祥:我们的讨论会接近尾声。我们涉及皮了与今天和未来军事概念、武器有关的广泛问题。大家表达了不同观点,有时往往是对立的观点,但这里值得指出,联合了我们的是对讨论的问题的兴趣和对问题的深刻,内行的知识。谢谢您们的有趣的辩论。

关键词:军事概念和未来中的战争,新武器,网络中心战争,“颜色革命”。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国际生活

窗 书



鲍里斯·皮亚德舍夫

特命全权大使，功勋外交工作者，历史学博士

pyadysheva@gmail.com



斯捷帕诺夫大使的阿尔卑斯山高峰

我的同行，驻瑞士大使А.И斯捷帕诺夫以其天才和精力在他的著作中描绘出了俄罗斯和瑞士两国多方联系的文学-政治全景。这里我们为之增加他在我们杂志“国际生活”中发表的关于瑞士的内容丰富的文章，构成了两国-苏联/俄罗斯和面积不大，在世界政治上起了明显作用的阿尔卑斯山国家相互关系问题的大图书馆。

不久前他的新的专题著作“俄罗斯大使的伯尔尼日记。1992-1999”问世（斯捷帕诺夫А.И.俄罗斯大使伯尔尼日记。1992-1999. М. 2011. 736页）。

我们相信这还不是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的创作的顶峰，但它是美丽的高峰。斯捷帕诺夫的其他创作高峰也与之聚合。不是每一个作者都要能达到这种创作高度，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拥有此潜力并善于利用。

“伯尔尼日记.....”是相当成功的作品。斯捷帕诺夫的回忆录和А.多勃雷宁、Г.科尔尼延科、Ю.克韦钦斯基、А.别斯梅尔特内赫等到我国外交家们的经典的回忆录并列。

在冲击书架的现代回忆录文学作品洪流中，有经验的读者看重的是基本于档案文件，从实际任务

的角度提出和分析了以前未研究的问题，而且描写生动，装潢美丽的书。А.И.斯捷帕诺夫的书就在其中。

“伯尔尼日记……”结束关于我国和瑞士联邦与公国关系史三部曲（斯捷帕诺夫 А.И. 俄罗斯第一任大使看陌生的列支敦士登。М. 2002，斯捷帕诺夫 А.И. 俄罗斯人和瑞士人。外交家笔记。М. 2006）。

这里作者采用了对于他新的问题时事记录体裁：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记录大使馆的生活和活动。这种体裁不仅使他能感觉到集体的脉搏，而且要求他抒发内心感情，叙述对困难的感触，所担心的问题

作者用广泛的档案文件展示了外交机关-它的中心机关，在伯尔尼的发展双方对话外交代表处的每日的辛勤工作。书中作者的评论和观察，他对事件和它们的参加者，包括自己的认真的，有时甚至是批判性的分析，生动的语言引人入胜。

俄罗斯外长С.В.拉夫罗夫给“伯尔尼日记”写的前言中指出：“书中描写了经过几十年冷战时代的相互猜忌和疏远后莫立俄罗斯和不大的，但相当重要的欧洲



国家-瑞士的新质量关系时期。正是那时候两国的努力奠定了使俄罗斯-瑞士达到今天的成熟伙伴关系水平的积极进程。2009年九月俄罗斯联邦总统Д.А.梅德韦杰夫在历史上首次对瑞士访问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两国各方面合作的远大前途”（5-6页）。

如果我说外交家和研究家斯捷帕诺夫是在需要的时间在需要的地方，不会错。他的知识、充沛的精力促使了我们两国关系历史的转折，两国友好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作者不仅是见证者，而且是那个时代转折事件的参加者。

大使А.И.斯捷帕诺夫在新书中阐述了自己对俄罗斯国外的外交

代表处工作的现代概念，也可以说是哲学的观点，他细致地分析了这种工作的战术手段、方式方法，叙述了筹备的举行外长级的、政府首脑、俄罗斯总统的访问和谈判的经验、信息活动、和同胞们的会晤。他对大使馆集体、俄罗斯侨民的关切也很有趣。“伯尔尼日记”是在考虑XX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和全世界形成的质量上不同的局势情况下重新领会对于外交活动的经典评估的尝试。首要的任务在于把国家深刻的民主化，根本的市场改革纳入其活动的基础，卷入“经济外交”。许多问题的解决都不容易，需要加倍的明智的努力，提高所有工作的效率。

许多读者对“日记”中相当注意驻外国代表处活动的艺术方面可能感到意外。按大使馆的建议，圣彼得堡的Г.А.托夫斯托诺戈夫大话剧院、瓦哈坦戈沃、鄂木斯克国立合唱团、“新星”创作团体等在伯尔尼进行了演出。外交家的回忆录中记录诸如“索特比斯”和“克里斯季”的古董物品国际拍卖的并不多。而本书对这方面的描述却用了很大的篇幅。有趣的是大使自己多年没有放下拍摄机。出版的书中插图大都是他自己的作品。

贯穿全书的思想：驻外国集体的主要工作成果取决于每个工作者的积极性、集体的团结，一丝不苟地完成所提出的任务的努力。这就是作者认为需要有专门介绍集体的图片的一章的原因。它的第一行写着：“我的亲密的人们、朋友们和同志们。正是因为他们，我的生活、工作和创作都愉快”。仅在这一章就至少可以看到事件的一百个参加者，而整个书中他们有多少！

读者在许多地方可以找到反映作者关于应该怎样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外交机关，提高它的效率与威信的思考和建议。而且这是依据他多年在外交部中央机关(3 ЕД, УПВМ-УОП, ГУКУЗ)，一些国外代表处（民主德国、奥地利、瑞士）的工作中，还有在科学-教学（外交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莫斯科大学等高等学校）活动中所积累的丰富实际经验。如果汇集作者的意见，可以得到从实际观点看来对现在和未来的外交工作者有益的教导。出人意外地可以看到作者对某些错误行动、过于仓促做出的决定的承认。他列举了具体情况。承认对下属要求不够严格。自然，不是一切都取决于大使。他不止一次声明：“什么样的社会，

就有什么样的大使馆人才保障”。瑞士和俄罗斯的同行人、科学家们，同胞们都高度评价A.И.斯捷帕诺夫。A.И.斯捷帕诺夫多年和瑞士外长弗拉维奥·科季及其亲密的工作者Ф.芬事务合作。大使在离开前几天收到了Ф.科季的亲笔信：“感谢您作为俄罗斯驻伯尔尼代表在各方面的杰出活动。您为俄罗斯和瑞士的美好关系做了很多工作”。

同胞们也给了他类似的评价。例如，2007年七月12日男爵冯·法尔茨-费因给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写道：“……我完全明白，我再不会有像你这样既是大使又是朋友的人。我们在瑞士，在列支敦士登搞了多少活动！我紧紧拥抱你。你的老人埃德华”。

在A.И.斯捷帕诺夫的每一部书中都可以看到对大自然的鲜艳的描写，他对活的世界，四脚朋友的喜爱。他在积累写“外交与大自然”的书的材料，希望这些在将来有用场。他从几千张在伯尔尼拍的照片中为新书挑选了不多-只有关于伯尔尼的，与之相接的埃尔费纳乌公园和蓝-绿色的阿勒河河水的照片。真是人和大自然交融在一起。少有能像在这里得到这样深刻的感受的地方。每一套插图之前有

细腻的描写，而每一张图下面写的不仅“这是谁”，而是有深意的句子。在书的封面背后有四种语言的书名，内容还有德语译文。

在总结1990年代于伯尔尼的工作时，作者写道：它像在陌生的道路上，天气阴沉，甚至有落石的条件下攀登阿尔卑斯山。但是浓雾逐渐消散，阳光已照耀山路，前景明朗。外交家问：我们达到了阿尔卑斯山顶峰么？回答是：自然，没有。在那种条件下是力所不及。但大使馆为后来者的继续攀登创造了可靠的前提。征服所有外交高峰的行动永远不会停止。我们的活动，整个生活的意义是否就在这里？当然，作者说，这是他自己将近五十年从事的事业的个人感受（690-691页）。

书中充满了乐观主义，对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的解决，它在国际上地位的巩固的信心。

可喜的是，A.斯捷帕诺夫大使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了俄罗斯驻伯尔尼大使馆和我们的杂志“国际生活”的合作。这种合作有特别的天赋是因为杂志编辑部一直设在莫斯科德国斯洛博达中心，从沙皇伊万国格罗茨内以来，特别是在彼得大帝时期，瑞士的师傅和实业人士们来这里聚居。

在A.斯捷帕诺夫大使的努力之下出版了关于我们两国-俄罗斯和瑞士合作的专门的一期。出版很成功。以两国外长的文章开头。还有科学、艺术、实业活动家的内容充实的文章。

俄罗斯驻伯尔尼大使馆为此举行了活动，参加的有瑞士各方面的实业人士。“国际生活”杂志总编致了欢迎辞，瑞士客人们致答辞时表示主张

发展俄罗斯和瑞士的合作。我要指出的是，东道主A.И.斯捷帕诺夫对会晤十分满意并点燃了新的思想，它们在列支敦士登公国得到广泛实施。具体的成果是在“国际生活”公布了列支敦士登移交的关于布尔什维克枪杀沙皇家庭的文件。

关键词：“俄罗斯大使伯尔尼日记”，列支敦士登。

根纳季·加季洛夫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gatilov@mid.ru



对异常巨著的思索

我无意隐瞒早在列里赫国际中心出版《自莫洛托夫到拉夫罗夫。尤利·沃龙佐夫未写下的回忆》（卡拉佩强 Г.，格拉乔夫-谢利赫 В.《自莫洛托夫到拉夫罗夫。尤利·沃龙佐夫未写下的回忆》M.: МУР, Мастер-Банк, 2011. 864 页）一书前，就知道对此书手稿在进行整理工作。合著者之一——弗拉基米尔·格拉乔夫-谢利赫是我的老同事和同志。因此，我是最先阅读这部巨著的人之一，也就不足为奇。当然，我对其中产生似乎是表面的问题寻找答案的进程中，自然而然地，从体裁上来说，形成了适合于书评尝试的独特短文。

为什么是“未写下的回忆”？

众所周知：尤利·米哈伊洛维奇在同国内外记者的交往上，任何时期总是非常开放。许多人劝他开始写回忆录。为了让他能独立写回忆，送给他的微型录音器数不胜数。此外，他的一个好朋友，著名电影导演、摄影师和文学家尤里·尼古拉耶维奇·阿尔多辛甚至还让尤利·米哈伊洛维奇单独与打开的录像机面对面的留下来，但还是不起作用。

尽管是这样，最终还是让记者Г.卡拉佩强渐渐地使他畅谈了起来。卡拉佩强赶在沃龙佐夫去世前不久，将准备的“自莫洛托夫到拉夫

罗夫”一书的初稿拿来给他过目。随着时间的流逝，此书页增加了三倍——作为合著人的B.格拉乔夫-谢利赫参与了此项工作，他对家庭档案资料进行了整理，挑选了上百张照片和为人鲜知的录像，并为阅读进行了译解和编辑

依我看，此“多层楼”构建，最终溶合为尤利·米哈伊洛维奇的文学陈述。因此，在阅读过程中，伴随我的是沃龙佐夫生动的“家言”、常用句，甚至他的手势和脸部表情的感觉。

为什么是对话，不是独白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这位知识分子和职业家的尤利·米哈伊洛维奇有一个了解。无论他任职多高，无论在对自己的同事，还是对技术员，均持有民主风格的特点。这一点，我可以根据由他在我国常驻纽约联合国机构为领导人的年数来断定。

肯定是这个原因，书中才会有那么多的采访。尤利·米哈伊洛维奇的主要交谈者承认，沃龙佐夫没有（！）一次以外交手腕回避过任何尖锐问题。还有一个主观上的观察。诸多的章节，凭我的感觉，形成一种互动性：问和答，随后又有以针对性的，选自不同来源的片段和引语来加以充实，其中有生前证书、评论。这种汇集，使这本书具



有极大的吸引力。易对我国外交史有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

为什么是两人合著？

下面——谁是谁？

Г.卡拉佩强生于1953年。在埃里温铝厂工作时，首次在地方“青年报”上刊登了自己的一些短文。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苏联体育报”、“劳动报”、“星期”周刊、“消息报”、“新消息报”、“俄罗斯信使报”兢兢业业地从事了25年自己的专业工作。B.B.格拉乔夫-谢利赫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并有20年献身于外交工作。他曾在纽约、华盛顿和德里工作过。自1993年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曾为秘书长

办公室高级顾问。现任日内瓦联合国分机构干事。

合著人是在尤利·米哈伊洛维奇逝世后相识的。自此，他们开始从事写作。三年内，他们只在当B.B.格拉乔夫-谢利赫屈指可数的出差莫斯科的机会和休假时见面。他早上忙工作，下午从事尤利·米哈伊洛维奇的档案资料与和Г.А.卡拉佩强交往。为了理解他们之间进行的是何种创作上的辩论，就得阅读他们的网络邮件。尽管是虚拟的争论，但他们成了朋友，大家会同意，这具有一定的价值。

两年前，由俄罗斯外交家协会和俄-美业务合作理事会出版的“外交家尤利·沃龙佐夫”回忆录和文献选集的首发式上，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别斯特梅内指出：“书中有一系列就连职业家都未曾知道的鲜明夺目的瞬间和发现，其中也有我不知道的，但牵涉到我们从事工作的外交行动事件”。

毫无疑问，在阅读这部巨著时，对首次公开沃龙佐夫的录像和各种非官方性材料数量，令我惊讶。我注意到尤利·米哈伊洛维奇在一些地方如何友好和客观地反

映其交谈者过余的主观和攻击。此外，沃龙佐夫的风格特性贯穿了手稿的所有人格化的章节。

首篇书评是有尤利·米哈伊洛维奇截至去世前领导的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大学）毕业生协会准备的。但是，在懂得当今现实的情况下，这本不愧被称为“独树一帜”的书没有友好的人协助是不可能问世的。

不能不感谢担负了将庞大录像资料数字化工作的国际信息化学院主席А.Г.哈里顿。

为本书的出版做出不可估价的贡献，是俄罗斯外交部老干部理事会主席，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B.卡济米罗夫，俄罗斯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А.卡达金，列里赫国际中心和Мастер-Банк董事长B.布洛奇尼金...当然，以上所列的只是一部分人，但请相信，众多的人，在需要的时间示范了对自己同志忠诚的良好素质，对尤利·米哈伊洛维奇·沃龙佐夫的崇敬和爱戴。

关键词：“从莫洛托夫到拉夫罗夫。尤利·沃龙佐夫未写下的回忆”、列里赫国际中心、B.格拉乔夫-谢利赫、Г.卡拉佩强。

安德烈·杜比纳

“国际生活”杂志编辑

dubina@gmail.com



塞浦路斯外交家的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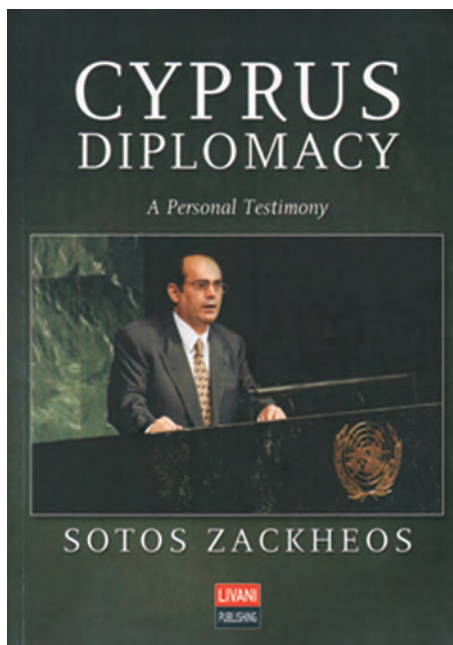
在斯托斯·扎克奥斯这部书的平淡无奇的名称“塞浦路斯外交。私人的证据”(Sotos Zackheos. «Cyprus diplomacy. A personal testimony», Athens: Livany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2011. 235 p.)下面隐藏着塞浦路斯争取国家统一的外交斗争的曲折故事。作者走过了33年外交生涯的道路,积累了在莫斯科、北京、华盛顿等关键大使馆、塞浦路斯在日内瓦和纽约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的经验。最后作为塞浦路斯外交部常设(总)秘书结束。C.扎克奥斯了解XX世纪末-XXI世纪初国际外交的沧桑。其中包括防止2002年伊拉克战争的努力,调解近东问题的尝试,但最主要的还是塞浦路

斯问题的历史,在国际舞台上,首先是在联合国范围内的旨在调解危机的多阶段,多层次活动历史。而危机是英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它在1974年急剧激化,至今未能恢复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地区国家,世界大国、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外交家们积极参加这种活动。这些外交家都很著名,因为他们和这些年代世界各个重要事件有关:K.安南, P.霍尔布鲁克, K.普连杰加斯特, X.索拉纳, C.拉夫罗夫, Г.加季洛夫等等。

这个程序和世界其他问题密切联系和纠缠,因此作者的叙述对世界许多政治现象的理解很有意义。例如,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起关键作

用的土耳其立场应该考虑欧盟的立场。所有这些时期塞浦路斯和土耳其都要在考虑加入欧盟的问题。

叙述的焦点是联合国范围内和在它领导下采取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努力，有时还是斗争，而C.扎克奥斯是它的积极参加者，此外，还有安理会的决议，秘书长友善使命，双方和多方在联合国范围内的会晤等等。2004年，当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计划时，这个长期的程序紧张程度达到了白热化。当时得到了土耳其、土耳其的塞浦路斯人和一些西方国家赞同的计划似乎有可能通过和实现，达到解决问题。可是计划没有考虑到希腊的塞浦路斯人保持自己国家统一的追求，他们要求撤出外国军队，让难民回乡。作者记录了每一分钟事件进展-国内对计划的公决和安理会对计划投票的次序具有原则性意义-它们在2004年四月达到了戏剧性的紧张变化。向纽约，向全世界各地打的紧急电话代替了谈判、协商、协调、辩论的安静、非急躁的外交进程，结果安理会的旨在影响塞浦路斯的全民公决的决议被俄罗斯否定了。作者写道，俄罗斯在最近十年来首次采用否决权得到塞浦路斯的高度评价。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为了让人回想起俄罗斯过去的超级大国地位。



的确，当时有人曾企图把俄罗斯排挤出对安南计划的谈判，据说甚至没有向它通报美国和英国起草自己的决议草案的消息。然而最主要的是，从书中可以清楚看出这是俄罗斯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原则立场的表现，不使用否决权不可能坚持它。

作者详细分析了冲突所有各方和调解程序参加者的态度，很注重俄罗斯的立场。他在强调我们国家之间传统友好性质的同时高度评价了俄罗斯对塞浦路斯问题调解的建设性原则的立场。和作者在莫斯科与纽约一起工作过的俄罗斯外交官的私人评价也很有趣。

书不仅以其对具体进程的实际讲述引起注意。它表明了什么是

现代的外交。读者可以看到对外交文件的某些词句的争执所反映的不仅是争取和平的斗争，而且是对领土、财政、财产的兴趣，有时甚至完全是对日常生活问题-食品供应，和邻居的交际等问题的兴趣。C.扎克奥斯所讲述的外交，就像在实际生活中那样，往往使外行人不很理解-那是各有自己性格和特点的活生生的人的活的工作。大概，书中的个人情调是读者最感兴趣的，而那些把外交仅当作是联合声明的文词，关于领袖们谈判的报导的外行人来说，这通常被看作是“镜头之外”的情节。C.扎克奥斯描写了所叙述的这一些或那一些参加者，包括联合国代表怎样奉行自己的方针。这些似乎应该是绝对脱离个人习性，甚至政治倾向或私人的好感与反感的公正的人，有时

却在尖锐的情况下甚至有对人身安全的进行暗示。

书的插图不错，和作者一起参加了上述事件的人们的照片强调了书的个人性质。

我想，书对许多人都很重要，包括研究国际关系历史的专家，关心现代国际关系和外交家的实际工作的读者。

最近有许多参加过重大国际事件的俄罗斯外交家的回忆录问世。遗憾的是作者往往仍是忠于官方公报的精神，其中许多事物只能在“字里行间”读到。希望能从外交家那里读到更多关于实际政治事件，活生生的人物及其品格的作品。

关键词：“塞浦路斯外交。私人证据”，C.扎克奥斯。